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碩士學位論文

論OECD全球反稅基侵蝕規則相關措施在國際投
資法下之適法性

Legality of Selected Measures in OECD Global Anti-Base

Erosion Rules Under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指導教授：楊培侃 博士

研究生：蔡昀庭 撰

中華民國 114 年 9 月

謝辭

在研究所的這段時光充滿了挑戰與磨練，生活被各種課業與法組事務填得滿滿的。來回奔波之間，停下腳步才發現，自己在這段過程中學到很多，也逐漸成長為更讓自己喜歡的模樣。

這一路走來，要感謝的人很多，首先，想感謝我的指導教授楊培侃老師，在論文撰寫的過程中，老師總能提供宏觀的視野與精闢的建議，協助我釐清問題、整理思路，並時常關心我進度，讓我順利完成論文；也很感謝黃士洲教授與羅懋緯教授排開行程，在百忙中撥冗擔任口試委員，分別從國際稅法與國際投資法的角度給予寶貴建議，使本文論述更加精確與完善。

在法組的學習與生活中，感謝楊光華老師、施文真老師、楊培侃老師及薛景文老師的悉心教導，讓我在課堂上汲取了豐富的國際法知識與研究方法；在法組事務的磨練中，也從老師們的言教身教中學習做人處事的道理，老師們的日常關懷也讓我備感溫暖。感謝法組的朋友汶憲、子維、佩璇、維萱與雨陽，無論是籌辦研討會、撰寫電子報、參與研究計畫，還是在法中夜以繼日地努力，都有你們的支持與陪伴。每當感到壓力時，總能在法中與你們聊聊瑣事，重新充電再出發。很幸運能與你們相遇、並肩同行。也感謝學長姐育瑋、家卉、宇倫、和潤、思好、雨萱、意晴、楷勛，在忙碌之餘仍不吝給予課業與法中事務上的協助。

衷心感謝每一位幫助我的人，感謝國中好友佳豪，在政大這兩年經常陪我講話、吃飯、走操場，在我遇到挫折時給予鼓勵與支持。感謝大學朋友慧如、雅珊、晴榆、子絮包容我不回訊息，還會時不時督促我論文進度。最後，最深的感謝獻給我的爸爸、媽媽與姊姊。謝謝你們一直以來的愛與支持，讓我有機會在研究所期間赴日本交換，並不時提醒我要好好吃飯、睡覺，這些無微不至的關心成為我堅持下去的動力。人生的旅程仍在持續，期許自己帶著這段時間累積的養分，在下一個篇章中持續學習與探索，迎接更多的挑戰。

摘要

隨著全球化與數位經濟發展，跨國企業經營與盈利模式趨向全球化，雖促進產業與經濟成長，亦加劇稅基侵蝕與利潤移轉。為因應數位時代國際稅收分配挑戰，OECD 提出全球反稅基侵蝕規則(GloBE)，要求大型跨國集團適用至少 15% 有效稅率，並以補充稅確保最低課稅。各國陸續將此制度納入國內法，並調整稅制與優惠政策。

本文探討 GloBE 規則相關租稅措施於國際投資法下之適法性，並自程序與實體面分析其進入投資人對地主國爭端解決機制(ISDS)之條件與風險。程序面爭議主要集中於「投資」與「投資人」定義，以及租稅除外條款的適用範圍。若投資協定未明文排除間接投資保護，間接持股股東具投資人資格；地主國境內企業如具外國籍，或雖具地主國國籍但受外國控制，亦可作為投資人。由於 GloBE 措施屬租稅措施，仍須檢視協定是否設有租稅除外條款及其範圍。惟多數現行 IIAs 並未納入此條款，仲裁庭在多數情況下仍對 GloBE 規則相關措施具管轄權。在實體面，課徵補充稅、取消或削減租稅優惠、或提高公司稅率，可能違反公平與公正待遇、禁止歧視待遇及徵收條款之違反，特別是在地主國已作具體承諾、對外國投資人造成較不利待遇，或對投資價值產生實質剝奪時。然而，多數案件中仲裁庭普遍將公共目的納入衡量，因此若地主國能證明其係基於善意，為防止稅基侵蝕與維護課稅權而採行 GloBE 措施，則較不易被認定違反。

本文認為，雖 GloBE 措施存在 IIA 爭端風險，但因其制度設計，投資人提起仲裁之實益有限。國家與外國投資人可透過重新談判，以非降低有效稅率之政策取代原優惠，兼顧稅收與投資誘因。中長期應推動 IIA 改革與稅投政策協調，以促進國際投資法與國際稅制改革之相容性與穩定性。

關鍵詞：全球反稅基侵蝕規則、國際投資仲裁、管轄權、投資保護條款

Abstract

With globalization and digitalization,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have increasingly adopted global business models, intensifying issues of 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 To tackle these challenges, the OECD introduced the Global Anti-Base Erosion (GloBE) rules, setting a minimum effective tax rate of 15% for large multinational groups. Many countries have since incorporated these rules into domestic law, adjusting tax systems and incentives accordingly.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legality of GloBE related measures under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focusing on procedural and substantive aspects. Procedurally, key issues include definitions of “investment” and “investor,” and the scope of tax carve-out clauses. Where IIAs do not explicitly exclude indirect investments, indirect shareholders may qualify as investors. Enterprises located in the host state but foreign-controlled may also qualify. Since GloBE measures are tax-related, it is important to assess whether IIAs include tax carve-out provisions; however, most lack such clauses, allowing tribunals to assert jurisdiction over GloBE related disputes. Substantively, imposing top-up taxes, reducing incentives, or raising corporate tax rates may risk violating fair and equitable treatment, non-discrimination, or expropriation protections. Yet, tribunals generally consider public policy objectives behind such measures, making breaches less likely if states act in good faith to prevent base erosion and protect taxing rights. The article concludes that although dispute risks exist, GloBE rules’ design limits incentives for arbitration. Renegotiation of incentives and reforms promoting alignment between investment law and tax policy are recommended.

Keywords: GloBE Rules,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rbitration, Jurisdiction, Investment Protection Clauses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及目的.....	1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限制.....	1
第三節 研究架構.....	2
第二章 OECD 全球反稅基侵蝕規則之緣起及挑戰	4
第一節 GloBE 規則之發展背景	4
一、國際租稅挑戰.....	4
二、OECD 支柱二—GloBE 規則.....	7
第二節 GloBE 規則之課稅原則	9
一、GloBE 規則簡介	9
二、QDMTT、IIR 及 UTPR 之適用順序.....	23
三、GloBE 規則之適用效力	25
第三節 GloBE 規則之實施現況與挑戰	27
一、租稅管轄區之立法進程.....	28
三、GloBE 規則之實施挑戰與制度缺陷	33
第四節、GloBE 規則下可能引發投資爭端之措施	36
一、補充稅之課徵.....	37
二、租稅優惠之取消與調整.....	38
三、小結.....	41
第三章 對 GloBE 規則提起投資仲裁爭端可能涉及之管轄權爭議分析	42
第一節、投資人將 GloBE 規則相關措施訴諸 ISDS 之可能.....	42
第二節、仲裁庭對 GloBE 規則爭端之基本程序要件	45

一、投資與投資人之定義.....	46
二、GloBE 規則爭端之管轄權爭議－以投資與投資人定義為中心	48
第三節 租稅除外條款與 GloBE 規則下之仲裁管轄問題	56
一、租稅除外條款之發展與類型.....	56
二、GloBE 規則爭端與租稅除外條款	60
第四節、小結.....	65
第四章 對地主國採行 GloBE 規則相關措施可能違反國際投資保障義務之評估	67
第一節、公平與公正待遇條款.....	67
一、正當合理期待.....	69
二、法律穩定性.....	74
三、小結.....	81
第二節、禁止歧視待遇條款.....	82
一、禁止歧視待遇條款之理論與仲裁實務.....	82
二、補充稅之課徵是否違反禁止歧視待遇條款.....	85
第三節、徵收條款.....	89
一、理論與仲裁實務.....	89
二、GloBE 規則相關措施是否違反徵收條款	97
第五章、結論.....	101
參考文獻.....	105

圖次

圖 2-1：QDMTT、合格 IIR 及合格 UTPR 之適用順序	25
圖 3-1：跨國企業集團案例	49



表次

表 2-1：具過渡性合格狀態之租稅管轄區立法	29
------------------------------	----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及目的

2021 年 10 月，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發布全球反稅基侵蝕規則（Global anti-Base Erosion Rules，以下簡稱 GloBE 規則），作為第二支柱（Pillar Two）的一部分，旨在透過 15% 的全球最低稅負，有效遏止跨國企業稅基侵蝕與利潤移轉行為。自 2024 年起，GloBE 規則已陸續由各國實施，其核心課稅原則包含所得涵蓋原則（Income Inclusion Rule, IIR）與徵稅不足之支出原則（Under-taxed Payments Rule, UTPR）等課稅原則，並規定國家得設立優先針對國內低稅所得課稅之合格國內補充稅制（Qualified Domestic Minimum Top Up Tax, QDMTT）。

雖然 GloBE 規則之設計目的在於稅制改革，但其對跨國投資結構、租稅優惠政策與投資人權益的影響，已引起國際投資法領域高度關注。在國際投資協定（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IIAs）之架構下，投資人與地主國之間的爭端，可透過投資人對地主國爭端解決機制（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ISDS）提起仲裁。雖目前尚無直接涉及 GloBE 規則的 ISDS 案件，但各國因應該規則所採取之補充稅課徵或租稅優惠調整措施，可能引發違反違反投資保護條款的爭議。因此，本篇論文旨在探討 GloBE 規則之架構與規範內容，並結合國際投資法理論與實務，分析該稅制及相關租稅措施在國際投資仲裁中的程序與實體問題，藉以評估此國際租稅改革在國際投資法下之適法性與潛在爭端風險。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限制

本文採用文獻整理法與歸納比較法，蒐集並分析 OECD 發布之 GloBE 立法

範本、指引與釋義文件，說明其制度設計與運作機制，同時整理國際投資法下 IIAs 的租稅除外條款類型、實質投資保護條款以及相關仲裁實務案例，分析仲裁庭在不同事實背景下採用之法律標準與見解。此外，參考相關國內外期刊、論文、專書與國際機構報告，結合文獻與實務案例所揭示之適用標準與情境，在無既有 GloBE 爭端案件可供依循之情況下，提出地主國與投資人之可能主張與仲裁庭判斷。

研究限制方面，由於目前尚無直接涉及 GloBE 規則的 ISDS 實務案例，本文對各國實施該規則在國際投資法下之適法性分析，必須建立於假設情境之上。此外，各國在國內立法與實施過程中，可能因稅制結構與政策差異而有所不同，惟受限於語言及實施國數量過多等因素，本文僅能簡要說明各國之 GloBE 規則立法情形。然而，從 GloBE 規則對 QDMTT、IIR 與 UTPR 的定義，以及其永久性與過渡性審查機制之設計觀察，各國立法與適用原則上將依循 GloBE 立法範本（Model Rules）及相關解釋文件。因此，本文在分析各國依 GloBE 規則實施之租稅措施時，將以立法範本所規範的內容為主要依據，此一限制應不致對本文之研究主題與核心分析構成重大影響。

第三節 研究架構

本文共分為五章，第一章為緒論，說明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方法與限制，以及研究架構。第二章介紹 GloBE 規則之緣起與制度設計，說明 QDMTT、IIR 與 UTPR 之課稅邏輯與適用順序，並概述各國立法進程，同時分析此稅制在實施上的挑戰，以及相關措施與國際投資法間的潛在衝突，作為後續討論其適法性之基礎。第三章探討仲裁庭對 GloBE 規則相關措施之管轄權。首先，透過 ISDS 案件與國際組織之研究與指引文件，說明此類措施確實存在被投資人訴諸 ISDS 之風險；其次，分析仲裁庭審理 ISDS 案件之基本程序要件，並聚焦於「投資」與

「投資人」的定義，包括間接持股與外國控制的認定，再透過假設案例，分析 GloBE 規則相關措施可能引發之程序性爭議。最後，整理不同類型的租稅除外條款，說明其對投資人提起 ISDS 仲裁程序之影響，並援引 Yukos 案，進一步探討在地主國未遵守善意原則而實施 GloBE 規則相關措施的情況下，仲裁庭對此類爭端是否具備管轄權。第四章則轉向實體面，檢視 GloBE 規則相關措施可能引發的國際投資法爭端，聚焦於公平與公正待遇、禁止歧視待遇與徵收條款之理論與仲裁實務，分析地主國因應 GloBE 規則所採取之補充稅課徵與租稅優惠調整，是否可能違反其於投資協定下的義務。第五章為結論，綜合前述分析，總結 GloBE 規則相關措施在國際投資法下之適法性與潛在爭端風險，並提出國家、投資人與國際組織之因應建議，以促進健全且穩定的全球經濟秩序。



第二章 OECD 全球反稅基侵蝕規則之緣起及挑戰

全球反稅基侵蝕規則(Global anti-Base Erosion Rules, 以下簡稱 GloBE 規則) 係 OECD 推動之反避稅提案。自 2010 年起, OECD 便致力於解決數位經濟帶來之租稅挑戰, 並提出多項國際租稅改革方案, 期能取代各國為因應數位經濟所採行之單邊措施。在過去十年間, OECD 歸納出兩項核心挑戰。其一, 新興商業模式已不再依賴實體商業據點, 使各國政府難以依傳統稅制判斷課稅連結與利潤歸屬; 其二, 全球生產要素流動 (factor mobility) 加劇國與國之間的稅率競爭, 導致企業所得稅率持續下滑。

為因應上述挑戰, OECD 包容性架構於 2020 年提出「雙支柱方案」。其中, 支柱二 GloBE 規則旨在抑制各國租稅政策之「競相逐底 (race to bottom)」行為, 並防止大型跨國企業集團透過設立於低稅負租稅管轄區而侵蝕各國稅基, 進而導致不公平稅負。然而, 該制度之有效性因規範設計而面臨諸多挑戰, 其偏離傳統稅法課稅原則亦引發國際間的批評。此外, 各國為實施 GloBE 規則所採取之措施, 亦可能引發與國際投資法之衝突。

本章將首先介紹 GloBE 規則之發展背景與核心課稅原則, 接著說明各國實施現況及其推行過程所面臨之主要挑戰, 最後探討 GloBE 規則相關措施在國際投資法下可能引發之法律風險。

第一節 GloBE 規則之發展背景

一、國際租稅挑戰

隨著全球化與數位經濟的快速發展, 企業之經營與盈利模式逐漸轉向全球市場。此一變化雖帶來產業發展與經濟成長機會, 但也對傳統租稅體系構成挑戰,

特別是在跨國企業利潤之課稅權分配、租稅公平性以及各國租稅競爭等面向，因此現有國際租稅制度亟需調整，以因應新的商業模式。

（一）數位經濟之稅收挑戰

現行國際租稅規範可追溯至 20 世紀初期，當時全球化與數位化程度有限，課稅原則主要建立在企業於某一地具備實體存在，從而在企業與租稅管轄區之間形成聯繫因素（nexus）。然而，隨著經濟全球化與數位化快速發展，傳統的租稅架構已難以適用於現今商業模式。數位經濟具備三大特徵——無實體存在、高度仰賴無形資產、以及透過用戶數據所創造的價值，此等特徵使傳統租稅規範逐漸失靈，以下分別說明之¹。

1. 在特定租稅管轄區具有所得，卻無實體存在

現行租稅協定多依循 UN 或 OECD 的租稅協定範本，要求外國企業在當地設有「常設機構（permanent establishment）」時，方能形成課稅聯繫因素²。然而，由於數位經濟興起，數位化企業無需在租稅管轄區設立常設機構，亦可從事商業活動並在各國間輕易轉移資產。在此商業模式下，既有的國際租稅規範可能所得來源國無法就企業之實質營運活動（substantial activity）課稅，致使企業稅負無法充分反映其創造之價值與利潤³。

¹ Marcin Szczepański, *Taxing the Digital Economy: New Developments and the Way Forward*, EUROPEAN PARLIAMENT (Oct. 26, 2021),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BRIE/2021/698761/EPRS_BRI\(2021\)698761_EN.pdf](https://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BRIE/2021/698761/EPRS_BRI(2021)698761_EN.pdf)

² 常設機構（permanent establishment）係指外國企業在另一國執行全部或部分營業活動之固定場所，或雖未透過固定營業場所從事活動，但外國企業在另一國有非獨立的代理人，並透過該代理人從事特定性質活動，則該外國企業被認定為在另一國設有常設機構。E.g., Articles of the Model Convention with Respect to Taxes on Income and on Capital art. 5, <https://www.oecd.org/ctp/treaties/articles-model-tax-convention-2017.pdf>

³ Marcin Szczepański, *supra* note 1.

2. 無形資產所得歸屬困難

數位經濟帶來新的商業模式，使企業越來越依賴軟體、演算法、資料庫等無形資產。此類資產可在各地輕易移轉，使企業得以透過調整商業活動來降低納稅義務，也導致稅務機關越來越難判斷無形資產產生的所得，以及此類所得在跨國企業集團成員之間的分配。常規交易原則（Arm's Length Principle）為國際稅收重要原則，規定企業集團內部或關係企業進行交易時，交易價格須以市場價格為基準，以確保交易價格公平合理，防止價格操縱以及租稅規避。然而，在數位經濟時代，由無形資產創造之利潤往往缺乏可比市場價格，導致常規交易原則難以適用。跨國企業可能透過調整移轉訂價，將位於高稅負租稅管轄區之商業實體成本最大化，同時增加低稅負租稅管轄區的應稅所得，達到租稅規避的效果⁴。

3. 用戶數據與生成內容之價值判斷

數位平台常以免費服務換取用戶數據，並藉由數據分析與用戶生成內容（user-generated content）創造巨大利潤。歐盟等國據此主張應在用戶所在國課稅，認為用戶亦參與價值創造。然而，現行會計與稅務規範未將用戶數據列為資產，導致其價值難以課稅⁵。

（二）企業所得稅競相逐底

與此同時，各國為吸引投資，競相實施低稅負等獎勵措施，此現象對所有國家皆將產生不利影響。事實上，國際租稅競相逐底（race to bottom）之情形已持續四十餘年，從 1980 年平均稅率 40.18% 的水準，下降至 2022 年的 23.45%⁶，全球化與數位經濟使租稅競爭越加惡化，其中又以開發中國家受到最大衝擊。儘管

⁴ *Id.*

⁵ *Id.*

⁶ Cristina Enache, *Corporate Tax Rates Around the World, 2023*, TAX FOUNDATION (Dec. 12, 2023), https://taxfoundation.org/data/all/global/corporate-tax-rates-by-country-2023/#_ftn1.

有研究指出，多數投資在缺少租稅優惠的情況下仍會進行⁷，租稅優惠造成的稅收損失可能減少政府在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社會支持等方面的財政支出，並阻礙政府調動其國內資源⁸，但開發中國家為了吸引並留住外人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近數十年間仍頻繁實施各種稅收優惠⁹，導致資本稅率過低、國家財政負擔提升。

（三）小結

綜上，跨國企業利用國際租稅規範之不足及各國稅制差異，將利潤從高稅負地區移轉至低稅負地區，以達降低企業稅負之目的，引發「稅基侵蝕與利潤移轉（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 BEPS）」問題。此舉嚴重侵蝕各國稅基，並損害租稅公平性。據 OECD 統計，BEPS 每年造成全球稅收損失約 1 兆至 2.4 兆稅收，相當於全球企業所得稅的 4% 至 10%¹⁰。

二、OECD 支柱二—GloBE 規則

為因應上述挑戰，OECD 於 2013 年發布「稅基侵蝕與利潤移轉（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 BEPS）」報告，並於同年 7 月提出 15 項行動計畫，審視目前的國際租稅制度並提出可能之改革方向¹¹。2016 年，OECD 與 G20 成立 BEPS 包容性架構（Inclusive Framework on BEPS），鼓勵開發中國家及有意願參與之租稅管轄地區一同推動 BEPS 相關標準，並對 BEPS 行動計畫之執行情況進行監督

⁷ IMF, OECD, UN & World Bank, Options for Low Income Countries' Effective and Efficient Use of Tax Incentives for Investment: A Report to the G-20 Development Working Group 11-12 (2015), <https://documents1.worldbank.org/curated/en/794641468000901692/pdf/100756-Tax-incentives-Main-report-options-PUBLIC.pdf>.

⁸ *Id.* at 34-35.

⁹ *Id.* at 8-9.

¹⁰ OECD, BEPS Project Explanatory Statement: 2015 Final Reports (2016).

¹¹ OECD, Addressing 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 (2013), https://read.oecd-ilibrary.org/taxation/addressing-base-erosion-and-profit-shifting_9789264192744-en#page3; OECD, Action Plan on 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 (2013), https://read.oecd-ilibrary.org/taxation/action-plan-on-base-erosion-and-profit-shifting_9789264202719-en#page13.

與審查¹²。基此，OECD 於 2018 年發布「經濟數位化帶來之租稅挑戰－2018 年期中報告」，此報告深入分析數位化商業模式之特徵，及其帶來之稅務挑戰¹³。儘管包容性架構成員並未基於此次分析得出一致的數位經濟因應對策，但承諾於 2020 年發布最終報告，並提供以成員共識為基礎的長期解決方案¹⁴。

2019 年 1 月，OECD 首次提出雙支柱方針¹⁵，後於 2020 年 10 月提出雙支柱之藍圖報告¹⁶，持續在 BEPS 包容性架構下就雙支柱方案進行談判及公眾諮詢¹⁷。支柱一旨在根據價值創造地重新調整跨國企業利潤之稅負，將課稅權分配予市場國。支柱二由 GloBE 規則及應予課稅原則（Subject to Tax Rule, STTR）組成，旨在限制直接稅對投資及企業設立地點之決策造成的負面影響，防止企業之利潤移轉行為並降低各國政府訂定低稅或免稅稅制的動機。為實施 GloBE 規則，OECD 於 2021 年 10 月發布「解決經濟數位化課稅挑戰之雙支柱聲明」，截至 2023 年 6 月，共有 139 個包容性架構成員同意建立協調一致的 GloBE 規則，確保大型跨國企業在其營運之稅務管轄區均須繳納最低稅負¹⁸。隨後於 2021 年 12 月，

¹² OECD, Background Brief: Inclusive Framework on BEPS 11 (2017), <https://www.oecd.org/tax/background-brief-inclusive-framework-for-beps-implementation.pdf>. 截至 2024 年 5 月，已有 147 個國家及租稅管轄地區成為 BEPS 包容性架構成員。Members of the OECD/G20 Inclusive Framework on BEPS, OECD, <https://www.oecd.org/tax/beps/inclusive-framework-on-beps-composition.pdf> (last updated May 28, 2024).

¹³ OECD, Tax Challenges Arising from Digitalisation – Interim Report 2018 (2018), https://read.oecd-ilibrary.org/taxation/tax-challenges-arising-from-digitalisation-interim-report_9789264293083-en#page1.

¹⁴ *Id.* at 212.

¹⁵ OECD, Addressing the Tax Challenges of the Digitalisation of the Economy – Policy Note (2019), <https://www.oecd.org/tax/beps/policy-note-beps-inclusive-framework-addressing-tax-challenges-digitalisation.pdf>.

¹⁶ OECD, Tax Challenges Arising from Digitalisation – Report on Pillar One Blueprint (2020), <https://www.oecd.org/tax/beps/tax-challenges-arising-from-digitalisation-report-on-pillar-one-blueprint.pdf>; OECD, Tax Challenges Arising from Digitalisation – Report on Pillar Two Blueprint (2020), <https://www.oecd.org/tax/beps/tax-challenges-arising-from-digitalisation-report-on-pillar-two-blueprint.pdf>.

¹⁷ OECD, Public Consultation Document: Addressing the Tax Challenges of the Digitalisation of the Economy (2019), www.oecd.org/tax/beps/public-consultation-document-addressing-the-tax-challenges-of-the-digitalisation-of-the-economy.pdf; OECD, Programme of Work to Develop a Consensus Solution to the Tax Challenges Arising from the Digitalisation of the Economy (2019), <https://www.oecd.org/tax/beps/programme-of-work-to-develop-a-consensus-solution-to-the-tax-challenges-arising-from-the-digitalisation-of-the-economy.pdf>.

¹⁸ OECD, Statement on a Two-Pillar Solution to Address the Tax Challenges Arising from the Digitalisation of the Economy (2021) [hereinafter Statement on Two-Pillar Solution], <https://www.oecd.org/tax/beps/statement-on-a-two-pillar-solution-to-address-the-tax-challenges->

OECD 完成 GloBE 立法範本 (Model Rules)，並陸續發布 commentary 與 administrative guidance，以闡明立法範本之適用與執行細節¹⁹。

綜上所述，OECD 在全球化與數位經濟的稅務挑戰下，透過雙支柱方案，逐步建構新的國際稅收架構。其中，支柱二所提出的 GloBE 規則，成為確保跨國企業繳納公平稅負與抑制稅基侵蝕的核心制度設計。

第二節 GloBE 規則之課稅原則

一、GloBE 規則簡介

GloBE 規則為支柱二的核心內容，該制度主要由 GloBE 立法範本、釋義與行政指引所構成。GloBE 立法範本為整體制度之核心，由一套相互連結之規定構成，其設計目的在於提供各租稅管轄區將 GloBE 規則納入國內法之立法藍本，確保大型跨國企業集團在其營運的租稅管轄區，均須就其所得負擔至少 15% 的最低有效稅率。OECD 包容性架構則持續發布立法範本之釋義與行政指引，以進一步釐清各項規定之解釋與適用方式，其功能在於促進各國對 GloBE 立法範本之一致理解²⁰。

在此規範架構下，GloBE 規則之運作邏輯可簡化為四個步驟：首先，租稅管轄區需判斷適用對象，即確認合併年營收達 7.5 億歐元門檻之跨國企業集團成員。

arising-from-the-digitalisation-of-the-economy-october-2021.pdf; Members of the OECD/G20 Inclusive Framework on BEPS joining the October 2021 Statement on a Two-Pillar Solution to Address the Tax Challenges Arising from the Digitalisation of the Economy as of 9 June 2023, OECD, <https://www.oecd.org/tax/beps/oecd-g20-inclusive-framework-members-joining-statement-on-two-pillar-solution-to-address-tax-challenges-arising-from-digitalisation-october-2021.pdf> (last visited June 11, 2024).

¹⁹ OECD, Tax Challenges Arising from Digitalisation of the Economy – Global Anti-Base Erosion Model Rules (Pillar Two).

²⁰ OECD, Tax Challenges Arising from the Digitalisation of the Economy – Administrative Guidance on the Global Anti- Base Erosion Model Rules (Pillar Two) 4-5 (2023) [hereinafter Administrative Guidance on GloBE Model Rules], <https://www.oecd.org/tax/beps/agreed-administrative-guidance-for-the-pillar-two-globe-rules.pdf>.

其次，以財務會計淨損益為基礎，計算各集團成員之 GloBE 所得。其後，依立法範本規定計算「調整後涵蓋稅 (adjusted covered tax)」，主要包括針對所得課徵之稅負。最後，依據各租稅管轄區內符合適用範圍之企業、其 GloBE 所得及調整後涵蓋稅，計算有效稅率 (effective tax rate)。若有效稅率低於 15%，則實施 GloBE 規則之租稅管轄區將依 IIR 或 UTPR 課徵補充稅 (top-up tax)。以下將依此運作邏輯，說明 GloBE 規則之具體規定。

(一) 適用範圍

GloBE 規則適用於跨國企業集團之集團成員，該跨國企業集團前四個會計年度中，至少兩個會計年度的集團合併年營收達 7.5 億歐元²¹。跨國企業集團係指至少有一個營利事業或一個常設機構，其所在之租稅管轄區與最終母公司之租稅管轄區不同者²²。這些營利事業及常設機構之間具控制、從屬關係，且資產、負債、收入、費用及現金流量納入最終母公司之合併財務報表中計算²³。納入合併財務報表的實體，即構成 GloBE 制度下之「集團成員」，範圍不限於法人，亦包括合夥、信託等具備獨立財務報表之實體，以及由上述實體設立並符合特定稅法條件之常設機構²⁴。

原則上，集團合併營收達適用門檻之集團成員皆適用 GloBE 規則，惟考量到部分實體之設立具特殊政策目的或法律地位，故 GloBE 立法範本明定排除適

²¹ OECD, Tax Challenges Arising from Digitalisation of the Economy – Global Anti-Base Erosion Model Rules (Pillar Two) art. 1.1.1 [hereinafter GloBE Model Rules], <https://www.oecd-ilibrary.org/docserver/782bac33-en.pdf?expires=1718709222&id=id&accname=guest&checksum=510E73C0FEF221913F34DACB1DAFBCF6> (“The GloBE Rules apply to Constituent Entities that are members of an MNE Group that has annual revenue of EUR 750 million or more in the Consolida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of the Ultimate Parent Entity (UPE) in at least two of the four Fiscal Years immediately preceding the tested Fiscal Year. Further rules are set out in Article 6.1 which modify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onsolidated revenue threshold in certain cases.”).

²² *Id.* art. 1.2.1.

²³ *Id.* art. 1.2.2.

²⁴ *Id.* arts. 1.3.1; 10.1.1.

用 GloBE 規則之 6 種實體²⁵。此 6 種排除實體又分為兩類，第一類為受政府監管並享有免稅資格之實體，在外國法或租稅協定下常獲有免稅待遇，包括政府組織、國際組織、非營利組織及退休基金。第二類則包含具最終母公司地位之投資基金，及具最終母公司地位之不動產投資工具，排除此類實體之目的係為了保護其作為稅收中立投資工具 (tax neutral investment vehicles) 之地位²⁶。一集團成員如符合排除實體之定義，則非 GloBE 規則之適用對象，無需計算其補充稅，亦不得基於 IIR 及 UTPR 對其課徵補充稅，惟跨國企業集團計算合併營收是否達 GloBE 規則適用門檻時，仍應計入排除實體之收入²⁷。

(二) 集團成員所在租稅管轄區

有效稅率之計算與補充稅額之分配，係以租稅管轄區為單位，並依各租稅管轄區內之集團成員稅負水準判斷是否應課徵補充稅。是以，如何界定集團成員所在租稅管轄區，為適用 GloBE 規則之基本前提。

依 GloBE 立法範本規定，對一般實體而言，其所在地之認定原則上優先採取稅務居住地作為判斷標準，亦即如該實體依其實際管理地、設立地、組織地或其他類似標準，為某一租稅管轄區之稅務居民 (tax resident)，則該租稅管轄區即為其所在地。倘無稅籍者，則以實體之設立地或組織地作為判定依據²⁸。

²⁵ *Id.* arts. 1.3.3, 1.5; OECD, Tax Challenges Arising from Digitalisation – Report on Pillar Two Blueprint 30 (2020), <https://www.oecd-ilibrary.org/docserver/abb4c3d1-en.pdf?expires=1719052174&id=id&accname=guest&checksum=4FAA076221F5A86B06C6BAFBFFB7F2B8>.

²⁶ OECD, Tax Challenges Arising from the Digitalisation of the Economy – Commentary to the Global Anti-Base Erosion Model Rules (Pillar Two) 20 (2022) [hereinafter Commentary to GloBE Model Rules], <https://www.oecd.org/tax/beps/tax-challenges-arising-from-the-digitalisation-of-the-economy-global-anti-base-erosion-model-rules-pillar-two-commentary.pdf>; ECD, Tax Challenges Arising from Digitalisation – Report on Pillar Two Blueprint (2020), <https://www.oecd.org/tax/beps/tax-challenges-arising-from-digitalisation-report-on-pillar-two-blueprint.pdf>.

²⁷ Commentary to GloBE Model Rule, *supra* note 26 at 20.

²⁸ GloBE 立法範本另就穿透實體 (Flow-through Entities) 與常設機構所在地之判斷設有規定，惟本論文聚焦於一般實體之補充稅課徵爭議，故對前述特殊實體不另作詳論。GloBE Model Rules, *supra* note 21, arts. 10.3.1-10.3.3; Commentary to GloBE Model Rules, *supra* note 26, at 222.

(三) GloBE 所得之計算

跨國企業集團成員之 GloBE 所得係以財務會計淨損益為基礎，並依集團最終母公司編製合併財務報表所使用之會計準則計算²⁹。為建立統一的國際稅基，GloBE 立法範本針對財稅差異進行調整，使 GloBE 所得更符合實質經濟活動與最低稅負制度之設計目的³⁰。

主要調整項目包括淨所得稅費用、股息、權益損益、重估與處分損益、特定外幣交易損益、政策性不予認列之費用、應計退休金費用、前期會計錯誤及會計原則變更等³¹。

整體而言，GloBE 制度透過調整財務會計淨損益，排除部分會導致重複課稅或與稅收政策明顯衝突之項目，使 GloBE 所得更接近一般企業所得稅制下之應稅所得。然因各國稅制對財會所得之調整內容不盡相同，部分財稅差異仍將保留於 GloBE 所得中，此為統一稅基無可避免之結果，亦可能形成 GloBE 制度設計所欲矯正之低稅負情形³²。

(四) 涵蓋稅之計算與分配

GloBE 制度下，用以計算有效稅率之稅額為「調整後涵蓋稅(adjusted covered taxes)」，其計算係以集團成員財務報表中所認列之「當期稅費(current tax expense)」為基礎，結合 GloBE 規則對「涵蓋稅(covered taxes)」之定義與調整，最終反映集團成員就 GloBE 損益實際承擔之稅負³³。以下分別說明涵蓋稅的

²⁹ 集團成員之財務會計淨損益包含集團成員間內部交易之收益、成本、費用及損益。GloBE Model Rules, *supra* note 21, arts. 3.1.1-3.1.2.

³⁰ Commentary to GloBE Model Rules, *supra* note 26, at 46.

³¹ *E.g.*, GloBE Model Rules, *supra* note 21, art. 3.2.1.

³² Commentary to GloBE Model Rules, *supra* note 26, at 47.

³³ GloBE Model Rules, *supra* note 21, art. 4.1.1 (“The Adjusted Covered Taxes of a Constituent Entity for the Fiscal Year shall be equal to the current tax expense accrued in its Financial Accounting Net Income or Loss with respect to Covered Taxes for the Fiscal Year adjusted by: (a) the net amount of its Additions to Covered Taxes for the Fiscal Year (as determined under Article 4.1.2) and Reductions to Covered Taxes for the Fiscal Year (as determined under Article 4.1.3); (b) the Total Deferred Tax

範圍與調整方式。

1. 涵蓋稅之範圍

根據 GloBE 立法範本，涵蓋稅係指對企業所得、利潤分配、保留盈餘或公司股權等課徵之稅款，或其他具有替代所得稅性質之稅項，但不包括與所得無直接關聯者，例如消費稅、數位服務稅、印花稅、薪資所得稅及財產稅等。該等稅款之課稅基礎係基於交易、勞務報酬或資產價值課徵，並非針對企業所得，故不納入涵蓋稅計算範圍³⁴。此外，GloBE 規則亦排除制度本身所課徵之補充稅（如 IIR、QDMTT、UTPR），以避免稅負重複計入³⁵。

2. 調整後涵蓋稅之計算

企業財務會計中與涵蓋稅相關之當期稅費，未必能完整反映所有與 GloBE 所得相關之稅負，亦可能包含無關稅項。為提升稅負計算準確性，GloBE 立法範本設計一套調整機制，將與涵蓋稅相關之當期稅費轉換為「調整後涵蓋稅」，具體調整內容包括：(1)加計稅項：將未記為當期稅費，但與 GloBE 所得相關之稅負納入；(2)減除稅項：排除與 GloBE 所得無關者；(3)納遞延稅調整額：以財務會計認列之遞延所得稅費用為基礎，加計當年度實際支付之不予認列或尚未認列之應計稅項，以及前一年度已被追回（recapture）而於本年度實際繳納之遞延所得稅負債金額，並減除不符合會計認列標準而未認列遞延所得稅資產之虧損金額；(4)納入權益項稅額：將列於權益或其他綜合損益，且與 GloBE 所得相關之稅費

Adjustment Amount (as determined under Article 4.4); and (c) any increase or decrease in Covered Taxes recorded in equity or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 relating to amounts included in the computation of GloBE Income or Loss that will be subject to tax under local tax rules.”); Commentary to GloBE Model Rules, *supra* note 26, at 85.

³⁴ GloBE Model Rules, *supra* note 21, art. 4.2.1; Commentary to GloBE Model Rules, *supra* note 26, at 94.

³⁵ GloBE Model Rules, *supra* note 21, art. 4.2.2. 不合格可退還租稅抵減額（disqualified refundable imputation tax）係指對集團成員之收入課徵稅款後，當收入以股息分配予該集團成員之所有人，集團成員被課徵之稅款將退還於集團企業或其所有人，或可扣抵所有人其他非由股息產生之稅額。Commentary to GloBE Model Rules, *supra* note 26, at 194.

計入³⁶。此調整可更真實反映企業於特定租稅管轄區實際負擔之稅負水準，進而作為有效稅率計算與補充稅課徵之依據。

（五）有效稅率與補充稅之計算與分配

有效稅率係 GloBE 規則之關鍵要素，其能夠判斷在一個財政年度中，跨國企業集團是否就其所得於各租稅管轄區繳足最低稅負。有效稅率未達 15% 的部分將產生補充稅，並依跨國企業集團成員於各租稅管轄區的實質活動及需依 QDMTT 繳納之稅額調整補充稅。

1. 各租稅管轄區之有效稅率

GloBE 制度採取領域混合法 (jurisdictional blending approach) 計算有效稅率 (effective tax rate)，即以租稅管轄區為單位，將該區內所有屬於同一跨國企業集團之成員，其 GloBE 所得與稅負合併計算³⁷。各租稅管轄區內集團成員於一財政年度之調整後涵蓋稅總額與淨 GloBE 所得之比值，即為該區之有效稅率。計算公式為：有效稅率=該租稅管轄區集團成員調整後涵蓋稅總額/淨 GloBE 所得³⁸。

2. 補充稅率

GloBE 規則所訂之最低稅率為 15%，當租稅管轄區之有效稅率低於最低稅率時，該區即被視為低稅負租稅管轄區 (Low-Tax Jurisdiction)，而位於該地的集團成員則為低稅負集團成員 (Low-Tax Constituent Entities)。相對地，若該租稅

³⁶ GloBE Model Rules, *supra* note 21, arts. 4.1.1-4.1.3.

³⁷ Commentary to GloBE Model Rules, *supra* note 26, at 116.

³⁸ 「淨 GloBE 所得」係指某一租稅管轄區內，所有集團成員之 GloBE 收入總額減去 GloBE 支出總額。當淨 GloBE 所得為零或負時，該管轄區不會產生補充稅，亦無須計算其有效稅率。*Id.* arts. 5.1.1-5.1.2 (“The Effective Tax Rate of the MNE Group for a jurisdiction with Net GloBE Income shall be calculated for each Fiscal Year. The Effective Tax Rate of the MNE Group for a jurisdiction is equal to the sum of the Adjusted Covered Taxes of each Constituent Entity located in the jurisdiction divided by the Net GloBE Income of the jurisdiction for the Fiscal Year. For purposes of Chapter 5, each Stateless Constituent Entity shall be treated as a single Constituent Entity located in a separate jurisdiction.”).

管轄區之有效稅率等於或高於最低稅率，則不會產生補充稅率（Top-up Tax Percentage），該區內的集團成員亦不構成低稅負集團成員³⁹。

補充稅率即為最低稅率與有效稅率之間的差額，並作為後續計算補充稅額之依據。差額為正數時才需計算補充稅額；若有效稅率等於或高於最低稅率，則補充稅率為零，無須額外課稅。計算公式為：「補充稅率=最低稅率-有效稅率⁴⁰」。

3. 超額利潤

補充稅原則上係針對租稅管轄區內跨國企業集團成員之淨 GloBE 所得課徵。然而，為避免對源自實質經濟活動之報酬課徵額外稅負，GloBE 規則允許企業選擇適用實質性所得排除制度（Substance-based Income Exclusion），將部分所得自補充稅稅基中扣除⁴¹。

若企業選擇適用該排除制度，補充稅之課稅基礎即為超額利潤（Excess Profit），亦即淨 GloBE 所得扣除實質性所得排除額之餘額，若實質性所得排除額等於或高於淨 GloBE 所得，則不產生應稅之超額利潤，企業亦無補充稅義務；反之，若企業選擇不適用該排除制度，則補充稅將以全部淨 GloBE 所得為稅基⁴²。計算公式為：「超額利潤 = 淨 GloBE 所得 - 實質性所得排除額」。

所稱「實質性所得排除」，係指由實質經濟活動所產生之固定報酬，包含企業於特定租稅管轄區內所支付薪資成本與持有有形資產價值所對應之固定報酬。計算公式為：「實質性所得排除額 = (薪資成本×5%) + (有形資產帳面價值×5%)」

³⁹ Commentary to GloBE Model Rules, *supra* note 26, at 117.

⁴⁰ GloBE Model Rules, *supra* note 21, art. 5.2.1 (“The Top-up Tax Percentage for a jurisdiction for a Fiscal Year shall be the positive percentage point difference, if any, compu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following formula: *Top up Tax Percentage* = *Minimum Rate* – *Effective Tax Rate*. Where the Effective Tax Rate is the Effective Tax Rate determined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5.1 for the jurisdiction for the Fiscal Year.”).

⁴¹ GloBE Model Rules, *supra* note 21, art. 5.2.2 (“The Excess Profit for the jurisdiction for the Fiscal Year is the positive amount, if any, compu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following formula: *Excess Profit* = *Net GloBE Income* – *Substance based Income Exclusion*....”).

⁴² Commentary to GloBE Model Rules, *supra* note 26, at 120.

此類所得通常流動性低、不易透過租稅規劃移轉，亦非稅基侵蝕與利潤移轉風險之主要來源，故將其排除於補充稅範圍⁴⁴。

4. 補充稅之計算與分配

當跨國企業集團成員位於低稅負租稅管轄區，該集團有義務就其超額利潤繳納補充稅，但各國可依其經濟發展需求與國內稅制架構，制定合格國內補充稅制 (Qualified Domestic Minimum Top Up Tax, QDMTT)，使其得於他國依 GloBE 規則徵收補充稅之前，優先對境內低稅負集團成員課徵補充稅。因此，補充稅之計算公式為：「租稅管轄區補充稅 = 超額利潤 × 補充稅率 + 當期額外補充稅 - QDMTT 補充稅⁴⁵。」

儘管補充稅係以租稅管轄區為單位計算，惟為衡量跨國企業集團內各成員於該區應負擔之稅額，GloBE 立法範本進一步規定，按各成員於該區的 GloBE 所得佔比進行分配。計算公式為：「每一集團成員應分攤之補充稅額 = 租稅管轄區補充稅 × (集團成員之 GloBE 所得 / 租稅管轄區內所有集團成員之 GloBE 所得總和)⁴⁶。」

5. 微量排除條款 (De Minimis Exclusion)

當跨國企業集團在一租稅管轄區的平均 GloBE 收入低於 1000 萬歐元，且平

⁴³ 為減輕企業初期負擔設有 10 年過渡期，自實施年度起，薪資部分按 10%、有形資產部分按 8% 計算，並於過渡期間逐年遞減至 5%。GloBE Model Rules, *supra* note 21, arts. 5.3.1- 5.3.4, 9.2.1-9.2.2.

⁴⁴ *Id.* at 119.

⁴⁵ 當期額外補充稅係針對過去幾年的補充稅重新計算後，將以往年度需補繳的補充稅增加至本年度的補充稅額。*Id.* art. 5.2.3 (“The Jurisdictional Top-up Tax for a jurisdiction for a Fiscal Year is equal to the positive amount, if any, compu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following formula: *Jurisdictional Top up Tax = (Top up Tax Percentage x Excess Profit) + Additional Current Top up Tax - Domestic Top up Tax....*”).

⁴⁶ GloBE Model Rules, *supra* note 21, art. 5.2.4.

均 GloBE 所得低於 100 萬歐元或產生 GloBE 損失，申報稅務資訊之集團成員可選擇適用微量排除條款，將該租稅管轄區內所有符合條件之集團成員在該課稅年度之補充稅視為零⁴⁷。

6. 安全港條款 (Safe Harbour)

除了微量排除條款，GloBE 規則亦設計安全港條款以降低該稅制對跨國企業集團與稅捐機關造成之合規與行政負擔。當位於一租稅管轄區的所有集團成員符合安全港條款之條件時，申報財務資訊之集團成員得選擇適用該條款，當年度該租稅管轄區之補充稅應視為零⁴⁸。安全港條款之條件另規定在 OECD 包容性架構發布之「安全港與罰則減免指引文件」中，並持續以行政指引與釋義補充說明之⁴⁹。依 2025 年 5 月發布之「GloBE 規則綜合釋義」，安全港條款之條件分為過渡期國別報告安全港、永久性安全港、QDMTT 安全港與過渡期 UTPR 安全港⁵⁰。

過渡期國別報告安全港係指跨國企業集團於 GloBE 規則施行之前三年過渡期間，租稅管轄區符合下列任一項測試，該地當年度之 GloBE 補充稅應視為零⁵¹。

(1) 微量排除測試：跨國企業集團成員於租稅管轄區的當年度總收入低於 1000 萬歐元，且稅前淨利低於 100 萬歐元或產生損失。與 GloBE 立法範本不同之處在

⁴⁷ 該租稅管轄區之平均 GloBE 收入及所得係採當年度與前兩期財政年度之平均值，若集團成員在前兩期財政年度中，其中一期或兩期財政年度皆未於該租稅管轄區產生 GloBE 收入或損失，該年度可以從平均值計算中排除。GloBE Model Rules, *supra* note 8, arts. 5.5.1-5.5.3.

⁴⁸ GloBE Model Rules, *supra* note 21, art. 8.2.1.

⁴⁹ OECD, Safe Harbours and Penalty Relief: Global Anti-Base Erosion Model Rules (Pillar Two) (2022), <https://www.oecd.org/content/dam/oecd/en/topics/policy-sub-issues/global-minimum-tax/safe-harbours-and-penalty-relief-global-anti-base-erosion-rules-pillar-two.pdf>.

⁵⁰ OECD, Tax Challenges Arising from the Digitalisation of the Economy – Consolidated Commentary to the Global Anti-Base Erosion Model Rules (2025) 321-367 (2025) [hereinafter Consolidated Commentary to Global Model Rules 2025], https://www.oecd.org/content/dam/oecd/en/publications/reports/2025/05/tax-challenges-arising-from-the-digitalisation-of-the-economy-consolidated-commentary-to-the-global-anti-base-erosion-model-rules-2025_be9651c2/a551b351-en.pdf

⁵¹ 過渡條款適用期間係指 2026 年 12 月 31 前開始之會計年度（但年度結束日不應晚於 2028 年 6 月 30 日）。*Id.* at 323.

於，此條款係採合格國別報告之租稅管轄區總收入與稅前淨利額或損失進行計算，無需依 GloBE 立法範本計算 GloBE 收入或損益。

(2) 簡易有效稅率測試：以合格國別報告之稅前淨利或淨損與集團合格財務報表中所得稅費用計算簡易有效稅率。租稅管轄區當年度之簡易有效稅率等於或大於過渡期稅率，即 2023 年與 2024 年達 15%、2025 年達 16%、2026 年達 17%。

(3) 例行性利潤測試：集團成員於租稅管轄區之國別報告稅前淨利等於或低於該地實質性所得排除額。

若不符合過渡期安全港之要件，仍可能符合永久性安全港條款所設條件，該條款主要透過簡易計算（Simplified Calculations）取代 GloBE 立法範本中較為複雜之計算與調整，提供跨國企業集團長期降低合規成本之工具。跨國企業集團成員所在出稅管轄區若符合下列任一項測試，該地當年度之 GloBE 補充稅應視為零⁵²。

(1) 例行性利潤測試：跨國企業集團成員於租稅管轄區之簡易 GloBE 所得等於或低於該地實質性所得排除額。

(2) 微量排除測試：集團成員於租稅管轄區的三年平均簡易 GloBE 收入低於 1000 萬歐元，且平均 GloBE 所得低於 100 萬歐元或產生 GloBE 損失。

(3) 簡易有效稅率測試：租稅管轄區當年度之簡易有效稅率至少 15%。

然而，簡易 GloBE 所得、簡易 GloBE 收入與簡易有效稅率之計算方式與細節仍待 OECD 包容性架構發布行政指引⁵³。在未規範尚不完備的情況下，各國難

⁵² *Id.* at 345.

⁵³ *Id.* at 346.

以根據 GloBE 規則訂定相關規範。

除了過渡期與永久性安全港條款外，針對 QDMTT 與 UTPR 亦設有安全港適用條件。QDMTT 安全港之設計，旨在避免因重複計算補充稅，對跨國企業與稅務主管機關帶來不必要的合規與行政負擔。原則上，依 QDMTT 計算跨國企業集團之國內補充稅後，仍須依 GloBE 規則計算該地補充稅，以確認依國內補充稅額不低於 GloBE 所計算之補充稅額⁵⁴。然而，若租稅管轄區實施的 QDMTT 符合特定標準，例如依據當地財務會計準則計算補充稅、持續監督並維持法規透明性，且計算方法原則上與 GloBE 規則一致，則該地依 GloBE 規則計算的補充稅額應視為零⁵⁵。

至於過渡期 UTPR 安全港，主要為因應 GloBE 規則補充稅課稅原則的調整。由於 UPE 所在租稅管轄區在尚未實施 QDMTT 前，該跨國企業集團成員於境內產生之低稅負利潤，可能由其他國家透過 UTPR 課徵補充稅。然而，UPE 所在地通常掌控集團大部分經營與獲利，其低稅負所得若被分攤至他國課稅，容易產生稅負與實質經濟活動不相稱的問題⁵⁶。為降低 GloBE 規則實施初期之風險與壓力，於 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開始並於 2026 年 12 月 31 日之前結束、未逾 12 個月的過渡期間，若 UPE 所在地之企業所得稅名目稅率達 20%，則該地跨國企業集團成員之 UTPR 補充稅應視為零⁵⁷。

（六）補充稅課稅原則

GloBE 規則之課稅機制由「所得涵蓋原則（Income Inclusion Rule, IIR）」及「徵稅不足之支出原則（Under-taxed Payments Rule, UTPR）」構成。當跨國企業集團成員於一租稅管轄區之有效稅率低於最低稅率 15%，應優先由其母公司所

⁵⁴ *Id.* at 353.

⁵⁵ *Id.* at 356; GloBE Model Rules, *supra* note 21, art. 8.2.1.

⁵⁶ *Id.* at 366.

⁵⁷ *Id.*

在租稅管轄區依 IIR 對位於低稅負租稅管轄區之集團成員課徵補充稅。補充稅之分配依 IIR 所規範之由上到下課稅原則 (top-down approach) 及分離所有權原則 (split-ownership rules) 決定。UTPR 則作為 IIR 之補充機制，若母公司所在地未實施合格 IIR，則由其他實施 UTPR 的租稅管轄區，透過拒絕抵減或加計所得等方式，對其境內集團成員課徵剩餘補充稅，以確保全球最低稅負的實現。

1. IIR 補充稅之課稅與分配機制

當跨國企業集團成員位於低稅負租稅管轄區時，應優先由母公司所在地依 IIR 原則課徵補充稅。IIR 採由上至下課稅方法，先由最終母公司 (Ultimate Parent Entity, UPE) 依其對低稅負集團成員持有之所有權權益比例 (Inclusion Ratio) 負擔補充稅⁵⁸，如 UPE 未實施合格 IIR，則由所有權結構次一層級且適用合格 IIR 的中間母公司負擔補充稅⁵⁹。若存在多個中間母公司皆適用合格 IIR，則各依其持股比例負責相應補充稅額⁶⁰。此外，當中間母公司已依合格 IIR 就其持有之低稅負集團成員課徵補充稅時，則為避免重複課稅，上層母公司負擔之補充稅額應扣除下層母公司已負擔的部分，避免重複課稅⁶¹。

當低稅負集團成員非由跨國企業集團全資持有，而是由部分控股母公司 (Partially-Owned Parent Entity, POPE) 持有時，即構成「分離所有權結構」。在此情況下，部分控股母公司應優先適用 IIR，並依其對低稅負集團成員之所有權權益比例負擔補充稅⁶²；若已依合格 IIR 繳納，則其上層母公司計算自身應納補

⁵⁸ GloBE Model Rules, *supra* note 21, arts. 2.1.1, 2.1.6. 所有權權益係指集團成員對另一集團成員具有之股本性權益，包括對該成員盈餘、資本或準備金之權利，例如股份、合夥權益與信託受益權。Commentary to GloBE Model Rules, *supra* note 26, at 206-207.

⁵⁹ GloBE Model Rules, *supra* note 21, art. 2.1.3.

⁶⁰ *Id.* arts. 2.1.2-2.1.3.

⁶¹ GloBE Model Rules, *supra* note 21, art. 2.3.1.

⁶² Commentary to GloBE Model Rules, *supra* note 26, at 25. 部分控股母公司係指同屬跨國企業集團，且非最終母公司、常設機構或投資機構之成員，其直接或間接持有其他集團成員之所有權權益，並且該公司自身 20% 以上之所有權權益係由不屬於該集團之第三方直接或間接持有者。GloBE Model Rules, *supra* note 21, arts. 2.1.4, 10.1.1.

充稅時，應扣除 POPE 已負擔之部分⁶³。

所有權權益比例反映母公司對低集團成員 GloBE 所得之實際經濟利益，即該母公司在該財政年度中應就其應稅利益負擔之稅負義務。其計算公式為：「 $\text{母公司補充稅負擔稅額} = \text{低稅負集團成員補充稅} \times \text{母公司對該成員之所有權權益比例}$ ⁶⁴。」

母公司所有權權益比例的計算方式，係以低稅負集團成員該年度之 GloBE 所得，扣除其中屬於其他所有者的部分為分子；分母則為該成員之 GloBE 所得總額⁶⁵。若低稅負集團成員由集團 100% 持股，比例為 1，無須進行額外計算；惟如存在非集團成員持股者，則應依會計準則假設其 GloBE 所得與財報淨利一致，並以合併財報方式衡量其他持股者應享比例，以準確計算各母公司之補充稅負擔⁶⁶。

2. UTPR 補充稅之課稅與分配機制

為補足僅依 IIR 課徵補充稅出現之漏洞，GloBE 規則另設計 UTPR，作為 IIR 的備援，以確保低稅負所得皆得納入課稅。

當最終母公司對低稅負集團成員之所有權權益，皆透過一個或多個適用合格 IIR 的母公司直接或間接持有，該成員之補充稅額應全數由母公司所在地依 IIR 課徵，不納入 UTPR 補充稅總額計算⁶⁷。然而，若該低稅負集團成員之所有權僅部分由適用合格 IIR 的母公司持有，其餘權益由未施行 IIR 之母公司或最終母公司持有，該成員之補充稅額應先扣除已由 IIR 課徵之部分，再納入 UTPR 補充稅

⁶³ GloBE Model Rules, *supra* note 21, art. 2.3.1.

⁶⁴ GloBE Model Rules, *supra* note 21, art. 2.2.1.

⁶⁵ GloBE Model Rules, *supra* note 21, art. 2.2.2.

⁶⁶ GloBE Model Rules, *supra* note 21, art. 2.2.3; Commentary to GloBE Model Rules, *supra* note 26, at 29.

⁶⁷ GloBE Model Rules, *supra* note 21, art. 2.5.2; Commentary to GloBE Model Rules, *supra* note 26, at 37-38.

總額計算⁶⁸。經此方式調整後，加總各低稅負集團成員之補充稅，即為跨國企業集團之 UTPR 補充稅總額⁶⁹。此一設計反映 GloBE 規則中 IIR 優先適用於 UTPR 的基本課稅原則。

跨國企業集團之 UTPR 補充稅總額將依成員於各實施合格 UTPR 租稅管轄區之實質營運活動比例進行分配。具體而言，分配標準係根據各管轄區內集團成員的員工人數及有形資產帳面價值，分別占有所有實施 UTPR 管轄區總員工人數及總資產價值的比例，並各賦予 50% 權重。

該計算公式為：各租稅管轄區之 UTPR 補充稅 = UTPR 補充稅總額 $\times$ (50% $\times$ 該區員工人數 / 所有 UTPR 租稅管轄區員工人數 + 50% $\times$ 該區有形資產帳面價值 / 所有 UTPR 租稅管轄區有形資產帳面價值)⁷⁰。

此分配機制反映 OECD 強調之「以實質活動為基礎的稅負能力」，目的在於將補充稅分配予具相對較高實質活動與租稅承擔能力的租稅管轄區，避免將稅負分配予無法實際課徵之地區⁷¹。

實施合格 UTPR 之租稅管轄區將依其獲分配之補充稅額，對其境內集團成員課徵額外稅負，課徵方式包括拒絕費用扣抵、加計所得等⁷²。此課稅機制並不要求課稅國與低稅負集團成員間具實際交易或課稅之聯繫因素 (nexus)，即使雙方不存在任何交易或支付關係，仍得對該國境內其他集團成員課徵補充稅額⁷³。

至於補充稅應如何分配予境內集團成員，GloBE 規則未明文規定，實施

⁶⁸ GloBE Model Rules, *supra* note 21, art. 2.5.3; Commentary to GloBE Model Rules, *supra* note 26, at 38.

⁶⁹ GloBE Model Rules, *supra* note 21, art. 2.5.1.

⁷⁰ Commentary to GloBE Model Rules, *supra* note 26, at 39.

⁷¹ *Id.*

⁷² 拒絕費用扣抵或加計所得產生之現金稅費增加額等於分配予租稅管轄區之 UTPR 補充稅額。*Id.* art. 2.4.1.

⁷³ Commentary to GloBE Model Rules, *supra* note 26, at 32.

UTPR 之租稅管轄區應依其國內法定設計相關規範，以確保與既有稅制協調一致。例如，一國可規定由一個或數個集團成員承擔補充稅額，並依其是否採行合併申報所得稅的方式，決定課稅層級，以提升實務可行性並減少重複課稅風險⁷⁴。

二、QDMTT、IIR 及 UTPR 之適用順序

GloBE 規則透過 IIR 及 UTPR 建立了補充稅之課稅機制，以此分配跨國企業集團之納稅義務及租稅管轄區之課稅權。除 IIR 及 UTPR 外，OECD 允許各國依其經濟發展與產業結構實施 QDMTT，此類國內補充稅可抵減 GloBE 規則之補充稅⁷⁵。是以，全球最低稅負係 QDMTT、IIR、UTPR 依 GloBE 立法範本所訂之順序，適用於跨國企業集團之結果。當一租稅管轄區存在優先適用之合格（qualified）規則時，另一租稅管轄區適用之規則將會失效。而所謂 QDMTT、合格 IIR 及合格 UTPR 在 GloBE 立法範本中皆有定義，並輔以行政指引與釋義說明之。

（一）QDMTT

國內最低稅負制係租稅管轄區透過國內法對境內有效稅率低於 15% 之跨國企業集團成員課徵補充稅之稅制。各租稅管轄區實施之國內最低補充稅制需滿足三項要件，該稅制課徵之補充稅始得抵減 GloBE 補充稅。其一為該稅制以與 GloBE 規則相同的方式計算租稅管轄區內集團成員之超額利潤；其二，該稅制就前開超額利潤對集團成員課徵最低稅負；其三，該稅制之實施與執行方式需與適用 GloBE 規則與釋義之結果一致，包括禁止租稅管轄區提供與國內最低稅負相關之利益⁷⁶。故在立法設計上，各租稅管轄區之國內最低稅負制需採取與 GloBE

⁷⁴ *Id.* at 33.

⁷⁵ GloBE Model Rules, *supra* note 21, arts. 5.2.3.

⁷⁶ GloBE Model Rules, *supra* note 21, art. 10.1.1 (“Qualified Domestic Minimum Top-up Tax means a minimum tax that is included in the domestic law of a jurisdiction and that: (a) determines the Excess Profits of the Constituent Entities located in the jurisdiction (domestic Excess Profits) in a manner that

規則實質相同 (functionally equivalent) 之架構與機制，且課徵之國內補充稅不得低於依 GloBE 規則計算之補充稅⁷⁷。

(二) 合格 IIR 及 UTPR

合格 IIR 及 UTPR 之定義相似，前者係指相當於 GloBE 立法範本第 2.1 條至第 2.3 條 (IIR 之適用與 IIR 補充稅額分配規範) 之規則，並由租稅管轄區國內法實施之，後者則是指相當於 GloBE 立法範本第 2.4 條至第 2.6 條 (UTPR 之適用、UTPR 之補充稅及稅額分配規範) 之規則，並由租稅管轄區國內法實施之。兩者之實施與執行方式需與 GloBE 規則與釋義所規範的結果一致，且租稅管轄區不得提供與 IIR 及 UTPR 規則相關之利益⁷⁸。

is equivalent to the GloBE Rules; (b) operates to increase domestic tax liability with respect to domestic Excess Profits to the Minimum Rate for the jurisdiction and Constituent Entities for a Fiscal Year; and (c) is implemented and administered in a way that is consistent with the outcomes provided for under the GloBE Rules and the Commentary, provided that such jurisdiction does not provide any benefits that are related to such rules.”); OECD, Tax Challenges Arising from the Digitalisation of the Economy – Administrative Guidance on the Global Anti- Base Erosion Model Rules (Pillar Two) 99 (2023) [hereinafter Administrative Guidance on GloBE Model Rules],

<https://www.oecd.org/tax/beps/agreed-administrative-guidance-for-the-pillar-two-globe-rules.pdf>.

⁷⁷ Administrative Guidance on GloBE Model Rules, *supra* note 76, at 99, 107 (“Some degree of customisation of a QDMTT in each jurisdiction is to be expected. Any deviation from the GloBE Rules, however, shall be justified in the context of the jurisdiction’s domestic tax system and shall not result in inconsistent outcomes.... In designing a QDMT a jurisdiction will wish to consider how its domestic tax laws will interact with various provisions of the QDMTT and ensure that these interactions will produce functionally equivalent outcomes... To be functionally equivalent, the tax rate applicable under a QDMTT must equal or exceed the Minimum Rate. Otherwise, the tax collected would consistently fall short of the GloBE Top-up Tax.”).

⁷⁸ GloBE Model Rules, *supra* note 21, art. 10.1.1 (“Qualified IIR means a set of rules equivalent to Article 2.1 to Article 2.3 of the GloBE Rules (including any provisions of the GloBE Rules associated with those articles) that are included in the domestic law of a jurisdiction and that are implemented and administered in a way that is consistent with the outcomes provided for under the GloBE Rules and the Commentary provided that such jurisdiction does not provide any benefits that are related to such rules.... Qualified UTPR means a set of rules equivalent to Article 2.4 to Article 2.6 of the GloBE Rules (including any provisions of the GloBE Rules associated with those articles) that are included in the domestic law of a jurisdiction and that are implemented and administered in a way that is consistent with the outcomes provided for under the GloBE Rules and the Commentary provided that such jurisdiction does not provide any benefits that are related to such rules.”). 租稅管轄區提供利益的形式包括租稅優惠、津貼、補助等。舉例來說，假設一租稅管轄區立法通過 GloBE 規則之所有規範，包括第 2.1 條。然而，此租稅管轄區提供企業租稅抵免，抵免額相當於企業在 IIR 規範下需繳納之稅額，並用於扣抵其他稅額。在此種情況下，該租稅管轄區未採用合格 IIR。Commentary to GloBE Model Rules, *supra* note 26, at 213.

(三) 適用順序

如圖 2-1 所示，實施 QDMTT 之低稅負租稅管轄區有權對其管轄區內有效稅率低於 15% 的跨國企業集團成員課徵補充稅。若低稅負租稅管轄區未實施 QDMTT，補充稅之課稅權將分配給實施合格 IIR 的 UPE 所在租稅管轄區，UPE 負補充稅繳納義務。如 UPE 所在租稅管轄區未實施合格 IIR，則按由上至下方法，由所有權結構次一層且所在租稅管轄區實施合格 IIR 的中間母公司繳納補充稅。最後，若 QDMTT 及合格 IIR 皆不適用跨國企業之低稅所得，則由實施合格 UTPR 之租稅管轄區課徵補充稅。各 UTPR 租稅管轄區分配到的補充稅額係基於跨國企業集團成員於該租稅管轄區的實質營運活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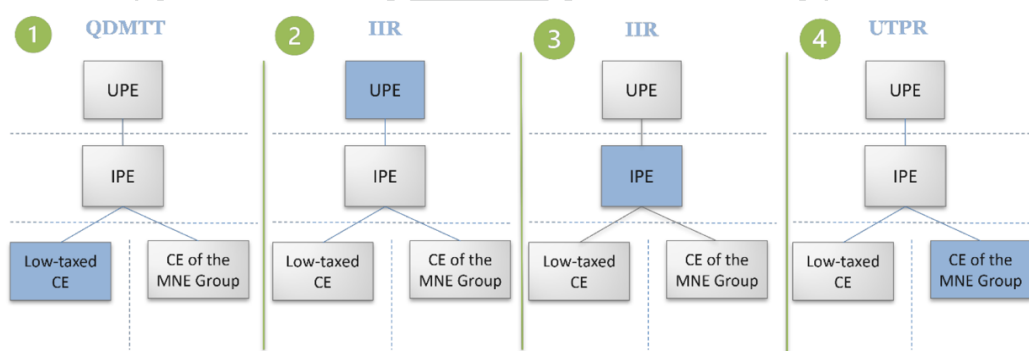


圖 2-1：QDMTT、合格 IIR 及合格 UTPR 之適用順序

(資料來源：OECD, Minimum Tax Implementation Handbook, 2023)

三、GloBE 規則之適用效力

雖然 GloBE 規則旨在透過 QDMTT、IIR、UTPR 之適用順序，實現跨國企業集團無論於何地設立公司，均負擔至少 15% 有效稅率的目標，但其本身非具有法律效力的多邊協定，而是 OECD 包容性架構成員為解決數位化經濟所引發的稅收挑戰而達成的共識方案，必須經由各國立法施行。

依 OECD 於 2021 年 10 月發布的雙支柱聲明，GloBE 規則以「共同方法（common approach）」運作。包容性架構成員無需立法實施 GloBE 規則，但需接受其他成員實施該規則的課稅結果；若成員選擇立法實施 GloBE 規則，則應採用與 GloBE 立法範本、釋義及行政指引一致的施行方式⁷⁹。

各國可依國內既有稅制與行政實務，選擇不同的立法模式將 GloBE 規則納入國內法。例如，將 GloBE 立法範本轉化為國內法律架構與用語；在國內法中直接引用 GloBE 規則立法範本與釋義，使之成為國內法的一部分；或僅在法律層面規定 GloBE 規則的核心內容，再授權行政機關以命令或細則補充細節⁸⁰。此實施方式雖有助於與國內稅制整合，但也可能因各國在解釋與適用上的差異，導致補充稅額計算結果不一致，甚至引發雙重課稅風險。

為確保各國立法符合 GloBE 立法範本、釋義與行政指引，OECD 透過包容性架構建立同儕審查程序，對各國實施的 IIR、UTPR 與國內最低補充稅制（Domestic Minimum Top Up Tax）進行全面立法審查與持續監督，以判定其是否為合格規則⁸¹。然而，短期內難以完成對所有立法的全面性立法審查與監督，包容性架構因此設置過渡性審查程序，在展開更詳盡的全面審查前，先以過渡性審查程序評估各國立法的合格狀態⁸²。

⁷⁹ Statement on Two-Pillar Solution, *supra* note 18, at 3.

⁸⁰ OECD, MINIMUM TAX IMPLEMENTATION HANDBOOK (PILLAR TWO) 27-28 (2023) [hereinafter MINIMUM TAX IMPLEMENTATION HANDBOOK], <https://www.oecd.org/content/dam/oecd/en/topics/policy-sub-issues/global-minimum-tax/minimum-tax-implementation-handbook-pillar-two.pdf>.

⁸¹ *International Tax Reform: OECD/G20 Inclusive Framework Releases New Information on Key Aspects of the Two-Pillar Solution*, OECD (Dec. 18, 2023), <https://www.oecd.org/en/about/news/announcements/2023/12/oecd-g20-inclusive-framework-releases-new-information-on-key-aspects-of-the-two-pillar-solution.html>.

⁸² *Qualified Status Under the Global Minimum Tax*, OECD, <https://www.oecd.org/content/dam/oecd/en/topics/policy-sub-issues/global-minimum-tax/qualified-status-under-the-global-minimum-tax-questions-and-answers.pdf> (last updated Jan., 2025).

(一) 過渡性審查程序

過渡性審查程序係基於自我證明 (self-certification)，由實施 GloBE 規則之租稅管轄區提交與支柱二相關之國內法資料予 OECD 秘書處，並由包容性架構成員針對前開租稅管轄區之立法提出問題。若無問題，該租稅管轄區取得過渡性合格狀態 (transitional qualified status)；反之，若包容性架構成員仍有疑義，且工作小組表決認為租稅管轄區之立法非合格規則，該立法不具過渡性合格狀態。其後，包容性架構將發布中央紀錄 (Central Record)，列出具有過渡性合格立法狀態之租稅管轄區名單⁸³。

(二) 全面立法審查程序

全面立法審查程序則預計於 GloBE 規則立法生效後，兩年內實施。一旦租稅管轄區之立法完成全面性審查程序，該立法之過渡性合格狀態自動終止，惟截至 2025 年 7 月 OECD 未就永久性審查程序發布相關施程序及細節⁸⁴。

第三節 GloBE 規則之實施現況與挑戰

OECD 於 2021 年發布之雙支柱方案中，建議包容性架構成員自 2023 年起逐步實施 IIR，並自 2024 年起推行 UTPR⁸⁵。截至 2025 年 8 月，多數歐盟成員國、英國及部分亞太經濟體已完成立法並陸續施行 IIR、UTPR 或 QDMTT，另有部分國家仍處於草案或公開諮詢階段。然而，美國、中國與印度等全球主要經濟體迄未採行 GloBE 規則，尤以美國在 2025 年重新調整對 OECD 稅改之立場，更為該規則的落實帶來重大不確定性。整體而言，GloBE 規則的實施狀況可謂「部分推進、部分停滯」，反映制度落實與國際政治經濟力量交互影響之結果。

⁸³ *Id.*

⁸⁴ *Id.*

⁸⁵ Statement on Two-Pillar Solution, *supra* note 18.

為釐清 GloBE 規則施行的進展與挑戰，本節將首先說明各租稅管轄區之立法進程與過渡性合格狀態，其次分析主要經濟體未採行 GloBE 規則的原因與影響，最後評估該制度在推行過程中所面臨的挑戰與缺陷。

一、租稅管轄區之立法進程

（一）已立法及擬立法施行之租稅管轄區

自 OECD 包容性架構於 2021 年公布 GloBE 規則立法範本以來，各租稅管轄區陸續立法納入 GloBE 規則。截至 2025 年 8 月，已有 55 個租稅管轄區正式施行 IIR、UTPR 或 QDMTT，包括多數歐盟成員國、英國、南韓、日本、越南、馬來西亞、加拿大、澳洲、新加坡、泰國、香港、印尼、紐西蘭等。部分租稅管轄區已立法但尚未生效，包括以色列、冰島、烏拉圭、百慕達等。其餘有意實施 GloBE 規則但尚處於預算案、立法草案或公開諮詢階段等立法階段的租稅管轄區包括立陶宛與位於位於加勒比海的古拉索⁸⁶。

值得注意的是，歐盟成員國之立法，係由歐盟於 2022 年通過《全球最低稅負制指令》，統一要求歐盟成員國於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執行之⁸⁷。該指令的通過意味著最低稅負制成為歐盟法的一部份，成員國應將指令規範納入國內法，分別自 2023 年 12 月 31 日起及 2024 年 12 月 31 日起實施 IIR 及 UTPR⁸⁸，各成員國得決定是否實施 QDMTT⁸⁹。截至 2025 年 8 月，共有 22 個歐盟成員國完成實施歐盟最低稅負指令所需之國內立法程序⁹⁰。其他成員國因國內跨國企業集團最終母公司之數量低於 12 個，得將 IIR 與 UTPR 之實施日期延至 2029 年 12 月 31

⁸⁶ PwC's Pillar Two Country Tracker, PwC, <https://www.pwc.com/gx/en/tax/international-tax-planning/pillar-two/pwc-pillar-two-tracker-full-data-v2.pdf> (last updated Aug. 6, 2025).

⁸⁷ Council Directive (EU) 2022/2523 of 14 December 2022 on Ensuring a Global Minimum Level of Taxation for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Groups and Large-Scale Domestic Groups in the Union, art. 56, 2022 O.J. (L328), 1, 57 [hereinafter EU Global Minimum Tax Directive].

⁸⁸ *Id.* pmbl. 29, at 6.

⁸⁹ *Id.* art. 11.

⁹⁰ PwC's Pillar Two Country Tracker, *supra* note 86.

日⁹¹。

(二) 取得過渡性合格狀態之租稅管轄區名單

租稅管轄區之 GloBE 規則立法須進一步通過同儕審查程序，以證明其 IIR、UTPR 與 DMTT 為合格規則。由於 OECD 包容性架構尚未建立全面立法審查制度，目前採「過渡性審查程序」評估各租稅管轄區立法之合格狀態。取得過渡性合格狀態後，該租稅管轄區立法在國際間被視為合格規則，並可依 GloBE 規則的課稅順序行使課稅權。

根據 OECD 官網發布之中央紀錄，截至 2025 年 3 月 31 日為止，具有合格 IIR 與 DMTT 的租稅管轄區名單如下：

表 2-1：具過渡性合格狀態之租稅管轄區立法

租稅管轄區	合格 IIR	合格 DMTT
澳洲	v	v
奧地利	v	v
巴貝多	無 IIR	v
比利時	v	v
保加利亞	v	v
加拿大	v	v
克羅埃西亞	v	v
捷克	v	v
丹麥	v	v

⁹¹ EU Global Minimum Tax Directive, *supra* note 87, art. 50.1; Commission Notice, Election to Delay Application of the IIR and UTPR Under Article 50 of the Pillar Two Directive 2023 O.J. (C/2023/1536). 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馬爾他與斯洛伐克根據《最低稅負制指令》第 50 條通知歐盟執委會延後適用 IIR 與 UTPR。

芬蘭	v	v
法國	v	v
德國	v	v
希臘	v	v
根西	v	v
匈牙利	v	v
愛爾蘭	v	v
義大利	v	v
日本	v	DMTT 自 2026 年生效
南韓	v	無 DMTT
列支敦斯登	v	v
盧森堡	v	v
荷蘭	v	v
挪威	v	v
羅馬尼亞	v	v
斯洛伐克共和國	延後實施 IIR	v
斯洛維尼亞	v	v
西班牙	v	v
瑞典	v	v
瑞士	IIR 自 2025 年生效	v
土耳其	v	v
英國	v	v
越南	v	v

(資料來源： *Central Record of Legislation with Transitional Qualified*, OECD, Mar. 31, 2025)

由於多數租稅管轄區在推行 GloBE 規則時，普遍先實施 IIR 或 QDMTT，並將 UTPR 的生效時間延至 2025 年或更晚。例如，多數歐盟成員國、英國、南韓、泰國之 UTPR 均自 2025 年起適用，部分國家則規劃於 2026 年或之後的財政年度生效⁹²。因此，2025 年初更新的中央紀錄僅列有合格 IIR 與 DMTT。此外，未列入中央紀錄的立法並不必然代表其不合格，而可能是因為尚未啟動或完成過渡性審查程序，未來仍有可能取得合格狀態⁹³。

(三) 尚未立法施行之全球主要經濟體

截至目前，全球主要經濟體中的美國、印度與中國均未立法施行 GloBE 規則，儘管這些國家早在 2021 年 10 月即與多數包容性架構成員就雙支柱方案達成共識。

美國方面，川普總統於 2025 年 1 月上任後，隨即取消拜登政府推行的多項政策，並發布備忘錄說明 OECD 全球租稅協議在美國不具任何效力。川普政府認為，該協議不僅容許他國對美國所得為域外管轄 (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亦限制美國制定有利於本國企業與工人利益之稅收政策空間。因此，美國將審查各國是否制定或有意制定具有域外效力，或對美國企業產生不成比例影響的稅收規則，並考慮採取報復性措施因應⁹⁴。此舉等同於美國退出雙支柱國際稅務改革

⁹² PwC's Pillar Two Country Tracker, *supra* note 86.

⁹³ *Central Record of Legislation with Transitional Qualified*, OECD (Mar. 31, 2025), <https://www.oecd.org/en/topics/sub-issues/global-minimum-tax/central-record-of-legislation-with-transitional-qualified-status.html#qualified-income-inclusion-rules>.

⁹⁴ *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Global Tax Deal (Global Tax Deal)*, The White House (Jan. 20,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5/01/the-organization-for-economic-co-operation-and-development-oecd-global-tax-deal-global-tax-deal/>.

政策⁹⁵。

2025 年 5 月，美國眾議院通過「大而美法案 (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其中的 899 條款規定，若他國政府對美國企業實施「不公平外國稅制 (Unfair Foreign Taxes)」，美國政府將對該國個人與企業源自美國之所得，課徵最高 20% 的報復性附加稅，並將 UTPR 明確列為「不公平外國稅制」⁹⁶。同年 6 月，美國與七大工業國組織 (G7) 達成協議，G7 於聲明中支持美國提出的「併行制度 (side by side)」，承認美國現行稅制可與包容性架構推行之國際稅制改革並行運作，為未來的國際稅收體系提供更大的穩定性與確定性。該制度將豁免美國母公司的跨國企業集團適用 IIR 與 UTPR，作為交換，美國政府同意消除 899 條款對 GloBE 規則實施國構成的威脅⁹⁷。2025 年 7 月 4 日，川普總統正式簽署「大而美法案」，並移除 899 條款⁹⁸。然而，GloBE 規則已在多國立法施行，美國與 G7 達成之協議將勢必對其實施方式產生重大影響，因此仍須過 OECD 包容性架構進一步協商，以達成各方均可接受的解決方案，並視需要調整相關立法與行政指引。目前，具體時程與影響範圍仍屬未知⁹⁹。

在此背景下，中國與印度可能持續維持觀望態度，傾向先評估美國與 G7 達成協議對 GloBE 規則之影響，再決定是否採行相關立法¹⁰⁰。

⁹⁵ 丁傳倫、廖月波，川普上任宣布退出 OECD 全球最低企業稅率協議及威脅課徵三國高關稅，KPMG，2025 年 1 月 23 日，<https://kpmg.com/tw/zh/home/media/press-releases/2025/01/trump-executive-orders.html>。

⁹⁶ 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 H.R. 1, 119th Cong. § 899 (2025) (Engrossed in House).

⁹⁷ G7 Statement on Global Minimum Tax, U.S. DEP'T OF THE TREASURY (June 28, 2025), <https://home.treasury.gov/news/press-releases/sb0181>.

⁹⁸ 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 Pub. L. No. 119-21, 139 Stat. 72 (2025).

⁹⁹ G7 Statement on Global Minimum Tax, supra note 97.

¹⁰⁰ Mimi Chan, Pillar Two: A U-turn for US-parented Groups?, PKF LITTLEJOHN (July 21, 2025), <https://www.pkf-l.com/insights/pillar-two-us-parented-groups-u-turn/>.

三、GloBE 規則之實施挑戰與制度缺陷

(一) 共同方法下之碎裂化問題

GloBE 規則欲有效實施，須仰賴多數租稅管轄區立法推行 QDMTT、IIR 與 UTPR，使跨國企業無論位於何地，皆需負擔 15% 的最低稅負。其中，主要經濟體之參與尤為關鍵，因其往往為大型跨國企業母公司、子公司或常設機構所在地¹⁰¹。

然而，GloBE 規則係透過「共同方法」推行，OECD 包容性架構成員並無義務採行，即便決定採行，也不必於相同時點或依相同條文落實。結果導致主要經濟體如美國、中國與印度至今仍未立法，而已採行的租稅管轄區則出現立法與生效時程不一的情況，部分於 2024 年生效，部分於 2025 年或之後的財政年度生效，甚至在解釋與適用細節上也可能不一致。此種碎裂化 (fragmented) 的狀態，不僅顯著削弱制度之有效性，亦增加跨國企業的合規成本與不確定性¹⁰²。

(二) 美國與 G7 決議導致不確定性

美國的立場更進一步加深了 GloBE 規則實施的不確定性。2025 年 6 月底，美國與 G7 達成協議，將豁免美國母公司之跨國企業集團適用 IIR 與 UTPR，理由在於其已受美國既有的最低稅負制度規範，例如「全球無形資產低稅負所得 (Global Intangible Low-Taxed Income, GILTI)」稅制¹⁰³。GILTI 稅制旨在對美國企業持有的受控外國公司 (Controlled Foreign Company, CFC) 之超額利潤課稅，

¹⁰¹ João Velez de Lima et al., *US Pillar Two Stance: Tax Competitiveness Challenges for Portugal and the EU*, INTERNATIONAL TAX REVIEW (Apr. 10, 2025), <https://www.internationaltaxreview.com/article/2enj4tq7c1sn1bsn7y8/sponsored/us-pillar-two-stance-tax-competitiveness-challenges-for-portugal-and-the-eu>.

¹⁰² Nadya Britton, *Pillar 2 and US Multinationals: Decoding the G7 Announcement*, THOMSON REUTERS (Aug. 1, 2025), <https://www.thomsonreuters.com/en-us/posts/corporates/pillar-2-g7-announcement/>.

¹⁰³ G7 Statement on Global Minimum Tax, *supra* note 97.

以防止企業將利潤轉移至低稅負國家以規避稅負。

2025 年 7 月 4 日，由美國總統川普簽署「大而美法案」，對 GILTI 稅制進行革新與修正，並更名為「淨受控外國公司測試所得」(Net CFC Tested Income, NCTI)。修法後，NCTI 擴大課稅基礎，取消原本可扣除的有形資產報酬(Qualified Business Asset Investment) 10%排除額，將所有來自海外子公司的所得納入課稅範圍。同時，將第 250 條的 50% 稅額扣除 (Section 250 deduction) 降至 40%，外國稅額抵免則從 20%降至 10%；利息與研發費用亦不得再分攤至 NCTI，僅能扣除與特定收入「直接相關」的支出。經此調整後，NCTI 的公司層級有效稅率提高至 12.6%，若考慮外國稅額抵免限制，總體稅負約 14%¹⁰⁴。

然而，即便 NCTI 提高有效稅率至 14%，其計算方式仍與 GloBE 規則不同。NCTI 採全球來源合計 (global blending) 計算，而非依各租稅管轄區分別計算有效稅率，與 GloBE 規則所要求的「各管轄區應達到 15% 稅率」標準不一致¹⁰⁵。因此，美國是否能透過 NCTI 等稅制，獲得 OECD 包容性架構成員普遍接受，仍具高度不確定性¹⁰⁶。

歐盟早在 2022 年就將 GloBE 規則納入歐盟法架構，美國與 G7 協議勢必對其稅制構成重大影響。2025 年 7 月 1 日，歐盟執委會表示該協議不會導致修正《全球最低稅負制指令》，將透過安全港條款落實對美國企業的豁免。然而，該協議在歐洲內部引發爭議，部分歐洲議會黨團批評作為 G7 成員之歐盟國「背叛租稅正義」。有學者指出，若美國企業不適用 GloBE 規則而享有較低稅負，將削弱歐盟企業的競爭力，使歐盟透過稅制改革及投資誘因提升競爭力的政策，受到

¹⁰⁴ 黃士洲，川普大而美法案的稅務簡介，產業雜誌，665 期，頁 71 (2025)。

¹⁰⁵ Miles Humphrey & Ethan Kroll, *How the OBBBA's International Provisions Interact with Pillar Two*, BAKER MCKENZIE (July 18, 2025), <https://www.bakermckenzie.com/en/insight/publications/2025/07/how-the-obbbas-international-provisions-interact-with-pillar-two>.

¹⁰⁶ Pascal Saint-Amans, *The Implications of G7 Agreement on the Global Minimum Tax*, BRUEGEL (June 30, 2025), <https://www.bruegel.org/first-glance/implications-g7-agreement-global-minimum-tax>.

GloBE 規則最低稅負要求的限制，而無法完全發揮效果，甚至動搖歐盟內部持續推行支柱二的決心¹⁰⁷。此外，德國內部對支柱二的推行也存在分歧。德國總理曾呼籲暫停該稅制，但財務部長則表示德國將支持全球最低稅制，並將全力維持該計畫¹⁰⁸。

整體而言，仍待包容性架構成員就該協議取得共識，GloBE 規則是否將與美國稅制並行，或在無法達成共識的情況下暫停甚至終止施行，仍不明朗。尚未立法的租稅管轄區可能因此採取觀望態度，不願貿然推行；已立法的國家則須視包容性架構成員是否達成共識，可能需要進行修法或調整。此一不確定性不僅對制度的有效性與持續推行構成挑戰，也影響跨國企業與投資人對該稅制的預期及投資策略。

（三）UTPR 之域外管轄爭議

GloBE 規則中的 UTPR 課稅原則，亦受到許多稅法學者質疑其在國際租稅法下之適法性。依 GloBE 立法範本規定，跨國企業集團應負擔之補充稅，經 QDMTT 與 IIR 分配後若仍有未課徵者，將分配至實施 UTPR 的租稅管轄區。然而，其分配基礎並非來自課稅地與所得之聯繫因素，而是依據跨國企業集團成員於該租稅管轄區的員工人數與有形資產比例計算¹⁰⁹。

在此架構下，即便被課徵補充稅之低稅所得並非由該國境內之集團成員直接或間接所有，仍可能因 UTPR 機制而負擔補稅義務。此設計被諸多學者批評具

¹⁰⁷ Maarten de Wilde, *After the Pillars: A Call for A European Corporate Tax 2.0*, KLUWER INTERNATIONAL TAX BLOG (July 17, 2025), <https://legalblogs.wolterskluwer.com/international-tax-law-blog/after-the-pillars-a-call-for-a-european-corporate-tax-20/>.

¹⁰⁸ *Weekly Tax News*, EUROPEAN TAX ADVISER FEDERATION (July 7, 2025), <https://etaf.tax/weekly-tax-news-monday-7-july-2025/>.

¹⁰⁹ Błażej Kuźniacki, *Pillar 2 and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QDMTT Payable' Seals an Internationally Wrongful Act*, TAX NOTES (Oct. 9, 2023), <https://www.taxnotes.com/special-reports/oecd-pillar-2-global-minimum-tax/pillar-2-and-international-investment-agreements-qdmtt-payable-seals-internationally-wrongful-act/2023/10/06/7hdgl>.

有域外效力，背離國際租稅法中判斷租稅管轄權普遍依循的「聯繫因素」原則¹¹⁰。

（四）同儕審查程序尚不完備

同儕審查程序係用以評估各國 GloBE 規則立法是否屬合格規則之機制。全面性立法審查程序預計於各國立法生效兩年內展開，惟 OECD 迄今仍未公布相具體施程序與細節。目前僅能透過過渡性審查程序進行評估。惟過渡性審查機制屬於簡化程序，標準相對寬鬆，即便立法與 GloBE 規則存在輕微差異，實施國仍得以「自我認證」方式取得合格地位，僅需承諾在約定期限內修正。此外，當包容性架構成員對租稅管轄區立法提出質疑，若未能形成共識，該立法仍被視為合格，僅需提前納入全面審查程序¹¹¹。此過於寬鬆的審查設計，可能導致各國立法在適用與解釋上出現差異，使跨國企業在不同租稅管轄區面臨補充稅計算不一致的風險並增加合規成本。

綜上，GloBE 規則在制度設計與執行層面皆存有挑戰，不僅削弱其有效性與可預測性，也可能衝擊各國租稅管轄權與經濟利益。同時，跨國企業在不同管轄區適用 GloBE 規則時，也可能因立法差異而承受過重的合規成本與法律不確定性。進一步而言，隨著各國逐步推行相關規則，這些爭議已不再侷限於稅法領域，而可能延伸至國際投資法層面，對投資人權益與地主國措施之適法性構成新的挑戰。

第四節、GloBE 規則下可能引發投資爭端之措施

GloBE 規則在設計與實施上的挑戰，不僅影響各國租稅主權與制度效能，也進一步衝擊稅制的穩定性與可預測性。穩定的租稅環境對於投資與企業經營地之

¹¹⁰ *Id.*; Jefferson VanderWolk, *The UTPR: Taxing Rights Gone Wild*, 18(11) TAX NOTES INT'L, 1369, 1370 (2022).

¹¹¹ *Qualified Status Under the Global Minimum Tax*, *supra* note 82.

決策至關重要，若稅制在投資存續期間出現重大變化，將提高投資風險，並削弱一國對外資之吸引力¹¹²。

在此背景下，國際投資法成為保障投資人權益之重要工具。各國透過簽訂 IIAs，旨在降低長期投資風險，並建立穩定與可預期的投資友善環境。此類協定不僅確立公平與公正待遇、禁止歧視、徵收與補償等投資保護標準，亦賦予投資人透過投資人對地主國爭端解決機制 (ISDS) 救濟之權利¹¹³。若各國因應 GloBE 規則而採取之措施破壞既有稅制之穩定性、在適用上對投資構成歧視或嚴重剝奪投資價值，投資人即可能依 IIAs 提起投資仲裁。是以，GloBE 規則的推行不僅在稅法領域構成挑戰，亦可能在國際投資法領域引發爭端。以下將進一步探討各國因應 GloBE 規則所採取之具體措施，以及這些措施違反 IIAs 之風險。

一、補充稅之課徵

目前，GloBE 規則已在約 50 餘國正式施行，這些國家將依其立法實施之 QDMTT、IIR 或 UTPR，對合併年營收逾 7.5 億歐元之跨國企業集團成員課徵補充稅。此三種課稅原則皆可能引發投資爭端，但因課稅設計有所差異，其違反投資保護標準之類型與風險程度亦不盡相同。

就 QDMTT 而言，其目的在於確保實施國對境內低稅負集團成員保有課稅權。然而，此一措施可能直接抵銷該國原先設計用以吸引外資的租稅優惠，致使外國投資人無法實質享有其做成投資時所依賴之稅務利益，從而引發公平與公正待遇爭議。此外，若僅針對符合 GloBE 立法範本適用門檻之跨國企業課徵補充稅，而不適用於本國企業或規模較小之跨國企業集團，亦可能構成歧視。

¹¹² IMF/OECD, Tax Certainty: Report for the G20 Finance Ministers 25-26 (2017), www.oecd.org/tax/tax-policy/g20-report-on-tax-certainty.htm.

¹¹³ Rudolf Dolzer et al.,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28-29 (3rd ed. 2022).

相較之下，IIR 由母公司所在地對其所屬子公司產生的低稅所得課徵補充稅。由於其課稅基礎源自境外子公司之低稅所得，而非母公司所在地提供之租稅優惠所致，因此違反公平與公正待遇的可能性相對較低。然而，IIR 之適用範圍仍可能在不同投資人之間造成差別待遇，因而存在歧視風險。

至於 UTPR，則由集團成員所在國對未經 QDMTT 與 IIR 課稅之低稅所得課徵補充稅。由於補充稅額可能導致跨國企業承擔超過其利潤的稅負，此舉可能構成間接徵收。此外，與前二者相同，UTPR 的適用範圍亦可能引發歧視爭議。

二、租稅優惠之取消與調整

GloBE 規則之實施將抵銷使企業有效稅率低於 15% 的租稅優惠效果。由於租稅優惠在已開發與開發中國家均被廣泛運用，各國可能因此調整甚至廢除既有租稅優惠政策，以因應 GloBE 規則的影響。

在開發中國家，租稅優惠長期作為產業與經濟發展策略的一環，特別是為吸引外人直接投資，以獲取資金與技術。最常見的措施包括租稅假期 (Tax Holidays) 與優惠稅率 (Reduced Tax Rates)¹¹⁴。前者通常在一定期間內對企業全部或部分所得免徵所得稅，後者則以低於法定稅率課徵全部或部分所得，均大幅降低企業稅負¹¹⁵。此類措施往往導致低有效稅率，進而引發補充稅風險，為 GloBE 規則下受影響最為劇烈的政策工具¹¹⁶。

相較之下，已開發國家傾向使用以支出為基礎的租稅優惠 (expenditure-based tax incentives)，例如加速折舊 (Accelerated Depreciation)、投資稅負抵減

¹¹⁴ OECD, Tax Incentives and the Global Minimum Corporate Tax: Reconsidering Tax Incentives After the GloBE Rules 11-14 (2022) [hereinafter Report on Tax Incentives and the Global Minimum Corporate Tax].

¹¹⁵ *The Impact of BEPS on Tax Incentives in Asia Pacific*, KPMG (2021), <https://assets.kpmg.com/content/dam/kpmg/xx/pdf/2021/09/the-impact-of-beps-on-tax-incentives-in-asia-pacific.pdf>.

¹¹⁶ *Id.* at 12, 50.

(Investment Tax Allowances) 與研發稅額抵減 (R&D Tax Credits)，而非廣泛適用企業所得的免稅或優惠稅率措施¹¹⁷。加速折舊雖然能在資產使用初期顯著減少應稅所得，但屬於財稅帳面上的暫時性差異，將於後年度自動平衡整體稅負，並在 GloBE 規則下透過遞延所得稅費用調整，不會影響有效稅率¹¹⁸。投資與研發抵減則針對特定支出提供稅額抵減優惠，原則上會降低企業有效稅率，因而在 GloBE 規則下引發補充稅。然而，若此類優惠能促使企業增加有形資產投資或薪資支出，則可提升「實質性所得排除額」，進而降低超額利潤與補充稅額。因此，相較於適用企業全部所得之租稅假期與低稅率優惠，此類租稅優惠與實質經濟活動高度相關，受 GloBE 規則影響的程度較低¹¹⁹。

此外，已開發國家在設計以支出為基礎的租稅優惠時，常附帶可退還 (refundable) 之機制。例如，可退還稅額抵減 (Refundable Tax Credits) 允許納稅人即便當期無法充分利用投資或研發抵減，仍可獲得退稅¹²⁰。根據 GloBE 規則，符合條件的合格可退還稅額抵免 (Qualified Refundable Tax Credit, QRTC) 會被視為收入而非稅額減項，因此對 GloBE 規則補充稅之影響相對較低¹²¹。相比之下，「非合格可退還稅額抵免 (Non-Qualified Refundable Tax Credit)」之抵減稅額不納入所得計算，可能導致更高的補充稅¹²²。

部分國家為了使租稅優惠符合 QRTC，已陸續調整既有租稅優惠；甚或修法建立新的租稅優惠制度，以避免補充稅規則削弱投資誘因。以歐洲國家為例，瑞

¹¹⁷ *Id.* at 15.

¹¹⁸ *Id.* at 24; GloBE Model Rules, *supra* note 21, art. 4.1.1 (“The Total Deferred Tax Adjustment Amount for a Constituent Entity for the Fiscal Year is equal to the deferred tax expense accrued in its financial accounts if the applicable tax rate is below the Minimum Rate or, in any other case, such deferred tax expense recast at the Minimum Rate, with respect to Covered Taxes for the Fiscal Year subject to the adjustments set forth in Articles 4.4.2 and 4.4.3 and the following exclusions....”).

¹¹⁹ REPORT ON TAX INCENTIVES AND THE GLOBAL MINIMUM CORPORATE TAX, *supra* note 114, at 46.

¹²⁰ *Id.* at 17.

¹²¹ 合格可退還稅額抵減係指租稅管轄區於集團成員符合該轄區授予之租稅抵減條件之 4 年內，以現金或相當於現金之形式，將租稅抵減額退還給納稅義務人。GloBE Model Rules, *supra* note 21, arts. 3.2.4, 4.1.2(d); Commentary to GloBE Model Rules, *supra* note 26, at 215.

¹²² GloBE Model Rules, *supra* note 21, arts. 3.2.4, 4.1.3(b); REPORT ON TAX INCENTIVES AND THE GLOBAL MINIMUM CORPORATE TAX, *supra* note 114, at 39-40.

士部分州已提出或通過相關立法，導入以補助金或 QRTC 形式提供之租稅優惠，並聚焦於環境永續、研發與創新領域，以確保租稅優惠效力不致被 GloBE 規則侵蝕。愛爾蘭則修正研發稅額抵免制度，以確保該租稅優惠符合 QRTC 要件。修改內容包括，允許企業直接申請退稅，而無需先抵減（offset）其他稅負，以及取消退稅上限¹²³。

在亞太地區，新加坡於 2024 年財政預算案中引入「可退還投資稅收抵免（Refundable Investment Credit）」，並修正《1947 年所得稅法》加以落實。符合條件的企業若於新加坡進行高價值且具實質性經濟活動之投資，其相關支出（如資本支出、人力資源支出、運輸與物流費用、專業服務費用等）可獲得最高 50% 的稅額抵免。該抵免可直接抵減企業所得稅，包括新加坡實施之 QDMTT，未使用的部分則於 4 年內退還現金。越南則於 2024 年 12 月 31 日發布第 182/2024/ND-CP 號法令，設立投資支持基金，以鼓勵及吸引高科技領域投資。符合條件的高科技企業、研發中心或高科技產品製造專案，可就其人力資源與培訓、研究、固定資產投資、高科技產品生產及社會基礎設施投資支出，取得現金補助，該補助不計入企業課稅所得¹²⁴。

綜上所述，廣泛適用於開發中國家的租稅假期與優惠稅率政策，最可能因 GloBE 規則而失去實質效力，依賴此類優惠的國家勢必面臨租稅政策之調整。若能以 QRTC 或現金補助取代此類高風險租稅優惠，則可在 GloBE 規則實施下維持稅負誘因，不致侵害投資人對租稅優惠的合理期待與法律穩定性，有助於保障國際投資。然而，若國家僅單純取消或大幅調整租稅假期與優惠稅率，而未提出可替代之措施，不僅將削弱跨國企業依據既有稅制所形成的合法期待，進而違反 IIAs 所保障的公平與公正待遇，也可能進一步對投資價值構成實質剝奪，

¹²³ *Pillar Two and Tax Incentives*, KPMG (May, 2025), <https://assets.kpmg.com/content/dam/kpmgsites/xx/pdf/2025/06/pillar-two-and-tax-incentives-may-2025.pdf>.

¹²⁴ *Id.*

產生間接徵收之爭議。由此可見，GloBE 規則之推行，不僅對國家租稅政策之設計構成挑戰，也潛藏引發國際投資爭端之風險。

三、小結

本節簡要說明了在 GloBE 規則下可能引發投資爭端的主要措施類型。下一章將進一步從國際投資法之程序與實體面出發，探討投資人對 GloBE 規則相關措施提起投資仲裁可能涉及之管轄權爭議，並深入評析此類措施是否與 IIAs 所規範之實質投資保護條款相衝突。



第三章 對 GloBE 規則提起投資仲裁爭端可能涉及 之管轄權爭議分析

在全球化背景下，跨國投資活動日益頻繁，外國投資人於地主國進行投資計畫時，常面臨地主國政策變動、行政程序瑕疵、徵收或歧視等風險，進而引發國際投資爭端¹²⁵。為有效保障投資人權益並促進友善的投資環境，國際投資法逐步發展出「投資人對地主國爭端解決機制(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ISDS)」，並普遍納入 IIAs 中。此機制賦予投資人直接對地主國提起仲裁之權利，使投資爭端得以交由國際仲裁解決，藉此補足其他救濟途徑之不足¹²⁶。

截至 2021 年，已公開的 ISDS 案件累計達 1,190 件，其中約 15% 涉及租稅相關爭議，顯示租稅措施在國際投資仲裁中具高度實務意涵¹²⁷。儘管目前尚無投資人就地主國為實施 GloBE 規則所採取的措施提起投資仲裁，但隨著該稅制推行，各國政府陸續立法課徵補充稅或調整租稅優惠，其在國際投資法下之適法性引發爭議。

本章將首先說明投資人透過 ISDS 挑戰 GloBE 規則相關措施之可能性，繼而從程序面分析此類案件可能涉及之管轄權爭議，為下一章探討相關措施是否實質投資保護條款奠定基礎。

第一節、投資人將 GloBE 規則相關措施訴諸 ISDS 之可能

在 GloBE 規則下可能引發爭議之措施主要包括課徵補充稅以及取消或調整租稅優惠。前者必然涉及修法，後者則依國家提供租稅優惠之形式，可能涉及修

¹²⁵ 李宜芳，投資人與地主國間爭端解決機制之反思，經貿法訊，146 期，頁 1，2013 年 4 月 25 日，<https://tradelaw.nccu.edu.tw/epaper/no146/1.pdf>。

¹²⁶ RUDOLF DOLZER ET AL., *supra* note 113, at 340.

¹²⁷ UNCTAD, *Facts on Investor-State Arbitrations in 2021: With a Special Focus on Tax-Related ISDS Cases* (July 2022), 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official-document/diaepcbinf2022d4_en.pdf

法或行政處分等行政行為。從既有租稅相關的 ISDS 案例與國際組織文件觀察，此類措施確實有違反 IIAs 之風險。

（一）ISDS 案件觀察

在 *Micula v. Romania* 一案中，羅馬尼亞於 1998 年立法頒布「24/1998 號緊急政府條例」，提供投資於貧困地區之投資人多項租稅優惠，包括關稅減免、機械增值稅豁免、原物料關稅退稅以及所得稅減免，並核發有效期限至 2009 年的「永久投資人證書（Permanent Investor Certificates）」¹。瑞典投資人基於該等措施將持續十年之預期，大量投入資金。然而，羅馬尼亞於 2005 年修法撤銷大部分優惠，仲裁庭認定此舉違反瑞典與羅馬尼亞雙邊投資協定規範之公平與公正待遇條款，判決羅馬尼亞賠償 1.78 億歐元。又如 *Ampal-American v. Egypt* 一案中，投資人原依法享有經濟特區之免稅權，但埃及政府後續修法並撤銷其經濟特區許可證，使投資人喪失免稅待遇並大幅增加稅負。仲裁庭認為撤銷經濟特區許可證構成間接徵收，違反埃及與美國雙邊投資協定之公平與公正待遇條款。此外，在 *Burlington v. Ecuador* 一案中，厄瓜多政府修法將石油之超額利潤稅率提高至 99%，投資人遂依美國與厄瓜多雙邊投資協定提起仲裁。雖然仲裁庭最終認為該租稅措施未實質剝奪投資價值，不構成徵收，但仍顯示投資人有可能針對地主國修法提高稅率之行為提起仲裁。

這些案例顯示，當地主國透過立法或行政行為提高投資人之租稅負擔時，投資人可能藉由 ISDS 提起仲裁。由此推知，各國因應 GloBE 規則而實施的補充稅課徵與租稅優惠調整措施，確實存在投資人依 IIAs 提起仲裁之風險。

（二）國際組織研究與指引文件分析

國際組織的研究亦揭示此一潛在衝突。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U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在報告中，明確指出 IIAs 對 GloBE 規則相關措施之法

律風險。OECD 作為 GloBE 規則之主要推動者，也在 2022 年的報告中承認 GloBE 規則與國際投資協定之間存在潛在衝突¹²⁸，並於 2023 年發布之行政指引中指出，若跨國企業依國內法、投資協定或其他限制其租稅負擔之協議，對 QDMTT 提起司法或行政救濟，所涉之補充稅額不應視為 QDMTT 之有效課徵，不得抵減依 GloBE 規則立法計算之補充稅¹²⁹。此顯示 OECD 已預見跨國企業可能藉由投資仲裁或其他法律救濟途徑挑戰 GloBE 規則，並試圖透過降低經濟效益來避免投資人訴諸仲裁。然而，正如 UNCTAD 在其報告中指出的，即便投資人對 QDMTT 提起投資仲裁後，他國得透過 IIR 或 UTPR 課徵該補充稅額，目前許多 ISDS 案件之仲裁程序與仲裁判斷並未公開，此不透明性使他國難以掌握投資人是否對 QDMTT 提起投資仲裁。因此，跨國企業提起仲裁仍具有經濟效益。

此外，國際智庫國際永續發展協會（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ISD）在關於全球最低稅負制與經濟特區的研究中同樣指出，若政府因應 GloBE 規則而撤銷或修改租稅優惠，可能與國內法、投資契約與 IIAs 產生衝突。尤其當經濟特區法律或投資契約中包含穩定條款時，政府調整租稅政策之法律風險更高¹³⁰。

綜上所述，無論從 ISDS 案例或國際組織研究或指引文件來看，各國因應 GloBE 規則而實施的補充稅課徵與租稅優惠調整措施，均存在被投資人視為違反國際投資協定並進一步引發仲裁的可能性。因此，以下將進一步探討，當投資人針對此類措施提起 ISDS 仲裁時，仲裁庭在程序面上是否具備管轄權。

¹²⁸ REPORT ON TAX INCENTIVES AND THE GLOBAL MINIMUM CORPORATE TAX, *supra* note 114, at 22-23.

¹²⁹ Administrative Guidance on GloBE Model Rules, *supra* note 76, at 75.

¹³⁰ JOY WARUGURU NDUBAI-NGIGI, THE GLOBAL MINIMUM TAX AND SPECIAL ECONOMIC ZONES 12 (2024), <https://www.iisd.org/system/files/2024-07/global-minimum-tax-special-economic-zones.pdf>.

第二節、仲裁庭對 GloBE 規則爭端之基本程序要件

國際投資仲裁之管轄權係建立於投資協定與仲裁規則所設立之基本要件上，當投資人依 ISDS 機制對地主國措施提起仲裁時，仲裁庭必須先確認其是否具備管轄權，方能進入實體審查。至於仲裁之場域及規則則取決於締約國於投資協定中的約定，例如《德國 2008 年投資協定範本》第 10 條第 2 項規定，投資人可選擇依國際投資爭端解決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 ICSID）、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UNCITRAL）、國際商會（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ICC）等機構之仲裁規則提起仲裁¹³¹。實務上，以 ICSID 仲裁規則最常被使用¹³²。

ICSID 公約第 25 條第 1 項規定：「ICSID 中心的管轄權應及於締約國（或該締約國向 ICSID 中心所指定之任何組成單位或機構）與他締約國國民間，直接因投資所引起之任何法律爭端，且經爭端當事人書面同意提交本中心者。爭端當事人一經同意，任何一方不得單方面撤回其同意。」依本條內容可知，仲裁庭之管轄要件包括：一、對事管轄，即管轄權限於直接因投資所引起之法律爭端；二、對人管轄，即當事人一方須為 ICSID 公約締約國、另一方為另一締約國國民；三、當事人對仲裁之合意，即投資人與地主國雙方書面同意將投資爭端提交仲裁解決。

各國因應 GloBE 規則採行之措施，原則上針對跨國企業集團內不同實體課徵補充稅或調整租稅優惠，若因此產生投資爭端，將涉及多層控股結構，以及境內外母子公司間的投資持股關係。在此情境下，究竟哪些實體得以投資人身分提

¹³¹ Germany Model BIT 2008, <https://investmentpolicy.unctad.org/international-investment-agreements/treaty-files/2865/download>.

¹³² UNCTAD, *IIA Issues Note No. 3: Facts and Figures on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Cases* (Nov. 26, 2024), 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official-document/diaepcbinf2024d5_en.pdf.

起 ISDS，以及何種投資類型可受投資協定保護，將成為潛在之管轄權爭點。

為此，本節將聚焦於投資人與其投資之認定，探討當跨國企業因 GloBE 規則相關措施而引發投資爭端時，仲裁庭之管轄權要件，並以補充稅課徵措施作為案例進行分析，此分析結論亦可延伸適用於租稅優惠調整措施。

一、投資與投資人之定義

（一）投資之定義

就投資之定義，仲裁庭發展出所謂「雙管測試 (double-barrelled test)」，要求所涉爭端需同時符合當事人適用之 IIA 及 ICSID 公約下投資的概念與意涵，仲裁庭始具有管轄權¹³³。

多數 IIAs 對投資採取以資產為基礎 (asset-based) 之定義方式，大部分定義會包含一個概括性用語，例如「所有資產 (all asset)」，再例示若干投資類型說明涵蓋的投資形式，其中多為傳統財產權。例如《能源憲章條約 (Energy Charter Treaty, ECT)》第 1 條第 6 項規定，投資係指投資人直接或間接擁有或控制各種資產，包括有形資產與無形資產、動產與不動產、產權，以及任何財產權如租賃、抵押、質押、與留置；公司或企業，或股份、股票或參與公司或企業的其他形式股本，以及公司或企業的債券與其他債務；金錢請求權，以及依具有經濟價值且與投資相關之契約之履行請求權；智慧財產權；收益；由法律或企業或透過任何許可證授予的任何權利，以及依法授予從事能源領域領域任何經濟活動之許可¹³⁴。

儘管投資協定對投資所採之定義常見重複性特徵，並普遍列舉特定資產類型，然此等定義僅構成締約國對投資爭端是否同意提交仲裁的條件之一，並不當然反

¹³³ E.g., CMC v Mozambique, Award, 24 October 2019, para. 191; RUDOLF DOLZER ET AL., *supra* note 113, at 84.

¹³⁴ Energy Charter Treaty, art. 1(6).

映國際投資法上通用的一般性定義。資產是否構成受保護之投資，仍應回歸個別協定之條文加以判斷。

ICSID 公約第 25 條第 1 項規定 ICSID 的管轄權僅及於締約國與另一締約國國民之間直接因投資所引起之法律爭端，但未就「投資」的概念加以定義¹³⁵。依 ICSID 公約運作之仲裁庭在仲裁實務中逐漸發展出一套認定「投資」概念之標準，其中以 *Salini v. Morocco* 案所建立之「薩里尼標準 (*Salini test*)」最具指標性，包括「資金或資產貢獻」、「持續一段時間」、「風險承擔」與「對地主國之經濟發展有所貢獻」¹³⁶。

綜上所述，各項 IIAs 中的投資定義以及仲裁實務對 ICSID 公約下投資的認定標準為仲裁庭在判斷爭端是否涉及受保護之投資提供了一定的判準依歸。

(二) 投資人之定義

「投資人」主要係指自然人與法人，判斷某一主體是否構成 IIAs 或 ICSID 公約中「投資人」之關鍵則在於其法律上的國籍認定。投資人之國籍決定其可受哪些投資協定保護。若投資人擬依雙邊投資協定主張權利，須證明其具有協定締約國國籍，且不具爭端當事國之國籍；若欲依 ICSID 公約提起仲裁，投資人須具爭端當事國以外之另一締約國國籍，方符合該仲裁機構之程序要件¹³⁷。

自然人之國籍主要依各國國內法決定之；至於法人的國籍，主要依循三種判斷原則：其一為設立地主義 (*place of incorporation*)，即以法人依法設立之國家

¹³⁵ Convention on the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 between States and Nationals of Other States, art. 25.1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Centre shall extend to any legal dispute arising directly out of an investment, between a Contracting State (or any constituent subdivision or agency of a Contracting State designated to the Centre by that State) and a national of another Contracting State, which the parties to the dispute consent in writing to submit to the Centre. When the parties have given their consent, no party may withdraw its consent unilaterally.”).

¹³⁶ *Salini v. Morocco*, Decision on Jurisdiction, para. 52, 16 July 2001.

¹³⁷ Convention on the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 between States and Nationals of Other States, art. 25.1.

作為國籍判斷標準，例如 ECT 即將法人投資人定義為「依締約方適用法律設立之公司或其他組織」¹³⁸；其二為主要營業地主義（location of the company's seat / effective management），依法人之營業所在地或有效管理地認定國籍；其三為控制主義（ownership or control），以對法人具有實質控制權之自然人或法人之國籍為準。各項投資協定在採納上述原則時，可能僅採單一判斷基準，亦可能並列兩項以上基準，要求同時或擇一滿足。其中，以設立地主義或主要營業地主義，最常構成 IIAs 的主要規範模式¹³⁹。

二、GloBE 規則爭端之管轄權爭議－以投資與投資人定義為中心

為清楚呈現跨國企業集團在 GloBE 規則下可能面臨的程序性爭議，以下將以圖 3-1 所示之跨國企業集團為假設案例，針對地主國課徵補充稅之措施進行討論，分析在不同情境下仲裁聲請人與其資產是否符合投資協定與仲裁規則中「投資」與「投資人」之定義。由於課徵補充稅與撤銷與調整租稅優惠皆屬政府對跨國企業採行之措施，僅就前者進行程序性分析，其結論可延伸適用於後者，並可避免複雜化假設案例。

圖 3-1 之跨國企業集團由五個集團成員組成，所在地為圖示對應之租稅管轄區。中間母公司 A 與 B、子公司 C 與 Z 皆由其母公司完全持有。依 GloBE 規則補充稅規範，子公司 Z 為低稅負集團成員，其所在地 Z 國為低稅負管轄區。

¹³⁸ ECT, art. 1(7)(a)(ii).

¹³⁹ RUDOLF DOLZER ET AL., *supra* note 113, at 63-65; *Autopista v Venezuela*, Decision on Jurisdiction, 27 September 2001, para. 1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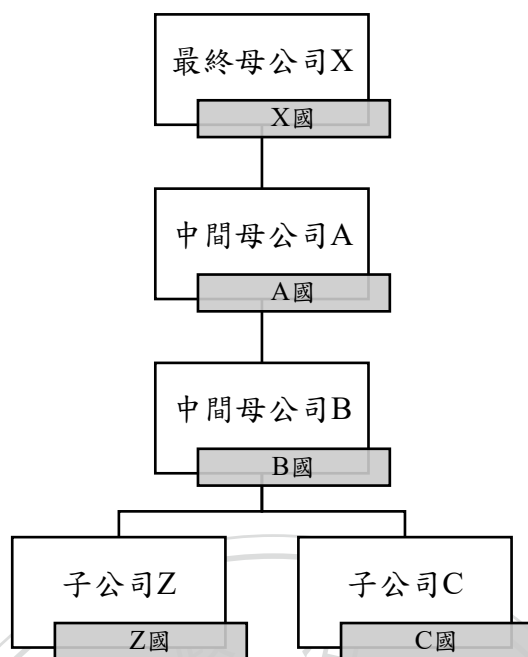


圖 3-1：跨國企業集團案例（作者自行繪製）。

在 GloBE 規則實施下，對被課徵補充稅之集團成員具有直接所有權權益的母公司，原則上有權依 IIA 就該補充稅措施提出仲裁，若子公司 C 因 C 國實施 UTPR 被課徵補充稅，中間母公司 B 欲依 B 國與 C 國間簽訂之雙邊投資協定提起仲裁，則該爭端須符合適用協定與仲裁規則對「投資」與「投資人」之定義。

就投資而言，多數 IIAs 採開放性的投資定義，涵蓋各類具有經濟價值之資產，其中「股份、股票或參與公司之其他形式股本」為最常見的例示項目之一¹⁴⁰。針對此類投資，投資人並非直接擁有特定資產，而是透過持有公司股權，間接取得對資產的經濟利益，屬間接投資¹⁴¹。實務上，股權不僅常被投資人援引，亦在許多投資仲裁案件中被視為可受保護之投資¹⁴²。準此，中間母公司 B 對子公司 C 持有之股權，亦即 GloBE 規則所稱之所有權權益，應構成投資。

¹⁴⁰ E.g., Energy Charter Treaty, Article 1(6); USMCA, Article 14.1; Comprehensive Economic and Trade Agreement (CETA) between Canada, the European Union, and its member States, art. 8.1.

¹⁴¹ RUDOLF DOLZER ET AL., *supra* note 113, at 116.

¹⁴² E.g., *Genin v Estonia*, Award, 25 June 2000, para 324;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3rd Edition) 97 (2022).

至於投資人之判定，擬依雙邊投資協定主張權利之公司須具有該協定締約國國籍，且不具地主國國籍。若適用協定對法人國籍採設立地主義，則依 B 國法設立之中間母公司 B，應符合該協定之「投資人」要件。

綜上，中間母公司 B 原則上具有依 B 國與 C 國間簽訂之 IIA，對 C 國提起投資仲裁之資格。然而，除直接持股之母公司外，跨國企業集團結構中尚有其他實體，如最終母公司或被課徵補充稅之子公司本身，可能以投資人身份提起仲裁，進而引發管轄權爭議。以下將依序分析在 GloBE 補充稅爭端中，這些主體是否具備「投資人」資格與可受保護的「投資」，並說明其仲裁可能性與管轄權基礎。

（一）母公司是否能就「間接持股」提出仲裁？

如前所述，根據多數 IIAs 之投資定義與仲裁實務見解，中間母公司對子公司之直接持股應構成受保護之間接投資。然而，若該股權係由最終母公司或中間母公司間接持有，則須進一步釐清母公司是否得以「間接投資人」身分，主張地主國之租稅措施損害其投資利益，進而具備投資仲裁之當事人適格。

以圖 3-1 的跨國企業集團為例，最終母公司 X 透過中間母公司 A 與 B，間接持有子公司 Z 全部股權。若 Z 國因實施 QDMTT 對子公司 Z 課徵補充稅，最終母公司 X 是否得依 X 國與 Z 國間之投資協定提起仲裁，取決於仲裁庭是否承認其作為間接投資人具備當事人適格。

部分 IIAs 在投資定義中明文涵蓋直接或間接投資¹⁴³，另有部分協定則未提及間接投資，而是以「各類型資產 (every kind of asset)」此類廣義用語界定投資範圍¹⁴⁴。仲裁實務顯示，投資定義中是否明確論及直接或間接投資，對仲裁庭之

¹⁴³ E.g., Trea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Republic of Ecuador Concerning the Encouragement and Reciprocal Protection of Investment art. 1.1, Aug. 27, 1993.

¹⁴⁴ E.g., 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Peru Concerning the Encouragement and Reciprocal Protection of Investments art. 1.1, June 9, 1994.

裁決並未產生決定性影響；只要協定未明文排除間接投資，仲裁庭通常承認其對間接股東（indirect shareholders）提出之仲裁具有管轄權，間接持股原則上受協定保護¹⁴⁵。

例如，在 *Siemens v. Argentina* 案中，德國公司 Siemens A.G. 雖透過德國子公司 Siemens IT Services S.A. 間接持有阿根廷公司 Siemens Nixdorf Informationssysteme AG 的股份，仲裁庭仍認定其間接持股符合適用協定下投資之定義¹⁴⁶。仲裁庭對《阿根廷—德國雙邊投資協定》中「投資」與「投資人」之定義條文進行詳細分析後指出，投資之定義並未排除間接投資，故不應要求投資人與投資之間具備直接關係¹⁴⁷。

同樣地，在 *Noble Energy v. Ecuador* 案中，仲裁聲請人 Noble Energy 係透過兩個不同層級且分別設立於美國與開曼群島的中間母公司，間接持有厄瓜多當地公司 MachalaPower 之股份¹⁴⁸。地主國厄瓜多主張 Noble Energy 並非 MachalaPower 的直接股東，且 ICSID 公約不允許「祖母公司（grandparent company）」提起仲裁，因此其不具當事人適格¹⁴⁹。然而，仲裁庭援引過往實務見解，認為間接股東得依 ICSID 公約與雙邊投資協定，就其直接或間接投資提起仲裁。除非協定另有排除規定，ICSID 公約與雙邊投資協定皆涵蓋間接股東就其損失提出之主張¹⁵⁰。

仲裁庭亦進一步探討，間接持股在公司控制鏈中可延伸至何種程度，仍符合

¹⁴⁵ *E.g.*, *Siemens Decision on Jurisdiction*, para. 142; *Ioannis Kardassopoulos v. The Republic of Georgia*, ICSID (W. Bank) ARB/05/18 (Decision on Jurisdiction) (Jul. 6, 2007) at para. 123; *CEMEX Caracas Investments B.V. and CEMEX Caracas II Investments B.V. v. Bolivarian Republic of Venezuela*, ICSID (W. Bank) Case No. ARB/08/15 (Decision on Jurisdiction) (Dec. 30, 2010) at paras. 140–158; RUDOLF DOLZER ET AL., *supra* note 113, at 84.

¹⁴⁶ *Siemens Decision on Jurisdiction*, paras. 23, 142.

¹⁴⁷ *Id.* 137, 142.

¹⁴⁸ *Noble Energy, Inc. and Machalapower Cia. Ltda. v. The Republic of Ecuador and Consejo Nacional de Electricidad*, ICSID Case No. ARB/05/12, Decision on Jurisdiction, 5 March 2008, para. 80.

¹⁴⁹ *Id.* para. 71.

¹⁵⁰ *Id.* para. 77.

投資協定下之投資人資格。換言之，間接股東與直接股東間究竟能存在多少層級或公司¹⁵¹？仲裁庭指出，間接持股的層級可能存在界線，但不論該界線為何，透過兩層中間母公司構成的間接持股結構尚未達到排除適用的程度。間接股東與投資間仍具有足夠關聯性¹⁵²。此外，Noble Energy 為涉及仲裁之各間子公司之最終母公司，並直接或間接持有該等子公司全部股權¹⁵³。因此，仲裁庭認定 Noble Energy 作為 MachalaPower 之間接所有人，具備依 ICSID 公約與雙邊投資協定提起仲裁之當事人適格¹⁵⁴。

是以，在圖 3-1 的假設情境下，若 X 國與 Z 國間之投資協定未排除對間接投資之保護，最終母公司 X 僅透過兩層中間子公司間接持有子公司 Z 所有股權，在符合其他仲裁要件情況下，應具備投資人資格，得對 Z 國之補充稅措施提起仲裁。

（二）被課徵補充稅之企業是否可直接對地主國提出仲裁？

在 GloBE 規則實施下，被課徵補充稅之集團成員是否可自行依投資人身份，對實施該措施之地主國提起仲裁，構成另一項潛在爭點。以圖 3-1 所示之跨國企業集團為例，若 A 國依 IIR 對中間母公司 A 課徵補充稅，該中間母公司 A 是否得自行對 A 國提起仲裁？此問題核心在於，中間母公司 A 是否符合投資協定與仲裁規則下之「投資人」定義，即不具爭端當事國國籍，得作為外國投資人聲請仲裁。以下將探討中間母公司 A 可能取得投資人身份的兩種情況。

1. 中間母公司 A 為 A 國稅務居民，但不具該國國籍

首先，在多數 IIAs 中，判斷法人投資人國籍之標準普遍採用設立地主主義原

¹⁵¹ *Id.* para. 80.

¹⁵² *Id.* para. 82.

¹⁵³ *Id.*

¹⁵⁴ *Id.* para. 83.

或主要營業地主義，即以法人依法設立之國家或主要營業所在地作為依據。而在 GloBE 規則之設計下，跨國企業是否為補充稅課徵對象，則以其所在租稅管轄區為基礎。依 GloBE 立法範本之規定，若企業依設立地、實際管理地或其他類似標準被認定為某租稅管轄區之稅務居民，即視為位於該租稅管轄區；僅在無法依稅務居民身份判斷時，才退而以企業設立地作為判斷基準¹⁵⁵。換言之，GloBE 規則將「稅務居民」作為企業所在地的主要連結因素。

此一設計與國際投資法下投資人國籍的判斷方式並不完全一致。雖然兩者都可能採用設立地或主要營業地作為判斷依據，但國際投資法可能兼採「控制主義」作為投資人國籍認定標準；而各國稅法近來則強調「實質管理處所主義（Place of Effective Management）」，以確保課稅義務與企業實質經濟活動之連結。因此，在國際投資法架構下討論 GloBE 規則相關措施的適法性時，可能出現一企業在稅法上被視為地主國稅務居民，但在投資法上仍屬他國國民，得以外國投資人身份主張投資協定保障的情況。

基於此理論可能性，假設中間母公司 A 雖然位於 A 國並受其 IIR 補充稅課徵，但若 A 公司依法設立於 Y 國，且符合 A 國與 Y 國雙邊投資協定對投資人國籍之認定標準，則仍可能以 Y 國國民身份提起仲裁。

然而，在現行仲裁實務中，多數與租稅相關之 ISDS 案件係由外國母公司或股東就地主國對其子公司之租稅措施提起，幾乎未見具地主國租稅居民身份之投資人就地主國租稅措施提起仲裁。即便如此，在法人設立地與稅務居住地分離的稅務規劃架構下，上述假設情境在法理上仍具可能性。

¹⁵⁵ GloBE Model Rules, *supra* note 21, art. 10.3.1.

2. 中間母公司 A 受外國控制，得被視為外國投資人

在本節「投資與投資人之定義」中已說明，投資人依 ICSID 公約提起仲裁，須為地主國以外之另一締約國國民¹⁵⁶。所謂「另一締約國國民」就法人而言，必須在與地主國合意提交調解或仲裁之日，具備地主國以外之另一締約國國籍；或雖具備地主國國籍，但受外國控制，雙方當事方同意將其視為另一締約國國民者¹⁵⁷。

因此，具地主國國籍但受到外國控制之法人，也可能具備提起投資仲裁之資格。實務上，仲裁庭通常採取雙重審視標準，以判斷投資人是否符合該規範要件。其一，當事方間須有將當地公司視為外國投資人之合意；其二，須實際存在外國控制¹⁵⁸。

當事方之合意可記載於地主國與投資人簽訂之投資契約中¹⁵⁹，或在投資協定中一般性地規定，為了 ICSID 公約第 25 條第 2 項 b 款之目的，應視於一國設立但由另一國國民所控制的公司為另一國之國民¹⁶⁰。例如，依《瑞典—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雙邊投資協定》第 8 條第 3 項規定，為了本條與 ICSID 公約第 25 條第 2 項 b 款之目的，任何依締約國法律設立的法人，如在爭端發生前由另一締約國投資人控制，則應視為另一締約國之法人¹⁶¹。

¹⁵⁶ ICSID Convention, art. 25.1.

¹⁵⁷ *Id.* art. 25.2(b) (“National of another Contracting State” means:...(b) any juridical person which had the nationality of a Contracting State other than the State party to the dispute on the date on which the parties consented to submit such dispute to conciliation or arbitration and any juridical person which had the nationality of the Contracting State party to the dispute on that date and which, because of foreign control, the parties have agreed should be treated as a national of another Contracting State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Convention.”).

¹⁵⁸ *E.g.*, *Autopista Concesionada de Venezuela, C.A. v. Bolivarian Republic of Venezuela*, ICSID Case No. ARB/00/5, Decision on Jurisdiction, paras. 105–134 (Sept. 27, 2001); *Millicom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B.V. and Sentel GSM SA v. The Republic of Senegal*, ICSID Case No. ARB/08/20, Decision on Jurisdiction, para. 109 (July 16, 2010); *National Gas S.A.E. v. Arab Republic of Egypt*, ICSID Case No. ARB/11/7, Award, paras. 130–133 (Apr. 3, 2014).

¹⁵⁹ *E.g.*, *AHS Niger and Menzies v Niger*, Decision on Jurisdiction, 13 March 2013, paras. 136–148.

¹⁶⁰ *E.g.*, Agreement on the Promotion and Protection of Investments Between Sweden and Bosnia and Herzegovina art. 8.3, Oct. 31, 2000; ECT art. 26.7.

¹⁶¹ Agreement on the Promotion and Protection of Investments Between Sweden and Bosnia and

除了合意將當地公司視為外國投資人之外，還須滿足「外國控制」要件。部分投資協定會在條文中敘明外國控制之定義。例如，《智利—玻利維亞雙邊投資協定》第 10 條第 4 項規定，若依一締約國法律設立之法人由另一締約國投資人持有多數股份，則構成 ICSID 公約第 25 條所稱之外國控制¹⁶²。當投資協定未定義外國控制時，實務上仲裁庭多認為多數股權足以建立控制權¹⁶³。然而，若當地公司係由設立於其他締約國之空殼公司間接持有，而該空殼公司最終仍由地主國國民所有，則不構成外國控制¹⁶⁴。反之，若透過多層持股結構，最終由另一締約國國民控制，亦可構成外國控制¹⁶⁵。此外，仲裁庭對外國控制之判斷標準不限於股權持有，而會綜合考量投票權、董事會席次、經營決策影響力等因素。即使外國投資人僅持有少數股份，若能對公司經營造成決定性影響，仍可能構成外國控制¹⁶⁶。

因此，在圖 3-1 案例中，若 A 國與 X 國皆為 ICSID 公約之締約國。最終母公司 X 為 X 國國民，並直接持有中間母公司 A 全數股份，且具有實質控制權，則可能構成外國控制。若 A 國與 X 國在投資協定中同意將受到外國控制之當地公司視為外國投資人，則中間母公司 A 可作為 X 國國民，依該協定向 A 國提起 ICSID 仲裁。

Herzegovina art. 8.3, Oct. 31, 2000 (“For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and Article 25 (2)(b) of the said Washington Convention, any legal person which is constitu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egislation of one Contracting Party and which, before a dispute arises, was controlled by an investor of the other Contracting Party, shall be treated as a legal person of the other Contracting Party.”).

¹⁶² Agreement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Bolivia and the Republic of Chile for the Promotion and Reciprocal Protection of Investment art. X.4, Sept. 22, 1994; Quiborax S.A., Non Metallic Minerals S.A. and Allan Fosk Kaplún v. Plurinational State of Bolivia, ICSID Case No. ARB/06/2, Decision on Jurisdiction, para. 91 (Sept. 27, 2012).

¹⁶³ E.g., Renée Rose Levy and Grencitel S.A. v. Republic of Peru, ICSID Case No. ARB/11/17, Award, para. 171 (Jan. 9, 2015);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3rd Edition) 70, (2022).

¹⁶⁴ E.g., TSA Spectrum de Argentina S.A. v.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5/5, Award, paras. 147–162 (Dec. 19, 2008); National Gas S.A.E. v. Arab Republic of Egypt, ICSID Case No. ARB/11/7, Award, paras. 133–149 (Apr. 3, 2014).

¹⁶⁵ E.g., United Utilities (Tallinn) B.V. and Aktsiaselts Tallinna Vesi v. Republic of Estonia, ICSID Case No. ARB/14/24, Award, paras. 442–446 (June 21, 2019,) [hereinafter United Utilities v Estonia]; Raymond Charles Eyre and Montrose Developments (Private) Limited v. Democratic Socialist Republic of Sri Lanka, ICSID Case No. ARB/16/25, Award, Mar. 5, 2020, para. 266.

¹⁶⁶ E.g., United Utilities v Estonia, paras. 375–420.

綜上，在 GloBE 規則爭端中，被課徵補充稅之企業即便設立於地主國，若受外國控制，仍可能取得投資人身份對地主國提起仲裁。此可能性取決於其跨國企業集團之控股結構，以及雙邊協定與仲裁規則對投資人之定義。

第三節 租稅除外條款與 GloBE 規則下之仲裁管轄問題

在確認 GloBE 制度爭端之潛在仲裁聲請人符合投資協定下「投資」與「投資人」之定義後，尚須進一步檢視依 GloBE 規則實施之措施是否因協定中的「租稅除外條款」而被排除於投資協定保護範圍之外。此等條款通常係締約國為維護租稅主權而設，目的在於排除對稅收措施之仲裁審查，然其具體適用範圍與例外情形，仍需視條文設計、仲裁實務解釋與具體稅制特性而定。是以，本節首先概述租稅除外條款的發展與類型，並分析其設計對仲裁庭管轄權的潛在影響；其次，評估此等條款是否可能涵蓋 GloBE 規則相關措施，並結合仲裁實務案例說明例外情況下仍得進入仲裁之可能性。

一、租稅除外條款之發展與類型

在現行 IIAs 架構下，ISDS 賦予外國投資人對地主國課稅措施提起仲裁之權利，再透過除外條款或一般例外條款限制國際投資協定之適用範圍。此係因各國在進行國際投資協定的草擬談判時，多會考量到特定政策領域之特殊性與敏感性而將之排除於部份或所有投資保護條款之適用，以保留較具彈性之政策監管空間。就租稅領域而言，各國有權對其租稅管轄範圍內的個人及企業課稅，並在其管轄範圍內修改稅法或採取相關措施，此權利係一國主權之行使。然而，在全球化時代與國際法架構下，國家之租稅政策不僅涉及管轄區內之個人及企業，也對外國投資人造成影響，故需透過國際投資協定加以限制，以平衡各國政府與投資人利益。因此，在 IIAs 中除了有不同態樣的投資人保護條款，大部分協定中也設有

租稅除外條款 (tax carve-outs)，以衡平投資人與地主國之權利¹⁶⁷。

1950 至 1960 年代簽訂之 IIAs 多由資本輸出國主導，內容主要側重於保障外國投資人權利，並未設有任何租稅除外條款 (tax carve-outs)，亦未對「租稅事項 (matters of taxation)」作出明確界定¹⁶⁸。

美國 1984 年雙邊投資條約範本為最早納入租稅除外條款的協定之一，原則上排除投資保護條款適用於租稅事項，但針對徵收與公平與公正待遇條款，仍保留投資人提起仲裁的可能性¹⁶⁹。隨後，美國於 1994 年更新範本中，明訂協定不適用於締約國的租稅事項，亦即原則上不干涉締約國的課稅主權，僅保留徵收條款對租稅措施之適用，且導入雙方稅務機關的事前協商機制，當爭議涉及是否構成間接徵收時，應先由雙方稅務機關進行協商判定¹⁷⁰。2004 年與 2012 年版本則延續該架構，並增設實績要求條款 (Performance Requirements) 對租稅措施之適用¹⁷¹。美國雙邊投資條約範本中租稅除外條款的演進，反映出國際投資協定對租稅主權日益重視的趨勢。

隨著租稅措施日益多元與複雜，各國政府意識到國際投資協定中的投資保護條款可能對租稅主權造成過度限制，遂逐漸在協定中納入租稅除外條款¹⁷²。特別是在 2011 至 2023 年間生效的協定中，約有 42% 納入此類條款，顯示國家對稅務政策自主性的重視提升¹⁷³。

¹⁶⁷ 1950 至 1960 年代簽訂之舊時代 IIA 因由資本輸出國主導，側重於保障外國投資人權利，未設有租稅除外條款。

¹⁶⁸ Nicolás M. Perrone,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Foreign Investor Rights and Obligations: Towards Reimagining the International Law on Foreign Investment, 7(3) BUSINESS & HUMAN RIGHTS J. 375, 381-382 (2022).

¹⁶⁹ Art. XI of the 1984 US Model BIT.

¹⁷⁰ Art. XIII of the 1994 US Model BIT.

¹⁷¹ 2004 U.S. Model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art. 21; 2012 U.S. Model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art. 21.

¹⁷² Córdoba, P.G., *The Tax Carve-Out Clause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in REDEFINING GLOBAL GOVERNANCE 42-43 (Mosquera Valderrama, I.J., Heitmüller, F., Chaisse, J., Christians, A. eds., 2024).

¹⁷³ Brit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 WilmerHale, Tax-Related Measures in

租稅除外條款之設計在不同投資協定中存有差異，其規範態樣可分為完全除外條款（total carve-out）、部分除外條款（partial carve-out）及共同租稅協商（joint tax consultation provision）條款。

（一）完全除外條款（Total Carve-Out）

完全除外條款係指全面排除租稅措施，使其不受 IIA 投資保護條款或 ISDS 程序的適用，並將租稅措施交由國際租稅協定及國內稅法規範。此類條款確保投資人無法以租稅政策變更為由對地主國提起投資仲裁，最大限度地保留地主國對外國投資人課稅之管制自主權。例如《香港與紐西蘭的促進和投資保護協定》第 8.2 條規定「本協定的規定不應適用於締約雙方地區內的稅收事項。該等事項須受締約各方的本地法律及締約雙方就稅收事項達成任何協定的條款所管制。」，此規範將租稅措施全面排除在條約適用範圍之外¹⁷⁴。

（二）部分除外條款（Partial Carve-Out）

部分除外條款僅對部分租稅措施提供排除保護，在特定情況下仍允許投資人提起 ISDS。根據適用範圍，可再細分如下：

1. 特定條款除外

特定條款除外類型通常針對特定投資保護義務設限，將特定條款排除適用於租稅措施，其中以禁止歧視待遇條款除外最為常見¹⁷⁵。

禁止歧視待遇條款包括國民待遇與最惠國待遇，旨在避免地主國對不同投資

Investor-State Arbitration 8.

¹⁷⁴ 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Hong Kong and the Government of New Zealand for the Promotion and Protection of Investments, H.K.- N.Z., art. 8.2, July 6, 1995, 1889 U.N.T.S. 333.

¹⁷⁵ Vatsal Vasudev, *Interactions Between Taxation Measures and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in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AND POLICY 2038 (Chaisse, J., Choukroune, L. & Jusoh, S. eds., 2021).

人為差別待遇，保護投資人在市場中的競爭力。部分締約國以「禁止歧視待遇條款除外」將最惠國待遇與國民待遇全部或部分排除適用於租稅措施，使其得以對與其簽署優惠性經濟協定的第三國投資人提供優惠稅制，或履行與特定投資人既有之投資協議，藉此保留其租稅主權與政策彈性¹⁷⁶。例如，《法國 2006 年投資協定範本》規定國民待遇與最惠國待遇條款不適用於租稅事項¹⁷⁷。《德國 2008 年投資協定範本》則規定基於雙重課稅協定或其他租稅協定所給予的優惠待遇，不受最惠國待遇義務拘束¹⁷⁸。

除禁止歧視待遇條款外，部分 IIAs 將公平與公正待遇條排除適用於特定租稅措施。例如《丹麥與土耳其雙邊投資協定》第 3 條第 1 項規定本條關於公平與公正待遇的內容對於締約方所締結之完全或主要與稅收有關之國際協定不具效力，顯示出協定對租稅主權的保留¹⁷⁹。

2. 原則性除外

此類條款在架構上採取全面排除投資協定適用於租稅措施的形式，但後續條文採反面列舉的方式，說明其適用範圍之例外與限制。透過「例外中的例外」的規範設計，將締約雙方認為仍應適用之特定投資保護條款明確列入條文，使部分租稅措施仍受到特定條款的規範。

例如《日本與韓國雙邊投資協定》第 19 條第 1 項規定：「除本條第 2、3 及 4 項另有明文規定外，本協定不適用於租稅措施」，後於第 2 項規定：「第 1 條、第 3 條、第 7 條、第 10 條、第 22 條及第 23 條應適用於租稅措施」，包括定義、近用司法之國民待遇、透明性、公平與公正待遇及徵收、次國家政府以及條約生效日等事項。條文第 1 項先原則性地將所有租稅措施排除於協定之適用範圍，再

¹⁷⁶ *Id.*

¹⁷⁷ France 2006 Model BIT, art. 5.

¹⁷⁸ German 2008 Model BIT, art. 3.4.

¹⁷⁹ Denmark-Turkey BIT, art. 3(3)(b).

透過例外規定將仍應受保障的投資保護條款明訂於條文中¹⁸⁰。這種設計確保在維護租稅主權的同時，對特定租稅措施仍可進行投資保護審查。

（三）共同租稅協商條款（joint tax consultation provision）

部分投資協定針對涉及租稅措施的爭議，設計「共同租稅協商機制」，要求投資人在提交仲裁前，須將爭議通知投資人母國與地主國之稅務主管機關，並由雙方稅務機關組成之協商委員會進行初步審議。最常見的適用情形為涉及徵收爭議，此類條文賦予稅務機關判斷空間，使其得以事先釐清措施是否構成徵收，以決定是否得進入 ISDS 程序¹⁸¹。

共同租稅協商機制的設計目的，在於透過稅務主管機關的協商，避免僅由仲裁庭解釋與判斷租稅措施之性質，藉此強化租稅主權保障¹⁸²。部分投資協定採取較為嚴格之設計，賦予雙方稅務機關共同判斷涉案租稅措施性質與合法性的權限，並明定當其作出不利於投資人的結論時，即排除投資人進一步提起仲裁之可能性¹⁸³。相對地，亦有協定僅將該協商機制設計為程序性前置要件，即便雙方未能達成共識，仍不妨礙投資人後續訴諸仲裁之權利¹⁸⁴。

二、GloBE 規則爭端與租稅除外條款

各項協定對「租稅措施」之定義與排除範圍存在高度差異，對於仲裁庭是否具有管轄權將產生實質影響。除了租稅除外條款文字本身，仲裁庭在個案中做成之解釋與判斷也對租稅爭端的管轄權具有決定性因素，並影響租稅除外條款在後

¹⁸⁰ 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Japan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for the Liberalization, Promotion and Protection of Investment, Mar. 22, 2002, Japan-S. Kor., art. 19.

¹⁸¹ Vatsal Vasudev, *Interactions Between Taxation Measures and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in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and Policy 2039* (Chaisse, J., Choukroune, L. & Jusoh, S. eds., 2021).

¹⁸² Ilias Bantekas, *Interstate Arbitration in International Tax Disputes*, 8(3) J. Int'l Disp. Settlement 514 (2017).

¹⁸³ E.g., Ecuador-Canada BIT, art. XII.

¹⁸⁴ E.g., CETA arts. 8.23, 28.7.

續仲裁案件中之適用。

若協定對「租稅措施」未設有任何除外條款，原則上協定中所有投資保護條款皆適用於租稅措施。投資人主張其因地主國在全球最低稅負制下採行之租稅措施而受有損害，仲裁庭對此類案件是否具有管轄權與爭端性質涉及租稅措施無關。

相對而言，納入租稅除外條款之協定則需依各 IIAs 對租稅措施之定義及排除範圍，判斷各國因應 GloBE 規則實施之措施是否構成「租稅措施」或「租稅事項」，以及該措施是否因租稅除外條款被排除於協定的投資保護範圍外。

（一）GloBE 規則相關措施是否構成「租稅措施」

國際投資仲裁實務對「租稅措施」與「租稅事項」之界定，傾向採取以實質法律效果為準的寬鬆解釋。在 Encana 案中仲裁庭即指出，「租稅措施」不僅限於以立法形式課徵稅負者，凡涉及決定應納稅額與退稅額之稅務制度以及應稅所得減免、扣抵與退稅，皆屬租稅措施的範疇，並強調判斷標準應取決於該措施之法律運作結果，而非其經濟效果¹⁸⁵。Murphy 一案仲裁庭則指出，「租稅事項」係指「對特定群體課予繳納金錢予國家之義務，以達成公共目的，且該納稅義務人本身不直接獲益之事項」¹⁸⁶。

基於仲裁實務，GloBE 規則所設計之各項補充稅制度，如 IIR、UTPR 與 QDMTT，係以跨國企業之超額利潤為稅基，依最低稅率補課差額稅負之法律措施。其適用邏輯、課稅機制與立法目的，皆圍繞著跨國企業納稅義務，應屬「租稅措施」之範疇。實務上，多數歐盟成員國及英國、韓國、日本、越南等國皆已透過納入國內既有稅法或制定專法之方式，將 GloBE 制度納入本國稅法架構。因此，GloBE 規則本質上係透過法律形式課徵對應所得之補充稅負，在形式與

¹⁸⁵ Encana Corporation v Ecuador (2006), para. 142.

¹⁸⁶ Murphy Exploration & Production Company – International v. The Republic of Ecuador, Partial Final Award, 6 May 2016, para. 159.

實質上均具「租稅措施」之特徵，原則上應符合國際投資協定中「租稅措施」之定義。至於租稅優惠之調整，明顯涉及企業應納稅額與應稅所得之減免與扣抵，亦符合租稅措施之定義。

（二）租稅除外條款對 GloBE 規則爭端進入 ISDS 程序之影響

針對 GloBE 規則相關措施所引發之爭端，能否進入 ISDS 程序，須進一步檢視爭端雙方適用之投資協定中是否包含「租稅除外條款」，以及該條款對特定投資保護條款所設排除範圍。此類條款之設計將直接影響仲裁庭是否具備審查 GloBE 規則相關措施之管轄權。

現行有效之 IIAs 中，多數為 1980 至 1990 年代簽署，屬於「舊世代協定」。當時對租稅主權關注相對較低，多未納入租稅除外條款¹⁸⁷。據英國國際法及比較法學院統計，截至 2023 年，僅約 10.5% 的 IIAs 明確納入租稅除外條款¹⁸⁸。鑒於舊世代協定仍占現行 IIAs 之多數，投資人於多數情況下仍可依投資保護條款對地主國的租稅措施提起投資仲裁。

新世代協定雖廣泛納入租稅除外條款，但不代表完全排除對租稅措施的保護。根據聯合國貿易暨發展會議（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對 2015 至 2022 年間簽署協定之研究，約 99% 的協定含有租稅除外條款，其中 83% 為部分除外，16% 為完全除外¹⁸⁹。然而，許多協定之部分除外條款仍明文保留特定投資保護條款對租稅措施之適用。以本文第四章所討論，最有可能與 GloBE 規則相關措施產生爭議之四項條款——徵收、公平與公正待遇、國民待遇

¹⁸⁷ OECD, Modernising investment treaties to support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New approaches and avenues for reform (Mar. 31, 2025), <https://www.oecd.org/content/dam/oecd/en/events/2025/03/investment-treaty-conference/Investment%20Treaty%20Conference%20-%20background%20note.pdf>.

¹⁸⁸ Brit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 WilmerHale, Tax-Related Measures in Investor-State Arbitration 7.

¹⁸⁹ UNCTAD, The Global Minimum Tax and Investment Treaties: Exploring Policy Options 5-6 (2023).

與最惠國待遇為例，研究指出 82% 的協定仍將「徵收條款」適用於租稅措施，另有超過半數保留「公平與公正待遇」、「國民待遇」與「最惠國待遇」條款之適用¹⁹⁰。

因此，在舊世代 IIAs 仍佔多數，且新世代 IIAs 的租稅除外條款多採有限排除設計，並未完全排除租稅措施進入 ISDS 程序的情況下，地主國為實施 GloBE 規則而課徵補充稅、調整租稅優惠，導致投資人遭受差別待遇、投資利益重大損失等侵害，多數情形下投資人仍可能援引協定中相關投資保護條款提出仲裁主張。

（三）例外情況下之仲裁管轄可能性

即使租稅除外條款在規範設計上排除仲裁庭對租稅措施之管轄，仲裁實務顯示，在極端例外情況下仲裁庭仍得對租稅措施進行實質審查。Yukos v. Russia 一案即為代表性案例。該案中，俄羅斯政府在 2003 年至 2007 年間，對 Yukos 集團採取大規模稅務重新評估、收取增值稅、罰鍰、凍結資產、強制執行等措施，最終導致公司破產，並將資產出售予俄羅斯國有企業¹⁹¹。

針對 Yukos 之稅務問題，雖然俄羅斯稅務部一度出具證明，表示 Yukos 已清償所有稅務債務，但其後仍倉促重新審計，要求 Yukos 在極短期限內繳納積欠之稅款、利息與罰鍰，金額高達 29 億歐元，並立即要求莫斯科法院命令 Yukos 公司支付上述稅款並發布禁制令扣押 Yukos 公司的資產。法院最終裁決 Yukos 必須償還大部分債務，稅務局接著採取強制措施低價拍賣下 Yukos 之子公司，該公司最終落入俄羅斯國有企業¹⁹²。Yukos 股東據此依《能源憲章條約》(Energy Charter Treaty, ECT) 提起仲裁，主張俄羅斯違反第 13 條徵收條款等投資保護規範。俄

¹⁹⁰ *Id.*

¹⁹¹ Yukos Oil Company (Isle of Man) v. Russian Federation, PCA Case No. AA 227, Award, 18 Jul. 2014, para. 1385.

¹⁹² 林思妤，國際投資法與國際人權法對於財產權保障之比較，國立政治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78-79（2023 年）。

羅斯則主張，ECT 第 21 條第 1 項為租稅除外條款，仲裁庭對該爭議無管轄權¹⁹³。

仲裁庭以兩項獨立理由認定其對本案具管轄權。其一，依 ECT 第 21 條第 5 項，若租稅措施性質構成徵收，仍應受第 13 條徵收條款規範；其二，俄羅斯之措施雖以課稅為名，實則缺乏正當課稅目的，意圖透過稅收手段摧毀企業並轉移其資產，非屬「善意 (bona fide)」租稅措施，因此不得主張適用第 21 條第 1 項之排除條款¹⁹⁴。最終仲裁庭裁定俄羅斯違反條約義務，對投資人負賠償責任¹⁹⁵。

此案確立「善意原則」對租稅除外條款適用之限制：若地主國以課稅為手段，實質目的並非基於一般公共目的，而在於摧毀企業或剝奪投資權益，則即使形式上屬稅制設計，亦不得受租稅除外條款保障¹⁹⁶。事實上，ECT 條文本身並未明文提及「善意」或「惡意」租稅措施，此標準係仲裁實務透過條約解釋發展而來。

雖然後續案件中有投資人嘗試援引 Yukos 案所建構之「善意租稅措施」作為論據，但多數仲裁庭對此採取審慎態度，強調課稅權屬國家核心主權，僅在地主國嚴重濫用稅法、借課稅名義實則剝奪投資人權益等極端例外情況下，才能排除租稅除外條款適用，且投資人須承擔高度舉證責任¹⁹⁷。儘管 Yukos 案所採之標準未獲普遍採納，其對租稅除外條款之適用仍產生實質影響。

在此背景下，需進一步檢視各國因應 GloBE 規則所採取的租稅措施，是否

¹⁹³ Yukos Oil Company (Isle of Man) v. Russian Federation, *supra* note 191, para. 1385.

¹⁹⁴ *Id.* paras. 1406-1407.

¹⁹⁵ *Id.* para. 161.

¹⁹⁶ *Id.* paras. 1444-1445.

¹⁹⁷ *E.g.*, Eiser Infrastructure Limited and Energia Solar Luxembourg S.a.r.l. v. Kingdom of Spain, ICSID Case No. ARB/13/36, Award, 4 May 2017, para. 270; SolEs Badajoz GmbH v. Kingdom of Spain (ICSID Case No. ARB/15/38). Award of 31 July 2019, para. 276; Isolux Infrastructure Netherlands B.V. v. Kingdom of Spain, ICSID Case No. ARB/14/8, Award, 12 Jul. 2016; Masdar Solar & Wind Cooperatief UA v. Kingdom of Spain, ICSID Case No. ARB/14/1, awarded 16 May 2018 para. 284; Watkins Holdings S.à rl and others v. Kingdom of Spain (ICSID Case No. ARB/15/44), awarded 21 Jan. 2020, paras. 269-270; Masdar Solar & Wind Cooperatief U.A. v. Kingdom of Spain, ICSID Case No. ARB/14/1, Award, 16 May 2018, para. 291.

可能引發類似爭議。就取消或調整租稅優惠而言，因善意原則之認定門檻極高，一國單純取消或調整租稅優惠，難以被認定為濫用稅法，且此類措施亦難達到摧毀企業之效果，因此在實務上不會被視為惡意租稅措施。

至於課徵補充稅措施，IIR 與 QDMTT 係基於多邊共識下的稅制改革成果，各國原則上依循 GloBE 立法範本之計算與分配方式課徵補充稅，實施國以此稅制為名義摧毀企業或剝奪投資權益的可能性極低。然而，UTPR 之設計則存在潛在風險。由於其分配基礎並非依據所得來源與課稅地之聯繫因素，可能導致部分跨國企業承擔遠超過其實際利潤的稅負。在極端情況下，若一國不當運用 UTPR，將補充稅負擔集中於少數境內實體，造成特定投資人權益遭嚴重侵害，則投資人或可主張該措施違反善意原則，即使 IIA 中設有租稅除外條款，仲裁庭仍可能對此惡意租稅措施行使管轄權。惟此情形是否構成「惡意課稅」仍視個案而定，且在此類極端例外下，投資人需承擔高度舉證責任，成功援引之可能性相對有限。

第四節、小結

GloBE 規則相關措施是否能作為國際投資協定下的仲裁爭端，須經層層程序性審查。首先，仲裁庭須確認爭端是否涉及受保護之投資，以及聲請人是否具備投資人資格。特別是在多層控股結構下，間接持股公司或實際負擔補充稅或被撤銷租稅優惠之公司能否主張自身權益，將成為程序爭點。

其次，即便符合投資與投資人之定義，若適用之投資協定設有租稅除外條款，仲裁庭仍可能因爭端性質而拒絕行使管轄權。因此，投資人須逐一克服上述程序障礙，仲裁庭方能進入實體審查階段，判斷 GloBE 規則相關措施是否違反協定保障之投資保護義務。

如本章所述，多數投資協定並未全面排除租稅措施，意味著 GloBE 規則相

關措施對投資造成之影響仍可能落入協定保護範圍內。是以，下一章將進一步探討此制度在實體面是否構成對外國投資人之差別待遇、不當剝奪，或其他違反協定義務的行為，並評估投資人能否據此主張其在國際投資法下的救濟權利。



第四章 對地主國採行 GloBE 規則相關措施可能違反國際投資保障義務之評估

本文於前一章探討 GloBE 規則爭端是否符合進入 ISDS 之程序要件，包括投資與投資人之認定、租稅除外條款之適用等程序性爭點。惟儘管滿足程序門檻，實體法層面的爭議仍為投資人主張違反 IIA 之核心。

GloBE 規則對傳統租稅競爭造成重大影響，隨著各國陸續立法課徵補充稅、調整既有租稅優惠或提高企業所得稅率，相關稅制改革可能導致國家無法履行既有租稅待遇承諾，在本國與外國投資人間構成歧視，甚至對外國投資人之投資價值構成重大侵害，引發違反投資保護條款之疑慮。

有鑑於此，本章將進一步分析在國際投資法下，最有可能因 GloBE 規則相關措施而爭議的投資保護條款，包括公平與公正待遇、禁止歧視待遇與徵收條款。透過檢視相關仲裁實務對上述條款之解釋與適用，探討 GloBE 規則相關措施是否構成對投資人權利的侵害，並提出投資人與地主國之可能主張。

第一節、公平與公正待遇條款

公平與公正待遇條款被納入約 95% 的 IIAs 中，為 ISDS 案件中最常被投資人援引之投資保護條款，對 ISDS 實務之重要性不言而喻。在舊世代投資協定中，該條款之規範用語往往以簡略、抽象或不明確的方式定義。基於此特性，公平與公正待遇條款逐漸演變為涵蓋各種投資保護義務的條款，投資人多引用該條款對任何其認為損害投資利益的措施提起 ISDS¹⁹⁸。

¹⁹⁸ Florencia Sarmiento & Suzy H. Nikiéma, Fair and Equitable Treatment: Why It Matters and What Can Be Done (2022), <https://www.iisd.org/publications/brief/fair-equitable-treatment>.

根據多數仲裁實務見解，公平與公正待遇條款雖不排除締約國基於公共利益調整國內法規與政策，但仍須符合一定限制¹⁹⁹。仲裁實務未就此限制與締約國之裁量權範圍形成一致標準，但承認數項公平公正待遇條款之內涵要素，包括對正當合法期待之保護、對法律穩定性之期待、免於脅迫與騷擾之保障、防止專斷、不成比例、過度且缺乏善意原則之行為、正當法律程序與透明性義務²⁰⁰。地主國在推動租稅政策時，應特別留意此等保障內涵，以評估稅制之執行方式與變動是否引發與租稅相關之投資爭端風險。

就 GloBE 規則相關措施之實施而言，公平與公正條款所保障之「正當合法期待」與「法律穩定性」最具關聯性。此係因企業之有效稅率低通常是各國在其稅法架構下提供租稅優惠所致。許多國家的企業所得稅名目利率雖高於 15%，但跨國企業之有效稅率因當地稅法提供之租稅抵減、扣除等租稅優惠而遠低於名目稅率²⁰¹。除了普遍適用之租稅政策，各國為吸引外人直接投資，亦多立法提供外資企業實質免稅或遞延課稅租稅優惠²⁰²。這些租稅優惠使外國投資人預期該國會維持穩定的法律架構，以確保投資人實現投資之正當預期。隨著 GloBE 規則之實施，各國調整或廢除現行租稅優惠、增訂最低稅負規定之情形日益普遍，可能影響投資人原先基於特殊租稅待遇或國家具體承諾所建立之合理期待，亦可能因突如其來之規範變動衝擊法律穩定性。

因此，以下將對公平與公正待遇條款所保障之「正當合理期待」與「法律穩定性」進行分析，探討各國為實施 GloBE 規則採取之措施是否對外國投資人之權益構成不當侵害。

¹⁹⁹ RUDOLF DOLZER ET AL., *supra* note 113, at 206.

²⁰⁰ FLORENCIA SARMIENTO & SUZY H. NIKIEMA, *supra* note 198.

²⁰¹ OECD, *Global Anti-Base Erosion Model Rules (Pillar Two):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May, 2025), <https://www.oecd.org/content/dam/oecd/en/topics/policy-sub-issues/global-minimum-tax/faqs-on-model-globe-rules.pdf>

²⁰² UNCTAD, *Corporate Income Taxes and Investment Incentives: A Global Review* (July 12, 2022), 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official-document/diaepcbinf2022d3_en.pdf.

一、正當合理期待

正當合理期待之概念在於保護投資人對公權力機關所採立場之信任。雖未明文出現在多數投資協定中，但已被仲裁實務廣泛承認為公平與公正待遇標準之核心概念。

(一) 理論基礎與仲裁實務

投資人之正當合理期待，係以地主國之法律架構，及其明示或默示作出的任何承諾與表示為基礎。投資人有權信賴之法規架構包括立法與條約，以及在法令 (decree)、許可證與其他類似行政聲明中所載保證²⁰³。「明確表示」與「具體保證」則對正當合理期待之形成至關重要，為正當合理期待存在的有力依據²⁰⁴。地主國若撤回已使投資人產生正當合理期待的保證，將違反公平與公正待遇²⁰⁵。

以 *Total v. Argentina* 案為例，仲裁庭指出，若地主國透過投資契約、特許權或穩定條款等方式，明確承擔未來特定法律義務，則投資人基於此產生的期待無疑屬於「正當合理」之期待，投資人有權依法據以信賴並應受到公平與公正待遇條款保障。同樣地，若地主國主管機關的行為或聲明足以使投資人合理相信此類義務存在，並據以投入資金或負擔成本進行投資，亦可能構成正當合理期待。若地主國未能履行該等期待，則可能使投資人或投資遭受損害。

仲裁庭更指出，在適用正當合理期待的概念時，仲裁實務經常強調，「特定承諾」會限制地主國因應情勢變遷而調整法律架構之權利，且僅有針對特定投資人所作的表示方能被強制執行並正當化其信賴。換言之，投資人的正當合理期待

²⁰³ RUDOLF DOLZER ET AL., *supra* note 113, at 208-209.

²⁰⁴ *E.g.*, *Parkerings v Lithuania*, Award, 11 September 2007, para. 331; *Duke Energy v Ecuador*, Award, 18 August 2008, paras. 359-364; *Saint-Gobain v Venezuela*, Decision on Liability and the Principles of Quantum, 30 December 2016, para. 531; *EDF v Romania*, Award, 8 October 2009, para. 217; *Greentech v Italy*, Final Award, 23 December 2018, para. 453; *United Utilities v Estonia*, Award, 21 June 2019, paras. 576-578.

²⁰⁵ *E.g.*, *Total v Argentina*, Decision on Liability, 27 December 2010, para. 119.

可以建立於地主國明示或默示作出的任何承諾與表示之上。若地主國撤回先前使投資人形成正當合理期待的保證，即可能違反公平與公正待遇原則²⁰⁶。

相較之下，一般法律規範是否足以形成正當合理期待，在實務上較具爭議。在多起捷克、義大利與西班牙之再生能源投資爭端案件中，仲裁庭見解分歧。在 *Charanne v. Spain* 案中，仲裁庭認為一般立法即便對特定產業投資人具吸引力，若未明示穩定條款或具體承諾，則不產生正當合理期待。仲裁庭更指出，投資人應預見一般法律規範隨公共利益而調整，故法律規範的存在本身不足以構成對法制不變的合理期待²⁰⁷。

類似見解亦見於 *Voltaic Network v. Czech Republic* 案中，仲裁庭強調，在欠缺穩定條款與明確保證的情況下，投資人不得依一般法律規範合理期待地主國之租稅、補貼等優惠制度將恆常不變²⁰⁸。然而，部分仲裁庭認為，即使無特定承諾，一般法律規範亦得形成正當合理期待。例如，在 *Sunreserve v. Italy* 案中，仲裁庭認為投資人得依一般法規範產生正當合理期待，且地主國無需做出具體承諾²⁰⁹。在 *Novenergia v. Spain* 案中，仲裁庭亦指出，即使地主國未做出明示承諾或保證，投資人仍可依地主國非針對個別投資人之一般法律架構、措施或聲明，產生正當合理期待²¹⁰。

總體而言，因仲裁庭判斷正當合理期待存在與否的標準不一，所以無論是地主國在投資契約或法令中做成的具體承諾與保證，或是一般法律規範，皆可能使投資人產生正當合理期待。然而，依仲裁實務趨勢，當地主國明確做出具體表示、承諾或保證，且投資人據此進行投資，仲裁庭較可能認定投資人具有正當合理期

²⁰⁶ *Total v Argentina*, Decision on Liability, 27 December 2010, paras. 117-120.

²⁰⁷ *Charanne B.V. Construction Investments S.A.R.L.* paras. 498-503.

²⁰⁸ *Voltaic Network GmbH* paras. 495-537.

²⁰⁹ *Sun Reserve Luxco Holdings SRL v. Italy*, SCC Case No. 132/2016, Award (Mar. 25, 2020), para. 699.

²¹⁰ *Novenergia II - Energy & Environment (SCA) (Grand Duchy of Luxembourg), SICAR v. Kingdom of Spain*, SCC Case No. 2015/063, Final Award (Feb. 15, 2018), paras. 650-652.

待²¹¹。地主國撤銷使投資人產生合理期待之承諾或保證時，則可能違反公平與公正待遇條款²¹²。

(二) GloBE 規則相關措施是否違反正當合理期待

GloBE 規則推動後，各國主要可能採行兩類措施：其一為取消或調整租稅優惠，其二則為課徵補充稅。兩者雖同為確保跨國企業有效稅率不低於 15% 的租稅措施，但前者係以修法或以行政行為直接撤銷或調整特定出租稅優惠，後者則係修法針對跨國企業享有之低稅待遇課徵補充稅，間接影響到跨國企業既有之租稅優惠，此差異可能導致取消或調整租稅優惠之法律風險高於課徵補充稅。

1. 租稅優惠之調整或取消

在 GloBE 規則實施下，各國將取消或調整大幅降低企業有效稅率之租稅優惠。這些措施是否將導致投資人之「正當合理期待」落空，取決於地主國授予優惠時，是否曾對投資人做出具體且明確的承諾。

若地主國係透過談判或賦予國家代表裁量權之方式，與個別投資人簽訂投資契約授予租稅優惠，則契約中具體且明確約定之權利義務，將成為投資人主張正當合理期待的重要依據。此外，契約在各國法律體系中，均被視為建構法律安定性與可預測性的典型方式，因此，基於契約形成之期待，顯然應獲較高度度的保障²¹³。若投資契約另設有穩定條款，限制地主國在特定期間內變更租稅待遇，使

²¹¹ See, *Horthel Systems BV, Poland Gaming Holding BV and Tesa Beheer BV v Poland*, PCA Case No. 2014-31, para. 238 (Award of 16 February 2017) (“The Tribunal agrees. Indeed, the case law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tribunals suggests that, save in rare circumstances, legitimate expectations are generated through specific, individualized undertakings of a state.”); Igor V Timofeyev, Joseph R Profaizer & Adam J Weiss, *Investment Disputes Involving the Renewable Energy Industry Under the Energy Charter Treaty*, LEXOLOGY (Nov. 10, 2020), <https://www.lexology.com/library/detail.aspx?g=7656e84a-1722-4639-990e-401a2f249e61>.

²¹² *Tecmed v Mexico*, Award, 29 May 2003, para. 154; *Siag v Egypt*, Award, 1 June 2009, para. 450; *Charanne v Spain*, Award, 21 January 2016, para 486; *Devas v India*, Award on Jurisdiction and Merits, 25 July 2016, paras. 465-470.

²¹³ 楊筑羽，論國際投資條約中合理期待之爭議—以德國憲法法院第 13 次核能法修正案判決對合理期待之解釋試評國際投資爭端 *Vattenfall II* 案之可能發展，經貿法訊，第 215 期，頁 24，

投資人合理相信地主國將維持租稅優惠，並據此投入資金進行投資，則此更能證明投資人正當合理期待的存在。

此外，各國經常透過設立經濟特區吸引外國投資人，並提供所得稅或關稅減免、基礎設施支持、貿易便捷化等優惠措施²¹⁴。所得稅優惠則常見於租稅假期、依特定績效要件給予之豁免或減免，以及優惠稅率。在開發中國家，租稅假期與低稅率優惠尤為普遍，對有效稅率之影響顯著，並可能使企業有效稅率降至 15% 以下²¹⁵。經濟特區之設立與核准程序往往涉及主管機關對特定投資人的裁量性決定²¹⁶，且地主國常對經濟特區投資人之免稅或優惠稅率做成具體承諾，並在相關法規中敘明該承諾²¹⁷。當承認外國投資人為經濟特區居民 (resident) 時，即已展現出「提供優於一般國內投資條件」的意願²¹⁸。從仲裁庭的角度觀之，這將提高投資人之合理期待，並促使其承擔更大投資風險；一旦優惠被撤回，投資人潛在損失亦相對增加²¹⁹。換言之，部分仲裁庭可能據此認為，地主國有意保證最優惠之投資條件，進一步強化了投資人對租稅優惠的正當合理期待，也加重地主國的保護義務²²⁰。

因此，地主國若依投資契約，或透過經濟特區法規與許可證之授予，向特定投資人提供免稅或優惠稅率，其因應 GloBE 規則而修法或以行政處分撤銷或調整此優惠，均可能破壞投資人對特定待遇或承諾形成之正當合理期待，進而違反公平與公正待遇條款。

相較之下，若租稅優惠僅存在普遍適用於所有企業之國內稅法或投資法架構

2017 年 6 月 12 日。

²¹⁴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9: SPECIAL ECONOMIC ZONES 161-162 (2019).

²¹⁵ JOY WARUGURU NDUBAI-NGIGI, *supra* note 130, at 7.

²¹⁶ *Id.* at 170.

²¹⁷ Sayfutdinov, K., *Promises and Commitments: The Role of Fair and Equitable Provisions and Local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Law and Regulations in Generating Legitimate Expectations*,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ENTRAL ASIAN LAW, 214 (Urinboyev, R. ed., 2024).

²¹⁸ JOY WARUGURU NDUBAI-NGIGI, *supra* note 130, at 14.

²¹⁹ *Id.*

²²⁰ *Id.*

下，而無針對特定投資人所作之明確承諾，仲裁庭通常較不傾向承認投資人得據此形成合理期待²²¹。儘管在前述再生能源案件中，有仲裁庭認為一般法律規範亦能產生合理期待，但多數仲裁庭仍強調具體承諾之必要性²²²。因此，在僅基於一般法律提供之普遍免稅或減稅措施下，地主國因應 GloBE 規則調整稅制，通常不足以構成 FET 條款的違反。惟若該等法規另含有穩定條款，明確承諾在一定期間內不變更投資人之租稅待遇，則此類承諾可強化投資人主張正當合理期待的可能性²²³。

2. 補充稅之課徵

相較於直接取消或調整租稅優惠，補充稅之課徵係透過額外稅負間接抵銷投資人所享有之優惠，其是否同樣使投資人基於地主國具體承諾而形成的正當合理期待落空，為主要爭點。換言之，雖然補充稅在形式上並未撤銷既有租稅優惠，但其計算基礎與實質效果仍削弱具體承諾所保障之優惠，使投資人之正當合理期待落空，進而構成對公平與公正待遇條款的違反。以下將分別檢視 QDMTT、IIR 與 UTPR，在地主國已有具體承諾存在時，是否同樣侵害投資人之正當合理期待。

若依 QDMTT 課徵國內補充稅，其計算基礎係針對租稅優惠所致有效稅率低於 15% 的部分，實質上等同於抵銷投資人因免稅或減稅優惠享有之利益。雖然形式上投資人仍保有既有租稅優惠，但補充稅造成的投資價值損害，與直接取消或調整優惠效果相當。在此情況下，地主國可被視為實質撤回先前的優惠承諾，

²²¹ Igor V Timofeyev, Joseph R Profaizer & Adam J Weiss, *supra* note 221.

²²² Charanne v Spain, Award, 21 January 2016, paras. 493, 499; Masdar v Spain, Award, 16 May 2018, paras. 520–521; RREEF v Spain, Decision on Responsibility and on the Principles of Quantum, 30 November 2018, paras. 320–321; Cube v Spain, Decision on Jurisdiction, Liability and Partial Decision on Quantum, 19 February 2019, paras. 388, 397; NextEra v Spain, Decision on Jurisdiction, Liability and Quantum Principles, 12 March 2019, paras. 587–596; 9REN v Spain, Award, 31 May 2019, paras 292–299; SolEs Badajoz v Spain, Award, 31 July 2019, para. 313; InfraRed v Spain, Award, 2 August 2019, paras. 366–367, 406–436; RWE v Spain, Decision on Jurisdiction, Liability, and Certain Issues of Quantum, 30 December 2019, paras. 453–462, 535–549; Watkins v Spain, Award, 21 January 2020, paras. 495, 533.

²²³ E.g., Horthel Systems BV, Poland Gaming Holding BV and Tesa Beheer BV v Poland, PCA Case No. 2014–31 (Award of 16 February 2017) para. 240.

使投資人正當合理期待落空並因此遭受損失，應構成公平與公正待遇條款的違反²²⁴。

至於依 IIR 或 UTPR 課徵之補充稅，則係針對跨國集團其他成員在低稅負管轄區之所得而課徵補充稅，並非直接針對該境內投資人享有的優惠。雖然此類補充稅會提高投資人之有效稅率，但因其課徵並非基於地主國承諾之租稅優惠所產生之低稅負所得，故難認定地主國撤回其租稅優惠承諾，導致投資人之正當合理期待落空。有學者從另外一個角度分析，當地主國提供租稅優惠導致第三國依 IIR 或 UTPR 課徵補充稅時，投資人確實喪失租稅優惠所帶來之利益。然而，地主國本身並未直接撤回承諾，而現行 IIAs 亦僅規範地主國措施，未涵蓋「第三國措施導致投資人期待落空」之情況。因此，地主國依 IIR 或 UTPR 課徵補充稅不違反投資人之正當合理期待²²⁵。

二、法律穩定性

法律穩定性為公平與公正待遇條款之核心要素之一，旨在確保投資人進行投資活動所依據之法律架構具穩定性，降低投資人面臨之政治風險。在 *Total v. Argentina* 一案，仲裁庭即指出法律穩定性、可預測性與一致性對投資人至關重要，特別在其商業計畫將持續數年的情況下²²⁶。

（一）理論與仲裁實務

仲裁實務普遍認為，投資人得信賴其投資當時地主國既有的法律架構²²⁷。若地主國對既有監管架構進行根本性變更，且未考量投資人基於先前制度進行投資

²²⁴ Błażej Kuźniacki, *supra* note 118.

²²⁵ Gergely Czoboly & Gabriella Erdős, QDMTT's Alignment With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s With Potential Deviations, 53(4) *INTERTAX* 362, 371 (2025).

²²⁶ *Total v Argentina*, Decision on Liability, 27 December 2010, para. 114.

²²⁷ RUDOLF DOLZER ET AL., *supra* note 113, at 206; e.g., *Tecmed v Mexico*, Award, 29 May 2003, para 154.

之情境時，將違反公平與公正待遇條款保障之法律穩定性²²⁸。然而，此條款並未完全限制地主國變更國內規範之權利。仲裁實務指出，應將地主國為公共利益規範國內事務之權利納入考量²²⁹。

因此，法律穩定性對投資人之保護非涵蓋所有不利的法律變動，僅限於對監管架構之根本性變更。重點在於，地主國之措施是否逾越正常的監管權力，並根本性地改變投資所依據之監管架構，超出可接受之變動幅度²³⁰。仲裁庭在 RREEF v. Spain 案即指出，穩定性並不同於不可變動，在未約定穩定條款之情況下，地主國仍可調整其監管架構。但若對投資條件造成不可預測的根本性轉變，將違反創造穩定環境之義務。

儘管許多仲裁案件將「根本性變更」作為地主國違反法律穩定性之判斷基準，惟在欠缺一致定義之情況下，仲裁庭之解釋方式各不相同，其中較常被援引之判斷要件包括變動之幅度、經濟影響與不可預設性。

變動之幅度係指既有法規制度之變動程度，若地主國取消或調整之法規內容為原先制度中的「本質特徵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此類變更較有可能違反投資人對法律穩定性之期待²³¹。以 Micula v. Romania 案為例，仲裁庭認為羅馬尼亞修法取消投資獎勵措施之行為，使舊法大幅喪失其實質內容。因該法原本旨在透過關稅減免與機械增值稅之豁免、原料關稅退稅與所有權減免等優惠吸引對貧困地區之投資，在地主國修法後僅剩所得稅減免優惠。其修法不是對優惠措施的

²²⁸ Eiser v Spain, Award, 4 May 2017, para. 363, 382.

²²⁹ Parkerings v Lithuania, Award, 11 September 2007, paras. 332–338; Paushok v Mongolia, Award on Jurisdiction and Liability, 28 April 2011, para. 302; Impregilo v Argentina, Award, 21 June 2011, paras 290–291; Ulysseas v Ecuador, Final Award, 12 June 2012, paras. 240–256; TECO v Guatemala, Award, 19 December 2013, para. 629; Mobil & Murphy v Canada, Decision on Liability and on Principles of Quantum, 22 May 2012, para. 153.

²³⁰ RUDOLF DOLZER ET AL., *supra* note 113, at 207; e.g., Charanne v Spain, Award, 21 January 2016, para. 517; Philip Morris v Uruguay, Award, 8 July 2016, para. 423; Eiser v Spain, Award, 4 May 2017, para 363; Novenergia II v Spain, Final Award, 15 February 2018, para. 656.

²³¹ RENERGY S.à r.l. v. Kingdom of Spain, ICSID Case No. ARB/14/18, para. 681.

刪減，而是徹底終止²³²。故仲裁庭認定羅馬尼亞違反投資人對法律穩定性之期待²³³。

經濟影響則係指法規制度變更對投資人造成之損害程度²³⁴。例如在 *Toto v. Lebanon* 案中，黎巴嫩變更監管架構導致投資人之主要建材如水泥關稅倍增、燃料價格上漲 40%，提高投資人之成本²³⁵。然而，仲裁庭認為該成本增加與整體投成本相比仍屬輕微，未違反公平與公正待遇下保障之法律穩定性²³⁶。

不可預測性則係指地主國給予投資人越多時間適應新的監管制度，例如透過在實際修法前先公告一段時間，或設立過渡期間，則越有可能尊重法律穩定性；反之，若制度變更包含溯及既往效果，則該立法變動愈可能違反投資人對法律穩定性之期待。在 *Voltaic Network GmbH v Czech Republic* 案中，仲裁庭指出，自地主國主管機關針對新稅制進行實質討論至最終立法課徵稅負之間約一年的時間，期間新聞媒體及專家學者亦提及課徵新稅的可能性，故排除投資人對既有稅制不變之期待²³⁷。

（二）GloBE 規則相關措施是否違反法律穩定性

法律穩定性與正當合理期待雖皆屬公平與公正待遇條款之構成要素，但兩者著重之面向不同。在多數仲裁案件中，正當合理期待主要關注投資人對地主國具體承諾的依賴，例如投資契約、許可證或經濟特區法規所做之具體承諾；法律穩定性則不要求存在具體承諾，而是評估地主國對整體法律與監管架構的變動是否屬於根本性、不可預測之改變，進而對投資環境造成重大不確定性。換言之，法

²³² Ioan Micula, Viorel Micula, S.C. European Food S.A., S.C. Starmill S.R.L. and S.C. Multipack S.R.L. v. Romania [I], ICSID Case No. ARB/05/20, para. 684.

²³³ *Id.* para. 725.

²³⁴ *RENERGY S.à r.l. v. Kingdom of Spain*, ICSID Case No. ARB/14/18, para. 681.

²³⁵ *Toto Costruzioni Generali S.p.A. v. The Republic of Lebanon*, ICSID Case No. ARB/07/12, para. 239.

²³⁶ *Id.* para. 244.

²³⁷ *Voltaic Network GmbH v Czech Republic*, PCA Case No. 2014-20 (Award of 15 May 2019), paras. 479, 514-517.

法律穩定性分析聚焦於國內法整體架構與制度的持續性與可預測性，相對不仰賴地主國基於投資契約或以其他形式做成具體承諾認定地主國對投資人之侵害。

在 GloBE 規則推動下，地主國可能採行兩類措施：其一為取消或調整租稅優惠，其二為課徵補充稅。以下將分別討論兩者對法律穩定性之影響。

1. 取消或調整租稅優惠

各國因應 GloBE 規則取消或調整租稅優惠，勢必改變原有稅制架構。然而，法律穩定性並非完全限制地主國變更國內法之權力，而是評估變動是否根本改變投資所依據的制度框架。判斷標準包括變動幅度、對投資人之經濟影響、變化之不可預測性與涉及之公共利益等。

首先，就變動幅度而言，須判斷措施是否改變原制度的「本質特徵」。若投資人原本享有免稅優惠或極低稅率，透過修法取消租稅優惠將有效稅率提高至 15% 或以上，使舊法大幅喪失其授予之租稅優惠內容，可能構成根本性變動；若僅從 12% 提高至 15%，則改變幅度較小，對法律穩定性影響有限²³⁸。

其次，對投資人之經濟影響愈大，與法律穩定性之衝突可能性愈高。儘管仲裁庭對於經濟影響須達何種程度未形成普遍認定標準，但觀察過往仲裁案件之見解，例如在 *Toto v. Lebanon* 案中，監管架構變更導致投資人之主要建材關稅倍增並使燃料價格上漲 40%，即使大幅提高投資人成本，仲裁庭仍認為此法規變動不違反法律穩定性。因此，修法調整租稅優惠，使投資人有效稅率達 15% 之措施，通常不會對投資人造成重大經濟損害。然而，若地主國修法取消租稅優惠，將使投資人負擔極高所得稅率，則可能對投資環境之法律穩定性構成重大影響。

再者，就不可預測性而言，若地主國在變更稅制前提供充分預告，例如公開

²³⁸ UNCTAD, *supra* note 189, at 8.

討論期間或事前資訊披露，則可增強措施合法性。在 *Voltaic Network GmbH v. Czech Republic* 案中，地主國之稅制改革經過約一年的公開討論，仲裁庭據以認定此法律變動具可預測性²³⁹。全球最低稅負制之藍圖報告已於 2020 年發布，各國自 2024 年起陸續實施 GloBE 規則，期間許多國際機構亦發布 GloBE 規則對各國既有租稅優惠之法律風險研究報告²⁴⁰。因此，地主國若在修法調整租稅優惠前，提供充分預告期間，甚至是以過渡期陸續取消租稅優惠，投資人應可預見此稅制變更，不構成違反法律穩定性。

最後，涉及之公共利益越重要，投資人對法律變動之可預期性愈高。在 *Renergy v. Spain* 案中，仲裁庭指出地主國無需將投資人之利益置於所有考量之上，公平與公正待遇原則之適用允許地主國進行利益權衡，而在判斷地主國是否此原則時，必須考慮到國際法領域高度尊重國家之規制權²⁴¹。GloBE 規則旨在防止稅基侵蝕與利潤移轉，建立公平國際租稅環境，具公共利益目的。然而，地主國為因應 GloBE 規則而取消租稅優惠，甚至將有效稅率提高到 15% 以上，是否仍能主張係基於公共目的則具爭議性。

儘管在 *Philip Morris v. Uruguay* 案，仲裁庭之多數意見認為，多數仲裁庭認為若措施具高度公共利益、獲國際普遍關注，即便該措施非依國際規範或指引之措施，且未曾見於過去之實踐中，只要具備合理依據且不具歧視性，則不當然違反公平與公正待遇條款²⁴²。然而，少數意見則指出，偏離國際監管架構且缺乏充分討論、研究或公眾參與程序之全新措施，較有可能構成專斷、不成比例或缺政策目的合理關聯性之措施²⁴³。換言之，若地主國取消或調整租稅優惠導致有效

²³⁹ *Voltaic Network GmbH v. Czech Republic*, PCA Case No. 2014-20 (Award of 15 May 2019), paras. 479, 514-517.

²⁴⁰ OECD, *Tax Challenges Arising from Digitalisation – Report on Pillar Two Blueprint* (2020), <https://www.oecd.org/tax/beps/tax-challenges-arising-from-digitalisation-report-on-pillar-two-blueprint.pdf>; GloBE Model Rules, *supra* note 21.

²⁴¹ *RENERGY S.à r.l. v. Kingdom of Spain*, ICSID Case No. ARB/14/18, para. 155.

²⁴² *Philip Morris v. Uruguay* ICSID Case No. ARB/10/7, Award, July 2016, paras. 430-433.

²⁴³ *Philip Morris v. Uruguay* ICSID Case No. ARB/10/7, Concurring and Dissenting Opinion Co-Arbitrator Gary Born, 8 July 2016, paras. 126-127.

稅率逾 15%，投資人可能主張該等措施與政策目標間不具合理關聯性，進而違反公平與公正待遇之保障。

綜上所述，若地主國僅將稅率微幅調高至 15%，且修法前已充分預告，通常難以構成對法律穩定性的侵害。但若取消優惠導致稅負大幅提高逾 15%，且未提供一定期間因應此稅制變動，投資人可能主張其違反公平與公正待遇條款所保障之法律穩定性。

2. 補充稅之課徵

課徵補充稅亦會改變原有稅制架構，其是否根本性地改變投資所依據之監管架構，亦須依變動幅度、經濟影響、不可預測性與公共利益進行評估。

首先，就變動幅度與經濟影響而言，QDMTT 係將境內低稅負集團成員之有效稅率提高至 15%，依過去仲裁實務，此類調整難謂構成制度本質的改變，對投資人經濟利益的衝擊亦屬有限。IIR 則由母公司所在國針對其境外子公司低稅所得課徵補充稅，雖然並非基於母公司自身所得，但母公司對子公司之利潤具有經濟利益，課徵補充稅仍屬於合理的稅制延伸，對跨國企業母公司投資人而言通常不會構成重大經濟影響。

然而，就 UTPR 而言，其並非針對納稅企業自身低稅所得，而是基於同一集團其他成員之低稅負而加以分配。若其補充稅負超過企業自身所得，或占比過高，即可能根本性地改變投資人投資時所信賴的稅制環境，並造成嚴重經濟影響，進而違反公平與公正待遇條款所保障的法律穩定性。然而，GloBE 立法範本設有實質所得排除、微量排除與安全港條款，得以減輕實際稅負與合規成本，是以 UTPR 是否構成侵害仍須視實施國課稅方式與實際負擔額判斷²⁴⁴。

²⁴⁴ GloBE Model Rules, *supra* note 21, art. 5.2.2

其次，就變化之不可預測性而言，如同取消或調整租稅優惠之情況，若地主國在變更法律架構前提供充分的預告期間，則有助於支持措施之合法性。OECD 早於 2021 年 12 月即發布 GloBE 立法範本²⁴⁵。該稅制改革係經包容性架構成員長期協商之成果，投資人理應可預見各國將自 2024 年起陸續推行相關制度並調整國內稅法。更何況，若一國未能將有效稅率提高至 15%，其稅基亦將遭他國透過補充稅吸收，意味著跨國企業的利潤在多數情況下都適用最低有效稅率。在此背景下，投資人難以主張相關稅制變動屬於不可預期。

最後，就公共利益而言，GloBE 規則防止稅基侵蝕與利潤移轉，並減少國際租稅競相逐底，其政策目的獲得廣泛國際支持²⁴⁶。既然國際間已形成「利潤移轉危害租稅公平」之共識，投資人理應預期各國將逐步落實 GloBE 規則，以建立更公平之國際租稅秩序。然而，若地主國課徵之補充稅明顯超出 GloBE 立法範本設計，且未合理依循相關釋例與指引文件，則投資人可能主張此舉已偏離政策目的，欠缺合理關聯性，進而違反公平與公正待遇保障。

整體而言，依 QDMTT 與 IIR 實施補充稅課徵措施，不會根本性改變既有稅制，對法律穩定性之影響有限；UTPR 雖可能在特定情況下導致過度負擔，惟 GloBE 立法範本中設置的實質所得排除與安全港條款降低了該風險。加上此國際稅制改革本身具高度可預測性與強烈公共利益目的，可能難以被認定為違反公平與公正待遇；但若實施國偏離 GloBE 立法範本設計，對投資人課徵遠高於 GloBE 規則所計算之補充稅賦，則仍可能構成對法律穩定性之不當侵害。

²⁴⁵ OECD, Tax Challenges Arising from Digitalisation – Report on Pillar Two Blueprint (2020), <https://www.oecd.org/tax/beps/tax-challenges-arising-from-digitalisation-report-on-pillar-two-blueprint.pdf>; GloBE Model Rules, *supra* note 21.

²⁴⁶ OECD, Members of the OECD/G20 Inclusive Framework on BEPS Joining the October 2021 Statement on a Two-Pillar Solution to Address the Tax Challenges Arising from the Digitalisation of the Economy as of 9 June 2023, <https://www.oecd.org/tax/beps/oecd-g20-inclusive-framework-members-joining-statement-on-two-pillar-solution-to-address-tax-challenges-arising-from-digitalisation-october-2021.pdf> (last visited June 11, 2024).

三、小結

公平與公正待遇條款因其抽象且不明確之定義，在仲裁實務中衍生出諸多判斷標準，亦使其成為投資人在全球最低稅負制相關爭端中，最可能援引的投資保護條款。儘管仲裁庭得依「正當合理期待」、「法律穩定性」等要素判斷地主國調整國內稅法與租稅政策之行為是否違反公平與公正待遇條款，惟此類要素之解釋與適用高度仰賴具體個案事實，難以依循過往仲裁實務作出一般性歸納。

關於正當合理期待之判斷，仲裁庭主要檢視投資人取得租稅優惠之具體情況。若租稅優惠係源於一般性立法，且未包含穩定條款，在欠缺地主國具體承諾之情況下，投資人主張地主國課徵補充稅或調整租稅優惠違反公平與公正待遇條款之可能性較低。反之，若投資人之租稅優惠涉及地主國具體承諾，例如地主國係透過投資契約或裁量性程序個別授予租稅優惠，且載明穩定條款，則地主國課徵補充稅或調整租稅優惠可能改變投資人既有待遇，進而違反公平與公正待遇條款。

就法律穩定性而言，仲裁庭通常考量法律變動之幅度、對投資人之經濟影響、變化之不可預測性與所涉公共利益。若地主國稅制變更大幅提高投資人之有效稅率，確有產生違反公平與公正待遇條款之風險，惟仍須兼顧地主國行使監管國內事務之權力，尤其當措施涉及重要公共利益時，仲裁庭往往予以更高程度之尊重。

從 GloBE 規則之運作方式與公平與公正待遇之判斷標準可知，授予投資人免稅或減稅優惠，導致 GloBE 有效稅率偏低之國家，最有可能大幅修改稅制並調整既有租稅優惠，產生投資爭端之風險較高。相較之下，提供其他類型租稅優惠之國家，如加速折舊、可提升「實質性所得排除額」之投資與研發抵減等，不會顯著降低 GloBE 有效稅率，國家調整此類政策之動機較低，相應投資仲裁風險較小。

第二節、禁止歧視待遇條款

禁止歧視待遇旨在保障外國投資人及其投資不因國籍因素而受到不利待遇，保障範圍涵蓋與本國投資人及其他外國投資人間之差別待遇。在投資協定中以國民待遇與最惠國待遇條款確保地主國對不同國籍投資人適用之具體措施及國內法律規範不致產生競爭不平等。GloBE 規則相關措施包括補充稅課徵與租稅優惠調整。由於 GloBE 規則僅對合併年營收達 7.5 億歐元之跨國企業集團成員課徵補充稅，因此，當地主國依 GloBE 規則國內立法對不同跨國企業集團成員與純國內企業適用不同租稅待遇時，可能違反國民待遇與最惠國待遇條款。關於租稅優惠之調整，考量各國租稅優惠政策形式與範圍不一，且為吸引外資，多數國家原本授予外國投資人的優惠待遇多優於本國投資人，故取消或調整外國投資人租稅優惠一般不構成本國與外國投資人間的差別待遇。因此，本文將分析重點聚焦於 GloBE 補充稅之課徵是否違反禁止歧視待遇條款，不另就租稅優惠調整展開討論。

一、禁止歧視待遇條款之理論與仲裁實務

近乎所有 IIAs 皆包含國民待遇與最惠國待遇條款。國民待遇條款旨在提供外國投資人與本國投資人公平的競爭環境。此條款要求地主國在法律制定與適用的過程中，不得基於國籍因素在外國投資人與本國投資人間做出法律上(*de jure*)或事實上(*de facto*)不利於外國投資人之區別對待，從而將外國投資人的地位提升至與本國投資人相同之水平。NAFTA 第 1102 條國民待遇條款即規定地主國應給予外國投資人不低於其對本國投資人於相似情況下所提供之待遇²⁴⁷。最惠國待遇則旨在確保不同國籍之外國投資人，於地主國制定或實施法規時，能享有公平競爭之地位。此條款要求地主國對投資人提供之待遇，不得低於其對第三國投資

²⁴⁷ NAFTA, art. 1102.

人所提供之待遇。對第三國投資人之待遇可能源自於實際措施或條約義務。儘管，此條款之最初目的，係為了確保地主國依國內法採取之措施與待遇，未對不同國籍之外國投資人構成法律上或事實上歧視。然而，在 ISDS 實務中，投資人較少援引最惠國待遇條款，質疑地主國在特定情況下對外國投資人所提供之實質待遇水準，例如對第三國投資人適用較優惠之國內措施。實務上，更常見之情況是投資人透過 MFN 條款，援引地主國與第三國簽訂之 IIAs 中對投資人更有利之條款。惟此作法在仲裁實務中引發爭議，仲裁庭對於是否接受此種適用方式見解不一，故本文以該條款之最初保障目的，即地主國國內措施是否在不同國籍投資人間構成歧視進行討論。

在國民待遇與最惠國待遇條款之適用上，仲裁庭通常會依循三項要件進行判斷。首先，需判斷外國投資人與比較對象，即國內投資人或第三國投資人，是否處於「相似情況 (like circumstances)」。其次，確認是否存在「較不利待遇」。最後，若認定外國投資人之待遇較為不利，則進一步判斷該差別待遇是否具有正當理由。以下將依序說明各要件之內涵與實務發展。

(一) 相似情況

一般而言，國民待遇與最惠國待遇條款未禁止地主國對處於不同情況的投資人採取不同待遇。在舊世代投資協定中，禁止歧視待遇條款多以概括性文字規定，未明文要求外國投資人與比較對象須處於「相似情況」，但仲裁實務普遍認為國民待遇與最惠國條款均隱含此判斷標準。至於何種情況下可認定投資人處於「相似情況」，若條文未具體規範，則由仲裁庭依個案事實裁量判斷。例如，仲裁庭在 SD Myers v Canada 案中強調，判斷外國投資人與本國投資人是否處於相似情況時，「經濟領域 (economic sector)」或「商業領域 (business sector)」為重要考

量因素²⁴⁸。此外，在 *Infinito Gold v. Costa Rica* 案中，仲裁庭認為地主國得基於企業規模之差異，對小規模之手工礦業者與大型礦業公司採取不同待遇。在 *Pawlowski AG v. Czechia* 案中，仲裁庭則指出，投資計畫之規模差異意味著投資人非處於相似情況²⁴⁹。於 *Belenergia v. Italy* 案中，仲裁庭亦承認地主國可基於企業之規模、經營能力與經濟規模等客觀標準，合理區分不同投資人之待遇。另有仲裁庭認為，判斷相似情況時，應同時考量不同投資人是否屬於相同經濟或商業領域、其投資或業務是否存在競爭關係，以及是否受相似之監管措施規範²⁵⁰。

部分新世代投資協定則明文指出，「相似情況」之判斷應考量投資所屬產業、所生產或提供之商品或服務、投資對當地、區域或全國人口與環境之實際或潛在影響、投資之公私性質，以及係爭措施之目的與宗旨。

（二）較不利待遇

國民待遇與最惠國待遇條款要求地主國不得對外國投資人做出較不利待遇。此較不利待遇不僅限於明文基於國籍之法律上歧視，亦涵蓋表面上中立、但實際上對外國投資人造成不利影響之事實上歧視²⁵¹。換言之，即使法律條文未直接提及國籍，若該措施實質上導致外國投資人所受待遇低於本國投資人或其他外國投資人，亦可能違反禁止歧視待遇條款。

至於地主國是否須給予外國投資人不低於任何本國或其他外國投資人所獲最優惠待遇，或只須比照本國或其他外國投資人通常所受待遇，甚至僅須提供不低於受最差待遇之本國或其他外國投資人之待遇即可，仲裁實務未形成一致見解²⁵²。惟在部分涉及國民待遇條款之案件中，仲裁庭認為，只要外國投資人所受待

²⁴⁸ *SD Myers v Canada*, Partial Award, 13 November 2000, para. 250.

²⁴⁹ *Pawlowski AG and Project Sever s.r.o. v. Czech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17/11, para. 540.

²⁵⁰ *Apotex v United States*, Award, 25 August 2014, para. 8.15.

²⁵¹ *RUDOLF DOLZER ET AL.*, *supra* note 113, at 257.

²⁵² *E.g.*, *Feldman v Mexico*, Award, 16 December 2002, para. 185.

遇不及任一處於相似情況之本國投資人，即足以構成較不利待遇²⁵³。

（三）差別待遇之正當性

實務上普遍認為，若地主國能提出合理理由，其差別待遇可被認為具有正當性。然而，此正當化標準與合理理由之具體內涵目前仍較模糊，尚無明確定義。地主國若基於公共利益所推行之政策，在特定情況下可能構成正當的差別待遇理由。例如，在 *SD Myers v. Canada* 案中，仲裁庭認為，為推動國家政策而提供補貼屬正當之差別待遇²⁵⁴；在 *ADF v. United States* 案中，仲裁庭認為，若美國要求政府專案須使用本地鋼材，且該規定對本國與外國承包商一體適用，則不違反國民待遇條款²⁵⁵；在 *Gami v. Mexico* 案中，仲裁庭則認為保護地主國重要產業之償債能力為合法之政策目的²⁵⁶。

此外，關於措施與公共政策之關係，*Gami v. Mexico* 案仲裁庭認為，只要係爭措施與政策目的間具合理關聯性，即可正當化該措施²⁵⁷；另有仲裁庭認為，若地主國有其他可達成政策目的之替代手段，則應選擇對投資人權益侵害最小者²⁵⁸。整體而言，仲裁庭雖於個別案件中肯認特定公共政策目的可正當化差別待遇，惟實務上尚未形成明確且普遍適用之判斷標準。

二、補充稅之課徵是否違反禁止歧視待遇條款

關於各國依 GloBE 規則立法課徵補充稅是否符合禁止歧視待遇條款之要求，關鍵在於該法之適用範圍，即補充稅之課徵對象。依 GloBE 立法範本之規定，補充稅之課徵對象為合併年營收達 7.5 億歐元之跨國企業集團成員。此適用範

²⁵³ *Pope & Talbot v Canada*, Award of the Merits of Phase 2, 10 April 2001, para. 41; *Archer Daniels Midland v Mexico*, Award, 21 November 2007, para. 205.

²⁵⁴ *SD Myers v Canada*, Partial Award, 13 November 2000, para. 255.

²⁵⁵ *ADF v United States*, Award, 9 January 2003, paras. 156–158.

²⁵⁶ *GAMI v Mexico*, Final Award, 15 November 2004, para. 114.

²⁵⁷ *Id.*

²⁵⁸ *SD Myers v Canada*, Partial Award, 13 November 2000, para. 221.

圍可能在國民待遇與最惠國待遇條款下產生兩項主要爭議。第一，未達 7.5 億歐元門檻之跨國企業集團不適用 GloBE 規則。第二，純國內企業無論規模大小均不適用 GloBE 規則。因此，本文將依循前述仲裁庭檢視禁止歧視待遇條款之步驟，分析 GloBE 規則於該條款下之主要爭議。

（一）相似情況

首先須判斷在適用範圍內與範圍外之企業是否處於相似情況。若兩者處於不同情況，則不具可比性，僅對適用範圍內之企業課徵補充稅自然不違反禁止歧視待遇條款。就前述第一項爭議而言，假設在 GloBE 規則實施國境內存在不同跨國企業集團之子公司，兩者所屬產業、企業規模、營收等面向皆相同，且有效稅率皆低於 15%，其中一間為營收達 7.5 億歐元跨國企業集團之子公司，須負擔補充稅，另一間子公司所屬跨國企業集團未達 7.5 億歐元營收門檻，無此義務。此 7.5 億歐元營收門檻是否得作為兩者非處於相似情況之判斷因素？

在過往案件中，仲裁庭承認地主國可基於企業規模、投資計畫規模等客觀標準合理區分不同投資人之待遇。惟此規模係指投資人於地主國實質營運與投資規模，而非整體企業集團之規模或營收總額。GloBE 規則係以跨國企業集團於全球之合併營收作為適用門檻，而非考量跨國企業集團於個別租稅管轄區產生之營收或投資金額。此種以「集團總營收」作為劃分標準之方式，與仲裁實務依投資人於地主國之營運與投資規模判斷相似情況之標準存在落差。因此，GloBE 規則以 7.5 億歐元門檻劃分適用對象，不得主張兩者在企業與投資計畫規模存在實質差異，其差別待遇不具正當性。

就第二項爭議而言，於產業別、規模、營收及有效稅率均相同之情況下，僅因企業是否屬於跨國企業集團而適用不同課稅待遇，亦可能構成相似情況下之差別待遇。然而，在投資協定未明確規範「相似情況」時，仲裁庭在個案中擁有廣

泛的裁量權。企業之經濟或商業領域、經營規模與能力、投資計畫規模、競爭關係、所受監管規範皆可能作為相似情況之判斷因素。地主國可能主張，本國企業並未享有跨國集團企業普遍具備之資金籌措優勢、集團內部協同效益與市場資源整合能力，其實質處境與跨國企業集團成員並不相同，兩者非處於相似情況故得以區別對待；但若本國企業已具相當規模且營收超過 7.5 億歐元門檻，在現行仲裁實務下，地主國是否能以「跨國企業集團成員身份」作為正當化差別待遇之理由具爭議性。

（二）較不利待遇

較不利待遇包含法律上歧視與事實上歧視。從法律上歧視的角度觀察，GloBE 規則以合併營收達 7.5 億歐元之跨國企業集團作為適用門檻，而未明文以國籍劃分適用範圍。此外，補充稅之課徵對象為位於租稅管轄區內之集團成員，課徵補充稅時亦不問其國籍。因此，GloBE 規則之立法與適用未直接基於國籍做出差別待遇，原則上不構成法律上歧視。

至於是否構成事實上歧視，實際上導致外國投資人所受待遇低於本國投資人或其他外國投資人，須依不同爭議情境進行分析。就第一項爭議而言，GloBE 規則實施國可對達門檻之跨國企業集團子公司課徵補充稅，但不能對未達門檻之跨國企業集團子公司課徵，即便兩者皆享有低稅率且在產業類別、營收規模等各面向皆相同。若兩者為國籍不同之外國投資人，僅因集團營收差異而適用不同稅負，可能構成較不利待遇。惟仲裁實務對於較不利待遇之判斷標準並無一致見解，部分仲裁庭認為，外國投資人僅需證明其待遇低於任一處於相似情況之其他外國投資人即可成立較不利待遇；另有仲裁庭認為，只要待遇不低於其他外國投資人通常所受待遇或所受最差待遇者，即無違反之虞。因此，GloBE 規則是否違反最惠國待遇條款，仍須視具體個案事實與仲裁庭見解而定。

就第二項爭議而言，純國內企業不適用 GloBE 規則。單純從事國內活動且未有外國子公司或分支機構之國內企業與其股東，理論上具本國國籍，而跨國企業集團成員或其股東較可能具有外國國籍。實務上可能出現 GloBE 規則適用範圍內之跨國企業集團成員為外國投資人，而 GloBE 規則實施國僅對其課徵補充稅，卻不對處於相似情況之本國投資人課稅，引發事實上歧視。由於所有純國內企業均排除適用 GloBE 規則，因此無需進一步區分比較標準係以本國投資人通常待遇、最優惠待遇，或最差待遇為準。

（三）差別待遇之正當性

差別待遇是否具正當性，將取決於其是否追求合理公共政策目的及採取合理方式。GloBE 規則旨在防止稅基侵蝕與利潤移轉之行為，目前已有 139 個租稅管轄區簽署此稅改架構，顯示其所追求之政策目標在國際間獲得廣範共識，具高度正當性。此外，GloBE 規則以客觀之合併年營收門檻規範適用對象，將企業從事跨境活動與否、跨國企業集團之規模與稅基侵蝕風險納入考量，同時設有微量排除條款與安全港條款，以避免跨國企業集團在經濟活動極小的地區產生不成比例的合規負擔。此稅制在適用上兼顧政策目標與行政可行性，措施與目標間具合理關聯性。

惟仍須注意，仲裁庭對於合理公共政策目的以及其與具體措施之間關係，未有普遍適用的判斷標準。當爭端涉及排除大型國內企業適用時，仲裁庭是否會接受以反避稅政策正當化差別待遇，並認可僅對大型跨國企業課徵補充稅為達成政策目的之合理手段，仍存在不確定性。

因此，各國在實施 GloBE 規則時，若能調整適用門檻或將純國內企業納入適用範圍，將有助於降低歧視風險。例如，歐盟的《全球最低稅負指令》將合併

年營收達 7.5 億歐元之大型國內企業集團納入 IIR 與 QDMTT 之適用範圍²⁵⁹，以避免成員國在從事跨境活動之集團與單純從事國內活動之集團之間構成歧視²⁶⁰；英國亦採取相同營收門檻，將大型國內企業集團納入 QDMTT 適用範圍²⁶¹。儘管歐盟與英國之立法在適用範圍上與 GloBE 規則不同，但 GloBE 規則採「共同方法」運作，各國仍保有一定立法彈性。將適用範圍擴及國內企業集團，並不影響原適用對象在 GloBE 下應負擔的補充稅義務，此類立法仍屬合格規則²⁶²。

第三節、徵收條款

投資協定中之徵收條款旨在防止地主國對外國投資人之投資進行非法剝奪。基於國家主權，國際投資協定原則上容許國家進行徵收，但須符合公共目的、不具歧視性、依正當法律程序，並給予投資人迅速、充分且有效之補償。在租稅措施是否構成徵收的爭議中，由於課稅權屬於國家主權之行使，仲裁實務通常採取較為審慎的態度。然而，若其租稅措施構成「沒收性課稅(confiscatory taxation)」，實質剝奪投資人之投資價值，仍可能違反徵收條款。是以，GloBE 規則之補充稅課徵與其他稅制調整措施，在特定條件下或將引發相關爭端。

一、理論與仲裁實務

(一) 直接徵收與間接徵收

依據多數投資協定之規範，徵收可分為直接徵收與間接徵收。前者係指國家將投資收歸國有，或以其他方式直接剝奪投資人之財產權；後者則不涉及所有權

²⁵⁹ EU Global Minimum Tax Directive, *supra* note 87, arts. 5.2, 11.

²⁶⁰ Jost Angerer, *Direct Taxation: Personal and Company Taxation, Fact Sheets on the European Union* (May, 2024),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factsheets/en/sheet/80/direct-taxation-personal-and-company-taxation>; *Proposal for a Council Directive on Ensuring a Global Minimum Level of Taxation for Multinational Groups in the Union*, at 11, COM (2021) 823 final (Dec. 22, 2021).

²⁶¹ Finance (No. 2) Act 2023 §§ 265-266.

²⁶² Administrative Guidance on GloBE Model Rules, *supra* note 45, at 100.

移轉，而係指國家透過立法、行政或其他措施，對外國投資產生等同於徵收之實質效果，使投資人無法有效利用其投資，致投資價值遭受重大損害²⁶³。現今，國家採取直接徵收之情況不多，因為公然剝奪外國投資人的財產權，可能損及投資環境、引發負面輿論，不利吸引外資。因此，間接徵收成為國際仲裁實務中最常見且具爭議性的類型之一。國家往往否認其行為構成徵收，亦不給予補償。即使許多新世代投資協定已針對間接徵收設有較詳細規範，實務上仍缺乏明確定義與判斷標準²⁶⁴。

（二）租稅措施是否構成間接徵收

國家規制權源自其主權，係指國家得對其政治、經濟與社會事務進行規範，並制定法律以維護公共利益。在國際投資法下，國家原則上仍得行始規制權，惟應遵守其於投資協定下所承擔之投資保護義務²⁶⁵。仲裁實務與學說普遍承認，國家基於善意，並為實現公共利益所採取之一般性規制措施，即使對外國投資人造成經濟損失，原則上不構成徵收，亦無需補償。例如為懲罰或抑制犯罪所為之財產沒收或罰鍰、為課徵稅賦而取得財產、限制財產使用之立法，包括都市計畫、環境保護、安全、健康等相關限制²⁶⁶。

然而，如何區分無需補償之規制措施與需補償之間接徵收，長期以來為國際投資法上的爭議焦點。由於目前多數 IIAs 之徵收條款並未明確劃分與國家規制措施之界線，而實務上亦欠缺一致的判斷標準，僅能透過仲裁庭在個別案件中採納之要素進行判斷，這些要素包括措施對投資造成之實質損害程度、投資人之合理期待、國家是否出於取得財產之意圖、是否基於公共目的、措施是否具歧視性、

²⁶³ UNCTAD, EXPROPRIATION: UNCTAD SERIES ON ISSUES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II 5-8 (2012).

²⁶⁴ RUDOLF DOLZER ET AL., *supra* note 113, at 153.

²⁶⁵ Mitchell, K. Accommodating the Public Interest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Treaties: Police Powers, Expropriation and Treaty Interpretation, Oxford University, UK 1-2 (2014).

²⁶⁶ UNCTAD, *supra* note 263, at 79, 85.

是否符合正當程序與比例原則等²⁶⁷。

鑑於本文聚焦於租稅措施是否構成間接徵收，實務普遍認為當租稅措施具「沒收性課稅(confiscatory taxation)」之性質——亦即在欠缺正當理由的情況下，實質剝奪投資人之投資價值，則可能構成間接徵收²⁶⁸。故本文將以「沒收性課稅」作為分析基礎，就措施對投資之實質剝奪程度及其是否基於公共目的進行探討。

此外，除間接徵收之判斷標準外，徵收標的之認定亦在實務上引發爭議。因此，最後將進一步探討部分徵收之可能性，分析租稅待遇是否可作為獨立受保護之投資標的。

1. 間接徵收之判斷標準

(1) 剝奪之嚴重程度

仲裁實務普遍認為，租稅措施需「實質剝奪(substantial deprivation)」投資價值，始構成間接徵收。此一標準主要著重於經濟層面，若係爭措施剝奪投資人對投資的經濟使用與收益，使與投資相關的權利(如收入或利益)猶如不存在，或其使用與享有受到同等程度的干預或限制，則可能構成間接徵收²⁶⁹。

Burlington v. Ecuador 一案即提供具參考性的「實質剝奪」認定標準。該案中，美國企業 Burlington 投資於厄瓜多之原油開採區塊，並依生產分成合約(Production Sharing Contracts)取得礦區 7 與礦區 21 的石油生產利潤²⁷⁰。隨著

²⁶⁷ YVES DERAIS & JOSEFA SICARD-MIRABAL, INTRODUCTION TO INVESTOR-STATE ARBITRATION 115, 122 (2018). 羅傑，國際投資法上合理規制措施之研究——以間接徵收規範為中心，國立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92-93 (2013 年年 7 月)。

²⁶⁸ UNCTAD,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TAX MEASURES: WHAT TAX POLICYMAKERS NEED TO KNOW (Mar. 2, 2021), 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official-document/diaepcbinf2021d3_en.pdf; e.g., Marvin Feldman v Mexico (2003) 42 ILM 625 para. 646., Occidental Exploration and Production Co v Ecuador, Award, 1 July 2004.

²⁶⁹ Tecmed v Mexico, Award, 29 May 2003, paras. 115-116.

²⁷⁰ Burlington Resources Inc. v. Republic of Ecuador, ICSID Case No. ARB/08/5, Dec. 12, 2012, Decision on Liability, para. 21.

國際油價大幅上漲，厄瓜多政府於 2006 年通過第 42 號法律 (Law 24)，對石油公司因油價上漲獲得之超額利潤，又稱「暴利 (windfall profits)」課徵重稅，並於 2007 年將稅率提高至 99%，即政府可取得幾乎全部的超額利潤²⁷¹。

Burlington 主張，該措施導致其在 2008 年完全未獲利，礦區 7 的收入減少 58%、礦區 21 減少 70.2%，已構成對其投資之實質剝奪²⁷²。然而，仲裁庭並未接受該主張，指出儘管 99% 的稅率大幅壓縮 Burlington 的利潤，但其投資未完全喪失價值或經濟上可行性，仍具有產生商業報酬之能力。因此，仲裁庭認為該租稅措施未實質剝奪 Burlington 之投資價值，不構成徵收²⁷³。

此外，在 ADM v. Mexico 案中，仲裁庭指出，經濟影響之嚴重程度是判斷一項措施是否構成間接徵收或等同於徵收性質之決定性標準，當措施對投資造成實質侵害，並使投資人喪失全部或大部分投資利益，即可能構成徵收²⁷⁴。仲裁庭更從過往判例中歸納出一項共同原則：唯有在投資人喪失對投資的控制，或該投資的經濟價值遭受實質損失的情形下，方可能構成間接徵收²⁷⁵。

在該案中，原告擁有墨西哥當地公司 ALMEX 的全部股權，該公司主要從事高果糖玉米糖漿之製造與銷售²⁷⁶。2002 年，墨西哥對含有蔗糖以外甜味劑之飲料課徵 20% 生產與服務特別稅 (Special Tax on Production and Services)，其中包含使用高果糖玉米糖漿之飲料²⁷⁷。原告主張，該租稅措施剝奪其於墨西哥從事高果糖玉米糖漿生產投資的公平市價與經濟使用，此重大經濟損害足以構成徵收。此外，該措施不僅減損投資人對投資合理預期之經濟利益，亦具有歧視性質，進

²⁷¹ *Id.* paras. 32-35. 所謂「暴利 (windfall profits)」係指油價出現不可預見之上漲，導致實際石油價格超過生產分成契約簽訂時之參考價格，所額外產生的利潤。

²⁷² *Id.* para. 450.

²⁷³ *Id.* para. 456.

²⁷⁴ *Archer Daniels Midland Company and Tate & Lyle Ingredients Americas, Inc. v. The United Mexican States*, ICSID Case No. ARB (AF)/04/5, para. 240.

²⁷⁵ *Id.* para. 242.

²⁷⁶ *Id.* para. 42.

²⁷⁷ *Id.* para. 82.

一步確認其徵收性質²⁷⁸。

然而，仲裁庭認為本案不構成徵收。其理由為，原告始終保有對其投資之控制權，且稅制施行後，ALMEX 仍持續營運設施，從事高果糖玉米糖漿之生產與銷售，顯示該稅制並未對投資造成實質重大之干預。此外，僅以利益或期待之損失，或主張該稅制具歧視性質為由，並不足以構成徵收之判斷標準²⁷⁹。

同樣地，在 *Feldman v. Mexico* 案中，仲裁庭指出，國家基於經濟、政治或社會變遷而調整稅制，屬於正當規制權之行使。即使相關措施導致投資人難以或無法進行特定商業活動，或使該投資喪失經濟價值，亦不當然構成徵收²⁸⁰。

綜上所述，仲裁實務普遍認為，投資是否受「實質剝奪」已成為判斷租稅措施是否構成間接徵收之核心門檻。實質剝奪標準主要評估措施是否嚴重干預對投資之控制，或使投資喪失大部分或全部經濟價值。若投資仍具持續經營能力，未完全喪失商業可行性，難以認定構成徵收。至於投資人之經濟期待落空，或對措施之歧視性，雖可作為輔助判斷因素，但在未達實質損害門檻之前，尚不足以構成徵收。整體而言，仲裁實務對租稅措施是否實質剝奪投資價值，進而構成間接徵收採取相對嚴格的認定標準。

(2) 公共目的

仲裁實務與學術文獻普遍承認，國家基於主權享有廣泛的規制權，對公共事務所採取之政策措施，原則上應視為合法行使，不構成徵收²⁸¹。例如，學者 Sornarajah 指出：「普通的課稅措施、刑罰或出口管制不構成需補償之徵收。透過立法建立反壟斷、消費者保護、證券、環境保護、都市計畫與土地使用等領域之

²⁷⁸ *Id.* paras. 230-232.

²⁷⁹ *Id.* paras. 245-252.

²⁸⁰ *Feldman v Mexico*, Award, 16 December 2002, para. 112.

²⁸¹ UNCTAD, *supra* note 263, at 80-85.

監管制度，在已開發國家更為常見。一般認為，在已產生或可預見將產生公共危害的情況下，此類立法所造成的干預並不構成可補償之徵收。這些監管措施被視為國家有效運作不可或缺的一環。規制權限係屬地主國主權事項，國際法上不存在就此類措施獲得補償或外交保護之權利。」²⁸²

學者 Newcombe 亦提出：「國際機構多認為，為了保護公共衛生、安全、道德或社會福利所制定之合理且必要規範，並不形成補償之權利。」²⁸³

仲裁實務也多次強調，國家為實現公共利益，享有不受不當限制之規制權。在 *Feldman v. Mexico* 一案中，仲裁庭指出，「政府機關有多種方式能迫使企業停止營運，或大幅削減其經濟利益。過去，沒收性課稅、拒絕企業或個人使用基礎設施或必要原物料、施加不合理之監管制度等，皆曾被視為徵收行為。然而，政府也必須能自由地透過環境保護、新設或修法之稅制、補貼之給予或撤銷、關稅之降低或提高、區域劃分限制之實施等方式，為更廣泛的公共利益採取行動。若任何因該等措施而受不利影響之企業皆可主張補償，將導致政府無法有效推動此類合理監管，而國際習慣法亦承認此見解。」²⁸⁴

為了釐清合理規制措施與間接徵收之界線，本案仲裁庭援引《美國對外關係法第三彙編 (Restatement (Third) of Foreign Relations Law of the United State)》，並結合其他仲裁判例所採標準，將公共目的、不具歧視性、正當法律程序以及對投資之控制權等要素作為本案之判斷標準²⁸⁵。

在該案中，原告為美國投資人，持有並控制在墨西哥境內之菸酒經銷與出口

²⁸² M. SORNARAJAH, THE INTERNATIONAL LAW ON FOREIGN INVESTMENT 357 (2004).

²⁸³ NEWCOMBE, THE BOUNDARIES OF REGULATORY EXPROPRIA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23 (2005).

²⁸⁴ 《美國對外關係法第三彙編 (Restatement (Third) of Foreign Relations Law of the United State)》係由美國法律學會 (America Law Institute) 編撰，內容揭示該機構對徵收條款之見解，並反映相關條款於國際間之國家實踐。本案原告與被告皆於訴狀中援引該文件。Marvin Feldman v. Mexico, ICSID Case No. ARB(AF)/99/1, para. 103.

²⁸⁵ *Id.* para. 104

公司 CEMSA²⁸⁶。依據墨西哥《特種產品與服務稅法(IEPS)》，1990 至 1997 年間，香菸出口可適用 0% 稅率，並得申請退稅²⁸⁷。1997 年修法後，明文禁止如 CEMSA 等香菸經銷商申請退稅，僅限於墨西哥境內生產商之「首次銷售」可適用退稅。同時，新法亦規定，出口香菸須先註冊為合格出口商，始得適用 0% 稅率。1998 年，CEMSA 除遭拒絕登記為合格出口商外，亦遭稅捐機關追償其自 1996 年起之退稅。由於缺乏必要登記，CEMSA 無法取得出口文件，致其自 1997 年起完全喪失從事香菸進出口之能力，原告遂主張前述措施構成間接徵收²⁸⁸。

但仲裁庭認為，該爭措施旨在打擊「灰色市場(grey market)」出口行為與防止墨西哥製香菸再非法輸回墨西哥，有助於保護稅收與公共利益，屬於合理公共目的²⁸⁹。綜合其他判斷因素後，仲裁庭認定該措施不構成間接徵收²⁹⁰。

即便在未涉及租稅的案件中，仲裁庭亦普遍將「公共目的」視為重要判準之一。例如在 Fireman's Fund v. Mexico 一案中，仲裁庭提出，為了區分應予補償之徵收與不需補償之規制措施時，可綜合考量措施是否屬警察權(規制權)範疇、措施之公共目的與效果、措施是否具歧視性、所採手段與欲實現目標之間是否具有比例性，以及該措施是否為善意所為²⁹¹。

總結而言，無論在學理或仲裁實務上，「公共目的」皆為區分合理規制與間接徵收的重要判準之一。特別是在稅制領域，基於公共目的所實施之租稅措施，常被視為國家規制權限範疇內的合理行為，不構成可補償之徵收。此一立場反映出國家在稅制制定與執行方面享有高度裁量空間，而國際投資仲裁實務亦普遍尊

²⁸⁶ *Id.* para. 1.

²⁸⁷ *Id.* para. 8.

²⁸⁸ *Id.* paras. 21-22.

²⁸⁹ *Id.* paras. 115, 136.

²⁹⁰ *Id.* para. 153.

²⁹¹ Fireman's Fund Insurance Company v. The United Mexican States, Award, 17 July 2006 ICSID Case No. ARB(AF)/02/1, para. 176.

重國家之租稅主權。

2. 徵收標的：部分徵收之可能性

一般而言，仲裁庭將構成投資的各種資產與活動視為不可分割的整體。在多數情況下，仲裁庭不會將投資拆分為個別法律構成部分，而是將其視為一個整體。因此，在多數案件中，仲裁庭係以投資之完整性判斷是否構成實質剝奪，檢視係爭措施對整體投資之影響，而非聚焦於對投資構成部分之侵害²⁹²。

例如，在 *Electrabel v. Hungary* 案中，仲裁庭即否定部分徵收之概念。其指出，若可輕易地將一項投資拆分為數個構成部分，並各自作為一項單獨投資，將使仲裁庭所採「根本性剝奪（radical deprivation）」與「任何實質內容之剝奪（deprivation of any real substance）」等間接徵收判斷標準形同虛設。如此一來，投資人僅需依具體情況細分其投資，便可滿足間接徵收之判準，而整體投資卻從未符合該標準²⁹³。

然而，部分仲裁庭對此持不同見解，認為若某項投資權利具獨立經濟價值，並可構成投資協定下受保護之投資，即使整體投資未遭剝奪，仍可能就該特定權利成立部分徵收。例如，在 *Ampal-American v. Egypt* 一案中，埃及撤銷東地中海天然氣公司（East Mediterranean Gas Company S.A.E., EMG）參與免稅特區之許可證，多家美國公司以其股東身份對埃及提起仲裁，主張該措施違反徵收條款。仲裁庭認為，該許可證保障 EMG 於特定期間內享有免稅待遇，具獨立性與經濟價值，本身即屬一項投資。即便撤銷該許可證未摧毀整體經營計畫，仍對協定所保護之個別投資構成直接且完全剝奪²⁹⁴。

²⁹² RUDOLF DOLZER ET AL., *supra* note 113, at 99, 101.

²⁹³ *Electrabel v Hungary*, Decision on Jurisdiction, Applicable Law and Liability, 30 November 2012, paras. 6.57-6.58.

²⁹⁴ *Ampal-American v Egypt*, Decision on Liability and Heads of Loss, 21 February 2017, paras. 179-183, 187.

儘管部分徵收在實務上具高度爭議，未來仲裁庭仍可能採納相關見解，將投資人所享有之稅收待遇視為一項獨立受保護之投資，進而認定構成間接徵收。

二、GloBE 規則相關措施是否違反徵收條款

國家為實施 GloBE 規則所採取的租稅措施是否為合理規制措施，抑或是具沒收性課稅性質之間接徵收，應透過仲裁實務與學理對間接徵收之判斷基準進行分析。因此，本文將從措施是否導致投資價值之實質剝奪，以及該措施是否具有公共目的之角度，探討 GloBE 規則相關措施違反徵收條款之可能性。

（一）補充稅之課徵是否構成間接徵收

在 GloBE 規則下，跨國企業集團於低稅負租稅管轄區產生之補充稅，係依集團成員於該地之超額利潤與補充稅率計算，以將有效稅率提升至 15%。就 GloBE 規則課稅措施是否構成實質剝奪而言，實務上通常依該措施是否嚴重影響投資人對其投資之控制、或是否使其喪失全部或大部分投資價值進行判斷，並普遍採取較為嚴格之標準。故僅針對企業之超額利潤課徵補充稅，將有效稅率提升至 15%之租稅措施，理論上不致產生根本性之經濟剝奪。

惟跨國企業集團於低稅負租稅管轄區產生之補充稅會進一步依各成員於該區之 GloBE 所得佔比進行計算，並依 QDMTT、IIR 與 UTPR 之適用順序決定各集團成員之納稅義務與所在國之課稅權。若補充稅未在整個集團間公平分配，而導致特定企業承擔過重租稅負擔，造成其投資價值之重大損失，則可能構成實質剝奪，進而違反徵收條款。

其中，以 UTPR 之適用風險最大。跨國企業集團之 UTPR 補充稅總額係依集團內成員於實施 UTPR 租稅管轄區之實質營運活動比例進行分配。雖然此分配方式旨在使稅負落於具較高實質活動與租稅承擔能力之租稅管轄區，然若集團

母公司所在國未實施 IIR，且僅一個或數個集團成員所在國實施 UTPR，仍可能導致補充稅過度集中於少數租稅管轄區。此外，最終母公司通常掌握集團大部分經營與獲利，其低稅負所得產生之補充稅若被分攤至 UTPR 實施國，可能使境內集團成員負擔整體或大部分集團之補充稅，甚至導致其需繳納之稅額超過自身利潤或營收。此等不成比例之稅負可能對企業構成實質剝奪。

相較之下，IIR 與 QDMTT 之設計較不易構成實質剝奪。IIR 之課稅對象為最終母公司或中間母公司，針對其擁有所有權權益之低稅負子公司之超額利潤課徵補充稅。由於該課稅邏輯係建立在母公司對子公司之所有權權益比例，亦即母公司對子公司利潤之經濟所有權，即便該補充稅係針對子公司之利潤徵收，然該利潤最終仍由母公司享有，補充稅義務可視為母公司因投資獲益所應負擔之稅負。故即便母公司依 IIR 課稅原則須負擔整體或大部分跨國企業集團之補充稅，原則上不會對其構成實質剝奪。

至於 QDMTT，則是由實施國對其境內跨國企業集團成員課徵補充稅。雖然該制度容許一國對單一境內成員課徵該國內所有低稅負集團成員之補充稅，形式上似可能導致特定成員承擔不成比例之稅負，然該補充稅仍來自該企業與其他境內成員所產生之超額利潤，且集團得透過內部安排（如資金調度或成本分攤）分擔稅負，故實際負擔仍可依各成員超額利潤相對比例進行分配。此旨在降低集團合規成本之課稅方法，應不致對單一成員構成實質剝奪。

此外，GloBE 規則之補充稅課稅機制，係建立於國際稅制之多邊共識，旨在遏止稅基侵蝕、避免國家間透過低稅政策競相逐底、並促進租稅公平，具有明確之公共目的。實務上，仲裁庭亦高度尊重國家行使規制權，國家基於善意，為實現公共利益所採取之合理租稅措施，即使對投資人造成一定程度之經濟影響，原則不構成徵收。因此，各國 GloBE 規則實施 QDMTT、IIR 與 UTPR 等措施，基於其公共目的，理論上應具備政策正當性，難以構成徵收條款所禁止之間接徵收。

然而，GloBE 規則係採取「共同方法」架構，允許實施國依本國法律體系與行政實務，選擇合適之立法形式或課稅方法以落實補充稅制度²⁹⁵。此種設計雖為實施國保留立法彈性，但若國家之立法與實施方式偏離 GloBE 立法範本、釋義文獻與行政指導原則，或就現行文件未具體規範之領域，採取對投資價值構成重大侵害之課稅措施，仍可能在綜合衡量實質剝奪程度、公共目的之正當性、措施是否具歧視性、程序正當性及比例原則等要素後，構成違反徵收條款之行為。

（二）租稅優惠之調整是否構成間接徵收

除了依 GloBE 規則對跨國企業集團成員課徵補充稅外，各國也可能進一步檢討並取消現行租稅優惠，例如經濟特區之減免稅政策或租稅假期等大幅降低企業有效稅率之措施。若投資人原本享有此類租稅優惠，而因政策調整喪失相關利益，是否構成間接徵收，實務上亦存有討論空間。

國家因應 GloBE 規則取消或調整租稅優惠，雖將使原本負擔極低或零所得稅負之企業須承擔至少 15% 之所得稅有效稅率，但原則上不致嚴重影響其經營能力，使其完全喪失商業可行性或大部分經濟價值，也較難構成對投資人控制權之重大干預。因此，若從整體投資受影響之程度判斷，通常不構成實質剝奪。

然而，部分仲裁庭認為，若投資之組成部分具獨立經濟價值，且符合投資協定下受保護投資之定義，對該投資組成部分構成實質剝奪，仍可能成立部分徵收，進而違反徵收條款。如前述 *Ampal-American v. Egypt* 案中，仲裁庭即認為撤銷跨國企業所享之經濟特區免稅許可證，已對協定所保護之投資構成直接且完全剝奪，因而成立間接徵收。準此，若國家撤銷或調整企業所享特定稅務權利，使其有效稅率提升至 15%，且該等權利具獨立經濟價值並構成協定保護之投資，可能構成對該項權利之間接徵收。惟仍應注意，多數仲裁實務並不承認「部分徵收」之概

²⁹⁵ MINIMUM TAX IMPLEMENTATION HANDBOOK, *supra* note 80, at 5.

念，普遍傾向從整體投資的完整性觀察是否構成實質剝奪，故此類部分徵收主張在實務上成立之可能性相對較低。

此外，租稅優惠之取消或調整，雖非 GloBE 規則明文規範之措施，而是各國為因應 GloBE 規則施行可能引發之課稅權流失風險所採取之應對措施，但此類措施旨在維護本國課稅主權，且同樣能促進租稅公平並減少各國間租稅政策競相逐底之行為，亦屬合理之公共目的。是以，即使該等措施對投資構成實質剝奪，仲裁庭在判斷是否違反徵收條款時，仍可能綜合考量公共目的、比例原則等要素，進而認定國家基於善意，為維護課稅權所採取之租稅優惠調整措施不構成間接徵收。



第五章、結論

全球最低稅負制的推動，顯示國際稅制進入日益整合之新時代。此制度改變了租稅優惠政策在跨國投資中的效果。對提供外國投資人租稅優惠之國家而言，即便其未依 GloBE 規則對境內低稅負集團成員課徵補充稅，其他國家仍可透過 IIR 或 UTPR 原則對該跨國企業集團課徵補充稅，導致租稅優惠之效果落空。反之，若該國選擇實施 QDMTT、IIR 或 UTPR 課徵補充稅，或取消原有租稅優惠政策，則在特定情況下，可能面臨投資人提起 ISDS 之風險。

從現行 IIAs 之規範架構與內容觀察，各協定在程序與實體規範上皆存有差異，即便是相同或類似的條文用語，仲裁庭於具體案件中的適用與解釋也可能出現分歧。因此，針對與 GloBE 規則相關之租稅措施是否能進入 ISDS 程序，並違反投資保護條款，具有高度不確定性，須視個案事實與仲裁庭如何解釋適用條文而定。不過，第三章與第四章之分析指出，在特定情況下，國家課徵補充稅或取消租稅優惠之行為，確實可能進入 ISDS 程序，且存在違反公平與公正待遇、禁止歧視待遇與徵收條款之風險。

儘管如此，全球最低稅負制之實施未必會引發大量 ISDS 案件。鑑於 GloBE 規則之課稅邏輯，跨國企業集團的低稅負利潤終將於某地被課徵補充稅。此補充稅可能由利潤來源國依 QDMTT 課徵，亦可能由母公司所在國依 IIR 課徵，或由第三國依 UTPR 課徵，且根據 GloBE 規則之行政指引，即便投資人透過 ISDS 挑戰地主國的 QDMTT 補充稅措施，該爭議稅額仍可能由其他 GloBE 規則實施國課徵，無法減輕跨國企業集團整體稅負²⁹⁶。因此，對投資人而言，其耗費資源進行投資仲裁，卻僅達成課稅地點之轉移，對企業整體可能不具經濟誘因。

²⁹⁶ OECD, Tax Challenges Arising from the Digitalisation of the Economy – Administrative Guidance on the Global Anti-Base Erosion Model Rules (Pillar Two), July 2023.

在衡量仲裁成本、時間與預期效益後，跨國企業若認為提起 ISDS 爭端無助於提升整體利益，則更可能將 IIAs 所提供的保障作為談判籌碼，要求地主國以其他具類似經濟效果的政策替代原有所得稅優惠，並依 15% 之最低有效稅率課徵所得稅。

對國家而言，若能藉由實施 GloBE 規則或調整租稅優惠，保有對境內低稅負集團成員之課稅權，同時降低投資人提起 ISDS 請求損害賠償之風險，透過重新談判改採不直接降低企業有效稅率的替代措施，將是一項兼顧稅收與投資穩定性的可行策略。然而，根據 GloBE 立法範本，若一國表面上對企業課徵補充稅，但事後透過補助、津貼、退稅或其他形式提供相當於該稅額之利益，此補充稅將被視為未有效課徵，而由其他 GloBE 規則實施國取得課稅權，抵銷投資人獲得之經濟利益。因此，各國在提供替代性優惠時，應避免提供明確對應補充稅額之利益。可能之替代措施包括 QRTC、適用於所有企業或特定產業之補助、針對基礎建設的公共支出、或與特定投資人重新協商天然資源之生產分成合約、特許協議等投資契約。此類措施能夠提供投資誘因，同時避免被視為與補充稅直接相關的利益，較符合 GloBE 規則下對合格稅制的要求。

全球最低稅負制改變了租稅優惠與投資保護制度之互動模式。對國家而言，若直接課徵補充稅而違反 IIA 義務，將可能遭仲裁挑戰，卻不會增加實際稅收；對投資人而言，提起 ISDS 的代價可能超過其實質利益。雙方在此背景下，重啟租稅優惠的談判，有機會尋得折衷方案，既保障稅收，又維持投資誘因，為平衡地主國與投資人利益之可行方案。

中長期而言，各國應針對 IIAs 進行全面檢討與改革。現行多數 IIAs 屬於舊時代協定，其條文設計普遍未將租稅措施排除於投資協定之適用範圍外，且投資保護條款之規範用語較為簡略、抽象與不明確，導致仲裁庭在解釋與適用上出現高度不一致之現象。此一制度特性不僅使地主國難以有效界定其正當行使租稅主

權之範圍；對投資人而言，IIAs 所提供之投資保護範圍亦存在不確定性。全球最低稅負制之施行更加凸顯 IIAs 改革之必要性。事實上，許多新世代之 IIAs 皆納入更具細節性與明確性之條文，以明確引導仲裁庭之解釋方式，增進條文解釋與適用之一致性。就租稅措施而言，新世代之 IIAs 也規定了不同規範態樣 租稅除外條款，包括完全除外、部分除外與共同租稅協商條款，以兼顧投資人保護與國家之租稅政策空間。未來，舊時代 IIA 應繼續朝此改革方向前進，確保 IIAs 不成為國家實現與執行國際上已形成共識之公共政策。

此外，國際社會亦應積極推動投資與租稅政策之協調整合。全球最低稅負制為國際稅制的重大變革，其實施成效將受限於是否能與現行國際法架構相容。若此稅制與國際投資法體系欠缺協調整合性，不僅將產生法律適用上的不確定性，也可能使各國在實施 GloBE 規則時面臨投資爭端風險。UNCTAD 曾於 2022 年的《世界投資報告》中說明全球最低稅負與 IIAs 之間的關係，以增進法律明確性並確保 IIAs 不會阻礙 GloBE 規則之實施²⁹⁷。未來，OECD 包容性架構亦可考慮發布相關指引文件，協助各國釐清 GloBE 規則與 IIAs 之間的適用關係，建立不同國際法規範間之協調與整合機制，進而確保各項租稅措施於不同國際法領域中均具正當性與合規性。就國內層面，各國稅務主管機關與外人投資部門應強化跨部會合作機制，透過資訊交流與政策協調，共同制定兼顧吸引投資、保障課稅權並降低 ISDS 風險之租稅政策。

綜上所述，全球最低稅負制與國際投資協定體系之互動關係，將影響未來國際稅制與投資法的發展方向。即使全球最低稅負制因包容性架構成員未能就美國與 G7 協議達成共識而暫緩或終止推行，數位化經濟與 BEPS 問題仍將持續推動各國稅制改革，無論是租稅優惠之調整、補充稅之引入，或反避稅措施之強化，皆可能影響跨國企業的稅負與投資利益。然而，現行國際租稅協定提供之爭端解

²⁹⁷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22: INTERNATIONAL TAX REFORMS AND SUSTAINABLE INVESTMENT 100-160 (2022).

決機制多限於相互協議程序 (Mutual Agreement Procedure)，其協商性質與執行力不足，難以有效保障投資人權益，致使越來越多涉及租稅措施的爭端透過 IIAs 下的 ISDS 解決²⁹⁸。在此脈絡下，各國稅制改革仍可能受到國際投資法規範，引發公平與公正待遇、禁止歧視待遇或間接徵收等爭議。

本文嘗試指出，不同態樣之租稅措施在國際投資法下可能產生的風險，並檢視租稅除外條款的制度意涵，期望各國在推動稅制改革時，能更審慎評估相關法律風險，在兼顧稅收主權與投資保護的前提下，促進更加健全且穩定的國際法架構。



²⁹⁸ Julien Chaiss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and Taxation: From Coexistence to Cooperation*, ICTSD & WORLD ECONOMIC FORUM (2016), https://www.rieti.go.jp/en/events/16071201/pdf/10_am2-5_chaisse.pdf.

參考文獻

中文文獻

書籍

陳清秀 (2018 年)，國際稅法，3 版，臺北：元照。

期刊

李宜芳，投資人與地主國間爭端解決機制之反思，經貿法訊，146 期，2013 年 4 月 25 日。

黃士洲，川普大而美法案的稅務簡介，產業雜誌，665 期 (2025)。

楊筑羽，論國際投資條約中合理期待之爭議—以德國憲法法院第 13 次核能法修正案判決對合理期待之解釋試評國際投資爭端 Vattenfall II 案之可能發展，經貿法訊，215 期，2017 年 6 月 12 日。

碩博士論文

林思妤 (2023 年)，國際投資法與國際人權法對於財產權保障之比較，國立政治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意涵 (2017 年)，論國際投資協定國籍安排之爭議——台新彰銀案之管轄權初探，國立政治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碩士論文。

練家安 (2022 年)，國際投資法下地主國規制權與外國投資人保護之探討，東吳大學法學院法律學系碩士論文。

羅傑 (2013 年)，國際投資法上合理規制措施之研究—以間接徵收規範為中心，國立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

網路資料

丁傳倫、廖月波，川普上任宣布退出 OECD 全球最低企業稅率協議及威脅課徵三國高關稅，KPMG，2025 年 1 月 23 日，
<https://kpmg.com/tw/zh/home/media/press-releases/2025/01/trump-executive-orders.html>。

英文文獻

書籍

- SORNARAJAH, M., THE INTERNATIONAL LAW ON FOREIGN INVESTMENT (2004).
- NEWCOMBE, THE BOUNDARIES OF REGULATORY EXPROPRIA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2005).
- DOLZER, RUDOLF ET AL.,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3rd ed. 2022).
- DERAINS, YVES & JOSEFA SICARD-MIRABAL, INTRODUCTION TO INVESTOR-STATE ARBITRATION (2018).

專書論文

- Córdoba, P.G., *The Tax Carve-Out Clause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in REDEFINING GLOBAL GOVERNANCE (Mosquera Valderrama, I.J., Heitmüller, F., Chaisse, J., Christians, A. eds., 2024).
- Sayfutdinov, K., *Promises and Commitments: The Role of Fair and Equitable Provisions and Local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Law and Regulations in Generating Legitimate Expectations*,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ENTRAL ASIAN LAW (Urinboyev, R. ed., 2024).
- Vasudev, Vatsal, *Interactions Between Taxation Measures and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in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AND POLICY (Chaisse, J., Choukroune, L. & Jusoh, S. eds., 2021).

期刊論文

- Heitmüller, Frederik & Irma Mosquera, *Special Economic Zones Facing the Challenges of International Taxation: BEPS Action 5, EU Code of Conduct, and the Future*, J. OF INT'L ECON L., 24(2), 473-490 (2021).
- Czoboly, Gergely & Gabriella Erdős, *QDMTT's Alignment with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s with Potential Deviations*, 53(4) INTERTAX 362, 371 (2025).
- Bantekas, Ilias, *Interstate Arbitration in International Tax Disputes*, 8(3) J. INT'L DISP. SETTLEMENT 514 (2017).
- Jefferson VanderWolk, *The UTPR: Taxing Rights Gone Wild*, 18(11) TAX NOTES

INT'L 1369, 1370 (2022).

Perrone, Nicolás M.,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Foreign Investor Rights and Obligations: Towards Reimagining the International Law on Foreign Investment*, 7(3) BUS. & HUM. RTS. J. 375, 381-382 (2022).

碩博士論文

Mitchell, K. *Accommodating the Public Interest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Treaties: Police Powers, Expropriation and Treaty Interpretation*. Oxford University, UK (2014).

國際協定

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Hong Kong and the Government of New Zealand for the Promotion and Protection of Investments, H.K.- N.Z., July 6, 1995, 1889 U.N.T.S. 333.

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Japan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for the Liberalization, Promotion and Protection of Investment, Mar. 22, 2002, Japan-S. Kor.

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Peru Concerning the Encouragement and Reciprocal Protection of Investments, June 9, 1994.

Agreement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Bolivia and the Republic of Chile for the Promotion and Reciprocal Protection of Investment, Sept. 22, 1994.

Agreement on the Promotion and Protection of Investments Between Sweden and Bosnia and Herzegovina, Oct. 31, 2000.

Comprehensive Economic and Trade Agreement (CETA) between Canada, the European Union, and its member States.

Convention on the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 between States and Nationals of Other States.

Denmark-Turkey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1990).

Ecuador-Canada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1996).

France Model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2006).

German Model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2008).

The Energy Charter Treaty Dec. 17, 1994., 2080 U.N.T.S. 95.

Trea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Republic of Ecuador Concerning the Encouragement and Reciprocal Protection of Investment, Aug. 27, 1993.

U.S. Model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2004).

U.S. Model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2012).

United States-Mexico-Canada Agreement (July 1, 2020).

US Model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1984).

US Model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1994).

外國法規

Commission Notice, Election to Delay Application of the IIR and UTPR Under Article 50 of the Pillar Two Directive 2023 O.J. (C/2023/1536).

Council Directive (EU) 2022/2523 of 14 December 2022 on Ensuring a Global Minimum Level of Taxation for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Groups and Large-Scale Domestic Groups in the Union, art. 56, 2022 O.J. (L328), 1, 57.

Finance (No. 2) Act 2023, c. 30, §§ 121- 278 (UK).

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 H.R. 1, 119th Cong. § 899 (2025) (Engrossed in House).

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 Pub. L. No. 119-21, 139 Stat. 72 (2025).

Proposal for a Council Directive on Ensuring a Global Minimum Level of Taxation for Multinational Groups in the Union, at 11, COM (2021) 823 final (Dec. 22, 2021).

Resolution 107/2023/QH15 Application of Top-up Tax Under the Global Anti-Base Erosion Rules, <https://thuvienphapluat.vn/van-ban/EN/Doanh-nghiep/Resolution-107-2023-QH15-application-of-Top-up-Tax-under-the-Global-Anti-Base-Erosion-rules/591521/tieng-anh.aspx>.

政府及國際組織文件

Angerer, Jost, *Direct Taxation: Personal and Company Taxation, Fact Sheets on the European Union*, European Parliament (May, 2024),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factsheets/en/sheet/80/direct-taxation-personal-and-company-taxation>.

G7 Statement on Global Minimum Tax, U.S. DEP'T OF THE TREASURY (June 28, 2025), <https://home.treasury.gov/news/press-releases/sb0181>.

Global and Domestic Minimum Tax, AUSTRALIAN TAXATION OFFICE,
<https://www.ato.gov.au/businesses-and-organisations/international-tax-for-business/in-detail/multinationals/global-and-domestic-minimum-tax> (last updated July 4, 2024).

Global Anti-Base Erosion Model Rules (Pillar Two):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OECD (May, 2025), <https://www.oecd.org/content/dam/oecd/en/topics/policy-sub-issues/global-minimum-tax/faqs-on-model-globe-rules.pdf>.

IMF, OECD, UN & WORLD BANK, *OPTIONS FOR LOW INCOME COUNTRIES' EFFECTIVE AND EFFICIENT USE OF TAX INCENTIVES FOR INVESTMENT: A REPORT TO THE G-20 DEVELOPMENT WORKING GROUP* (2015),
<https://documents1.worldbank.org/curated/en/794641468000901692/pdf/100756-Tax-incentives-Main-report-options-PUBLIC.pdf>.

IMF/OECD, *TAX CERTAINTY: REPORT FOR THE G20 FINANCE MINISTERS* (2017),
www.oecd.org/tax/tax-policy/g20-report-on-tax-certainty.htm.

International Tax Reform: OECD/G20 Inclusive Framework Releases New Information on Key Aspects of the Two-Pillar Solution, OECD (Dec. 18, 2023),
<https://www.oecd.org/en/about/news/announcements/2023/12/oecd-g20-inclusive-framework-releases-new-information-on-key-aspects-of-the-two-pillar-solution.html>.

Members of the OECD/G20 Inclusive Framework on BEPS Joining the October 2021 Statement on a Two-Pillar Solution to Address the Tax Challenges Arising from the Digitalisation of the Economy as of 9 June 2023, OECD,
<https://www.oecd.org/tax/beps/oecd-g20-inclusive-framework-members-joining-statement-on-two-pillar-solution-to-address-tax-challenges-arising-from-digitalisation-october-2021.pdf> (last visited June 11, 2024).

Members of the OECD/G20 Inclusive Framework on BEPS, OECD,

<https://www.oecd.org/tax/beps/inclusive-framework-on-beps-composition.pdf>
(last updated May 28, 2024).

Multinational Top-up Tax: Undertaxed Profits Rule and Other Amendments, GOV. UK,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multinational-top-up-tax-adoption-of-the-undertaxed-profits-rule-and-other-amendments/multinational-top-up-tax-undertaxed-profits-rule-and-other-amendments> (last updated Sept. 27, 2023).

OECD, Action Plan on 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 (2013), https://read.oecd-ilibrary.org/taxation/action-plan-on-base-erosion-and-profit-shifting_9789264202719-en#page13

OECD, Addressing 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 (2013), https://read.oecd-ilibrary.org/taxation/addressing-base-erosion-and-profit-shifting_9789264192744-en#page3.

OECD, Addressing the Tax Challenges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ction 1 - 2015 Final Report (2015), https://read.oecd-ilibrary.org/taxation/addressing-the-tax-challenges-of-the-digital-economy-action-1-2015-final-report_9789264241046-en#page4.

OECD, Addressing the Tax Challenges of the Digitalisation of the Economy – Policy Note (2019), <https://www.oecd.org/tax/beps/policy-note-beps-inclusive-framework-addressing-tax-challenges-digitalisation.pdf>.

OECD, Background Brief: Inclusive Framework on BEPS (2017), <https://www.oecd.org/tax/background-brief-inclusive-framework-for-beps-implementation.pdf>.

OECD, BEPS Project Explanatory Statement: 2015 Final Reports (2016).

OECD, MINIMUM TAX IMPLEMENTATION HANDBOOK (PILLAR TWO) (2023), <https://www.oecd.org/content/dam/oecd/en/topics/policy-sub-issues/global-minimum-tax/minimum-tax-implementation-handbook-pillar-two.pdf>.

OECD, Model Convention with Respect to Taxes on Income and on Capital, <https://www.oecd.org/ctp/treaties/articles-model-tax-convention-2017.pdf>

OECD, Modernising investment treaties to support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New approaches and avenues for reform (Mar. 31, 2025),

<https://www.oecd.org/content/dam/oecd/en/events/2025/03/investment-treaty-conference/Investment%20Treaty%20Conference%20-%20background%20note.pdf>.

OECD, Programme of Work to Develop a Consensus Solution to the Tax Challenges Arising from the Digitalisation of the Economy (2019), <https://www.oecd.org/tax/beps/programme-of-work-to-develop-a-consensus-solution-to-the-tax-challenges-arising-from-the-digitalisation-of-the-economy.pdf>.

OECD, Public Consultation Document: Addressing the Tax Challenges of the Digitalisation of the Economy (2019), www.oecd.org/tax/beps/public-consultation-document-addressing-the-tax-challenges-of-the-digitalisation-of-the-economy.pdf

OECD, Safe Harbours and Penalty Relief: Global Anti-Base Erosion Model Rules (Pillar Two) (2022), <https://www.oecd.org/content/dam/oecd/en/topics/policy-sub-issues/global-minimum-tax/safe-harbours-and-penalty-relief-global-anti-base-erosion-rules-pillar-two.pdf>.

OECD, Statement on a Two-Pillar Solution to Address the Tax Challenges Arising from the Digitalisation of the Economy (2021), <https://www.oecd.org/tax/beps/statement-on-a-two-pillar-solution-to-address-the-tax-challenges-arising-from-the-digitalisation-of-the-economy-october-2021.pdf>

OECD, Tax Challenges Arising from Digitalisation – Interim Report 2018 (2018), https://read.oecd-ilibrary.org/taxation/tax-challenges-arising-from-digitalisation-interim-report_9789264293083-en#page1.

OECD, Tax Challenges Arising from Digitalisation – Report on Pillar One Blueprint (2020), <https://www.oecd.org/tax/beps/tax-challenges-arising-from-digitalisation-report-on-pillar-one-blueprint.pdf>

OECD, Tax Challenges Arising from Digitalisation – Report on Pillar Two Blueprint (2020), <https://www.oecd.org/tax/beps/tax-challenges-arising-from-digitalisation-report-on-pillar-two-blueprint.pdf>.

OECD, Tax Challenges Arising from Digitalisation of the Economy – Global Anti-Base Erosion Model Rules (Pillar Two).

OECD, Tax Challenges Arising from the Digitalisation of the Economy – Global

Anti-Base Erosion Model Rules (Pillar Two): Inclusive Framework on BEPS (2021),
https://www.oecd.org/content/dam/oecd/en/publications/reports/2021/12/tax-challenges-arising-from-digitalisation-of-the-economy-global-anti-base-erosion-model-rules-pillar-two_ee81a23/782bac33-en.pdf

OECD, Tax Challenges Arising from the Digitalisation of the Economy – Commentary to the Global Anti-Base Erosion Model Rules (Pillar Two) (2022),
<https://www.oecd.org/tax/beps/tax-challenges-arising-from-the-digitalisation-of-the-economy-global-anti-base-erosion-model-rules-pillar-two-commentary.pdf>

OECD, Tax Challenges Arising from the Digitalisation of the Economy – Consolidated Commentary to the Global Anti-Base Erosion Model Rules (2025),
https://www.oecd.org/content/dam/oecd/en/publications/reports/2025/05/tax-challenges-arising-from-the-digitalisation-of-the-economy-consolidated-commentary-to-the-global-anti-base-erosion-model-rules-2025_be9651c2/a551b351-en.pdf.

Qualified Status Under the Global Minimum Tax, OECD,
<https://www.oecd.org/content/dam/oecd/en/topics/policy-sub-issues/global-minimum-tax/qualified-status-under-the-global-minimum-tax-questions-and-answers.pdf> (last updated Jan., 2025).

Szczepański, Marcin, *Taxing the Digital Economy: New Developments and the Way Forward*, EUROPEAN PARLIAMENT (Oct. 26, 2021),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BRIE/2021/698761/EPRS_BRI\(2021\)698761_EN.pdf](https://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BRIE/2021/698761/EPRS_BRI(2021)698761_EN.pdf)

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Global Tax Deal (Global Tax Deal), The White House (Jan. 20,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5/01/the-organization-for-economic-co-operation-and-development-oecd-global-tax-deal-global-tax-deal/>.

UNCTAD, *Corporate Income Taxes and Investment Incentives: A Global Review* (July 12, 2022), 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official-document/diaepcbinf2022d3_en.pdf.

UNCTAD, *Expropriation: UNCTAD Series on Issues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II*, United Nations, 2012.

UNCTAD, *Facts on Investor–State Arbitrations in 2021: With a Special Focus on Tax-Related ISDS Cases* (July 2022), 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official-document/diaepcbinf2022d4_en.pdf

UNCTAD, *IIA Issues Note No. 3: Facts and Figures on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Cases* (Nov. 26, 2024), 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official-document/diaepcbinf2024d5_en.pdf.

UNCTAD,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Tax Measures: What Tax Policymakers Need to Know* (2021), 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official-document/diaepcbinf2021d3_en.pdf.

UNCTAD, *The Global Minimum Tax and Investment Treaties: Exploring Policy Options* (Nov 2023), 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official-document/diaepcbinf2023d7_en.pdf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9: SPECIAL ECONOMIC ZONES* (2019).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22: INTERNATIONAL TAX REFORMS AND SUSTAINABLE INVESTMENT* (2022), 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official-document/wir2022_ch03_en.pdf.

Weekly Tax News, EUROPEAN TAX ADVISER FEDERATION (July 7, 2025), <https://etaf.tax/weekly-tax-news-monday-7-july-2025/>.

研究機構報告

BRIT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 WILMERHALE, *TAX-RELATED MEASURES IN INVESTOR-STATE ARBITRATION* (2024).

SARMIENTO, FLORENCIA & SUZY H. NIKIEMA, *FAIR AND EQUITABLE TREATMENT: WHY IT MATTERS AND WHAT CAN BE DONE* (2022), <https://www.iisd.org/publications/brief/fair-equitable-treatment>.

WARUGURU NDUBAI-NGIGI, JOY, *THE GLOBAL MINIMUM TAX AND SPECIAL ECONOMIC ZONES* (2024), <https://www.iisd.org/system/files/2024-07/global-minimum-tax-special-economic-zones.pdf>.

仲裁案件

ADF v United States, Award, 9 January 2003.

AHS Niger and Menzies v Niger, Decision on Jurisdiction, 13 March 2013.

Alex Genin, Eastern Credit Limited, Inc. and A.S. Baltoil v. The Republic of Estonia, ICSID Case No. ARB/99/2, Award (June 25 2001).

Ampal-American v Egypt, Decision on Liability and Heads of Loss, 21 February 2017.

Apotex v United States, Award, 25 August 2014.

Archer Daniels Midland Company and Tate & Lyle Ingredients Americas, Inc. v. The United Mexican States, ICSID Case No. ARB (AF)/04/5.

Autopista Concesionada de Venezuela, C.A. v. Bolivarian Republic of Venezuela, ICSID Case No. ARB/00/5, Decision on Jurisdiction (Sept. 27, 2001).

Burlington Resources Inc. v. Republic of Ecuador, ICSID Case No. ARB/08/5, Decision on Liability (Dec. 12, 2012).

CEMEX Caracas Investments B.V. and CEMEX Caracas II Investments B.V. v. Bolivarian Republic of Venezuela, ICSID (W. Bank) Case No. ARB/08/15 (Decision on Jurisdiction) (Dec. 30, 2010).

Charanne and Construction Investments v. Spain, SCC Case No. V 062/2012, Award, (Jan. 16, 2016).

CMC v Mozambique, Award, 24 October 2019.

Cube v Spain, Decision on Jurisdiction, Liability and Partial Decision on Quantum, 19 February 2019.

Duke Energy v Ecuador, Award, 18 August 2008.

EDF v Romania, Award, 8 October 2009.

Eiser Infrastructure Limited and Energia Solar Luxembourg S.a.r.l. v. Kingdom of Spain, ICSID Case No. ARB/13/36, Award, 4 May 2017.

Electrabel v Hungary, Decision on Jurisdiction, Applicable Law and Liability, 30 November 2012.

Encana Corporation v Ecuador (2006).

Fireman's Fund Insurance Company v. The United Mexican States, ICSID Case No. ARB(AF)/02/1, Award (July 17, 2006).

GAMI v Mexico, Final Award, 15 November 2004.

Greentech v Italy, Final Award (Dec. 23, 2018).

Horthel Systems BV, Poland Gaming Holding BV and Tesa Beheer BV v Poland, PCA Case No. 2014–31, Award (Feb. 16, 2017).

Impregilo v Argentina, Award, 21 June 2011, 1

InfraRed Environmental Infrastructure GP Limited and others v. Kingdom of Spain, ICSID Case No. ARB/14/12, Award (Aug. 2, 2019).

Ioan Micula, Viorel Micula, S.C. European Food S.A, S.C. Starmill S.R.L. and S.C. Multipack S.R.L. v. Romania [I], ICSID Case No. ARB/05/20.

Ioannis Kardassopoulos v. The Republic of Georgia, ICSID (W. Bank) ARB/05/18, Decision on Jurisdiction (July 6, 2007).

Isolux Infrastructure Netherlands B.V. v. Kingdom of Spain, ICSID Case No. ARB/14/8, Award (July 12, 2016).

Marvin Feldman v Mexico, ICSID Case No. ARB(AF)/99/1, Award (Dec. 3, 2003) .

Masdar Solar & Wind Cooperatief U.A. v. Kingdom of Spain, ICSID Case No. ARB/14/1, Award (May 16, 2018).

Millicom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B.V. and Sentel GSM SA v. The Republic of Senegal, ICSID Case No. ARB/08/20, Decision on Jurisdiction, para. 109 (July 16, 2010)

Mobil & Murphy v Canada, Decision on Liability and on Principles of Quantum (May 22, 2012).

Murphy Exploration & Production Company – International v. The Republic of Ecuador, Partial Final Award, 6 May 2016, para. 159.

National Gas S.A.E. v. Arab Republic of Egypt, ICSID Case No. ARB/11/7, Award, paras. 130–133 (Apr. 3, 2014).

NextEra v Spain, Decision on Jurisdiction, Liability and Quantum Principles (Mar.

12, 2019)

Noble Energy, Inc. and Machalapower Cia. Ltda. v. The Republic of Ecuador and Consejo Nacional de Electricidad, ICSID Case No. ARB/05/12, Decision on Jurisdiction (Mar. 5, 2008).

Novenergia II - Energy & Environment (SCA) (Grand Duchy of Luxembourg), SICAR v. Kingdom of Spain, SCC Case No. 2015/063, Final Award (Feb. 15, 2018).

Occidental Exploration and Production Co v Ecuador, Award, 1 July 2004.

Parkerings-Compagniet AS v. Republic of Lithuania, ICSID Case No. ARB/05/8, Award (Sept. 11, 2007).

Pawlowski AG and Project Sever s.r.o. v. Czech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17/11.

Philip Morris v Uruguay, ICSID Case No. ARB/10/7, Award (July 8, 2016).

Philip Morris v Uruguay, ICSID Case No. ARB/10/7, Concurring and Dissenting Opinion Co-Arbitrator Gary Born (July 8, 2016).

Pope & Talbot v Canada, Award of the Merits of Phase 2, 10 April 2001

Quiborax S.A., Non Metallic Minerals S.A. and Allan Fosk Kaplún v. Plurinational State of Bolivia, ICSID Case No. ARB/06/2, Decision on Jurisdiction (Sept. 27, 2012).

Raymond Charles Eyre and Montrose Developments (Private) Limited v. Democratic Socialist Republic of Sri Lanka, ICSID Case No. ARB/16/25, Award, Mar. 5, 2020.

Renée Rose Levy and Gremcitel S.A. v. Republic of Peru, ICSID Case No. ARB/11/17, Award (Jan. 9, 2015)

RENERGY S.à r.l. v. Kingdom of Spain, ICSID Case No. ARB/14/18 (May 6, 2022).

RREEF v Spain, Decision on Responsibility and on the Principles of Quantum (Nov. 30, 2018).

RWE v Spain, Decision on Jurisdiction, Liability, and Certain Issues of Quantum

(Dec. 30, 2019).

Saint-Gobain v Venezuela, Decision on Liability and the Principles of Quantum (Dec. 30, 2016).

Salini Costruttori S.p.A. and Italstrade S.p.A. v. Kingdom of Morocco [I], ICSID Case No. ARB/00/4, Decision on Jurisdiction (July 16, 2001).

SD Myers v Canada, Partial Award, 13 November 2000.

Sergei Paushok, CJSC Golden East Company and CJSC Vostokneftegaz Company v. The Government of Mongolia, UNCITRAL, Award on Jurisdiction and Liability (Apr. 28, 2011).

Siemens A.G. v. The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2/8, Decision on Jurisdiction (Aug. 3, 2004).

SolEs Badajoz GmbH v. Kingdom of Spain, ICSID Case No. ARB/15/38, Award (July 31, 2019).

Sun Reserve Luxco Holdings SRL v. Italy, SCC Case No. 132/2016, Award (Mar. 25, 2020).

Tecmed v Mexico, Award (May 29, 2003)

TECO v Guatemala, Award (Dec. 19, 2013).

Total v Argentina, Decision on Liability (Dec. 27, 2010).

Toto Costruzioni Generali S.p.A. v. The Republic of Lebanon, ICSID Case No. ARB/07/12.

TSA Spectrum de Argentina S.A. v.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5/5, Award (Dec. 19, 2008)

Ulysseas, Inc. v. The Republic of Ecuador, Final Award (June 12, 2012).

United Utilities (Tallinn) B.V. and Aktsiaselts Tallinna Vesi v. Republic of Estonia, ICSID Case No. ARB/14/24, Award (June 21, 2019).

Voltaic Network GmbH v Czech Republic, PCA Case No. 2014–20, Award (May 15, 2019).

Voltaic Network GmbH v. Czech Republic, Award, 15 May 2019.

Waguih Elie George Siag and Clorinda Vecchi v. The Arab Republic of Egypt, ICSID Case No. ARB/05/15, Award (June 1, 2009).

Watkins Holdings S.à rl and others v. Kingdom of Spain, ICSID Case No. ARB/15/44, Award (Jan. 21 2020).

Yukos Oil Company (Isle of Man) v. Russian Federation, PCA Case No. AA 227, Award (July 18, 2014).

9REN Holding S.a.r.l v. Kingdom of Spain, ICSID Case No. ARB/15/15, Award (May 31, 2019).

網路資料

BEPS 2.0 – Pillar Two Developments Tracker, ERNST & YOUNG, <https://www.ey.com/content/dam/ey-unified-site/ey-com/en-gl/services/tax/documents/beps-2-0-pillar-two-developments-tracker.pdf> (last updated June 21, 2024).

Britton, Nadya, *Pillar 2 and US Multinationals: Decoding the G7 Announcement*, THOMSON REUTERS (Aug. 1, 2025), <https://www.thomsonreuters.com/en-us/posts/corporates/pillar-2-g7-announcement/>.

Chaisse, Julie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and Taxation: From Coexistence to Cooperation*, ICTSD & WORLD ECONOMIC FORUM (2016), https://www.rieti.go.jp/en/events/16071201/pdf/10_am2-5_chaisse.pdf.

Chan, Mimi, *Pillar Two: A U-turn for US-parented Groups?*, PKF LITTLEJOHN (July 21, 2025), <https://www.pkf-l.com/insights/pillar-two-us-parented-groups-u-turn/>.

Enache, Cristina, *Corporate Tax Rates Around the World, 2023*, TAX FOUNDATION (Dec 12, 2023), https://taxfoundation.org/data/all/global/corporate-tax-rates-by-country-2023/#_ftn1.

Humphrey, Miles & Ethan Kroll, *How the OBBBA's International Provisions Interact with Pillar Two*, BAKER MCKENZIE (July 18, 2025), <https://www.bakermckenzie.com/en/insight/publications/2025/07/how-the-obbbas-international-provisions-interact-with-pillar-two>.

Kuźniacki, Błażej, *Pillar 2 and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QDMTT*

Payable' Seals an Internationally Wrongful Act, TAX NOTES (Oct. 9, 2023), <https://www.taxnotes.com/special-reports/oecd-pillar-2-global-minimum-tax/pillar-2-and-international-investment-agreements-qdmtt-payable-seals-internationally-wrongful-act/2023/10/06/7hdg1>.

PwC's Pillar Two Country Tracker, PwC (July 11, 2024), <https://www.pwc.com/gx/en/tax/international-tax-planning/pillar-two/pwc-pillar-two-tracker-full-data-v2.pdf>.

Saint-Amans, Pascal, *The Implications of G7 Agreement on the Global Minimum Tax*, BRUEGEL (June 30, 2025), <https://www.bruegel.org/first-glance/implications-g7-agreement-global-minimum-tax>.

The Impact of BEPS on Tax Incentives in Asia Pacific, KPMG (2021), <https://assets.kpmg.com/content/dam/kpmg/xx/pdf/2021/09/the-impact-of-beps-on-tax-incentives-in-asia-pacific.pdf>.

Timofeyev, Igor, Joseph R Profaizer & Adam J Weiss, *Investment Disputes Involving the Renewable Energy Industry Under the Energy Charter Treaty*, LEXOLOGY (Nov. 10, 2020), <https://www.lexology.com/library/detail.aspx?g=7656e84a-1722-4639-990e-401a2f249e61>.

Velez de Lima, João et al., *US Pillar Two Stance: Tax Competitiveness Challenges for Portugal and the EU*, INTERNATIONAL TAX REVIEW (Apr. 10, 2025), <https://www.internationaltaxreview.com/article/2enjq4tq7cilsn1bsn7y8/sponsored/us-pillar-two-stance-tax-competitiveness-challenges-for-portugal-and-the-eu>.

Voskamp, Barbara et al., *Singapore Proposes Domestic Implementation of Pillar Two and the Refundable Investment Credit*, DLA PIPER (June 19, 2024), <https://www.dlapiper.com/en/insights/publications/2024/06/singapore-proposes-domestic-implementation-of-pillar-two-and-the-refundable-investment-credit>.

Wilde, Maarten, *After the Pillars: A Call for A European Corporate Tax 2.0*, KLUWER INTERNATIONAL TAX BLOG (July 17, 2025), <https://legalblogs.wolterskluwer.com/international-tax-law-blog/after-the-pillars-a-call-for-a-european-corporate-tax-20/>.